三联生活周刊

2023.5.15
2023年第20期，总第1238期
www.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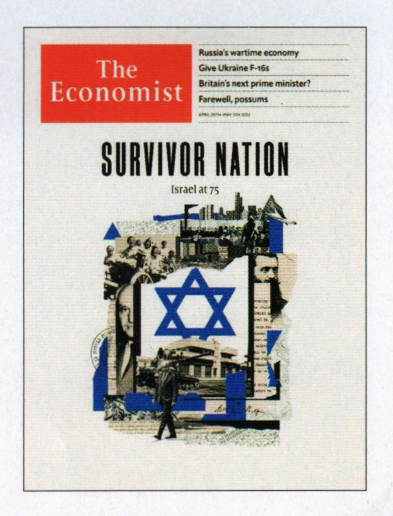
玉器时代

红山　凌家滩　崧泽　良渚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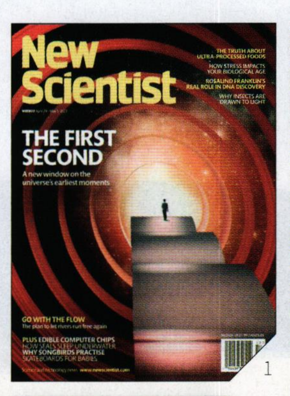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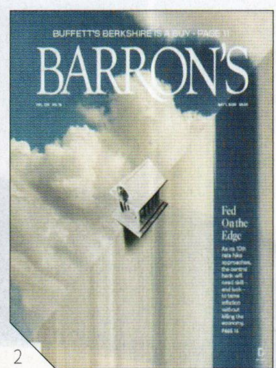


《经济学人》2023.4.29

幸存之国

4 月 25 日，以色列迎来了国家成立 75 周年纪念日。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 2009 年上任，是以色列建国以来任期最长的领导人。他领导着以色列有史以来最为右翼的政府。尽管内塔尼亚胡在经济和安全管理方面表现不错，但最近几个月，每周六都有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游行，抗议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经济学人》认为，以色列正朝着经济不平衡、内部分裂严重的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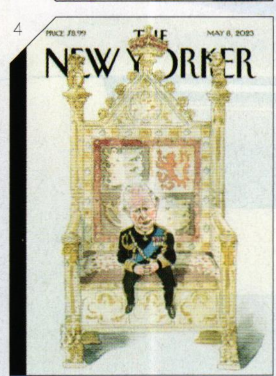




1 2

3 4







1 《新科学人》2023.4.29

宇宙诞生的第一秒

大爆炸的瞬间，大量粒子被释放到宇宙中，从那以后，这些粒子就在太空中自由穿梭。每秒钟约有 100 万亿个粒子穿过你的身体，而你从未注意到它们。这些幽灵般的粒子就是中微子。大爆炸理论认为，中微子仍然在今天的宇宙中流动，物理学家将此命名为“宇宙中微子背景”。这项发现意义重大，将为人类认识宇宙提供一种全新的方式。

2 《巴伦周刊》2023.5.1

美联储加息

自 15 个月前美联储首次启动对抗通胀以来，美联储已连续 10 次加息，创下了 40 年来最快的货币紧缩政策步伐。到目前为止，美联储已经实现了批评者认为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平衡。但随着第 10 次加息，美联储将进入一个更不稳定的阶段，即使能在不引发深度衰退的情况下为经济降温，也可能导致一些痛苦的后果。

3 《卫报周刊》2023.4.28

破碎的苏丹

苏丹喀土穆市中心的街区曾经是首都最受欢迎的地方，但现在它非常危险，数万居民被困家中，迫不及待地想逃离。喀土穆市成为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快速支援部队”（RSF）权力角逐的舞台。据国际非政府组织称，当地死亡人数超 420 人，其中包括 264 名平民，3700 多人受伤。4 月底，西方政府相继撤离了驻苏丹的外交官、大使馆工作人员等。近期苏丹西南部再次发生冲突。

4 《纽约客》2023.5.8

查尔斯国王加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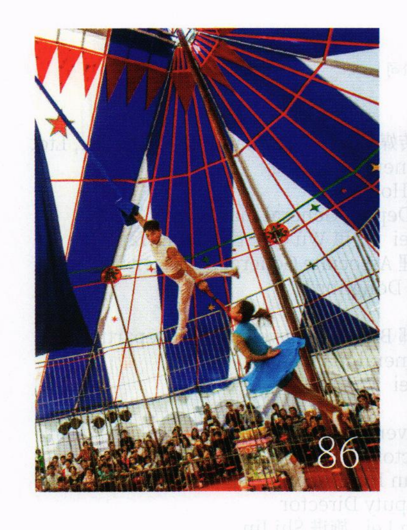
英国国王查尔斯的加冕典礼于 5 月 6 日举行，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威尔士亲王，这个头衔在他 9 岁时就获得了，如今查尔斯已 73 岁。查尔斯有时会被描述为皇家巢穴中的杜鹃——他既没有继承母亲的坚忍，也没有父亲的情感冷漠。他喜欢哲学、热衷环保、喜爱歌剧，他并不避讳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曾被媒体形容为“爱管闲事的王子”。但根据惯例，英国君主必须保持坚定的非政治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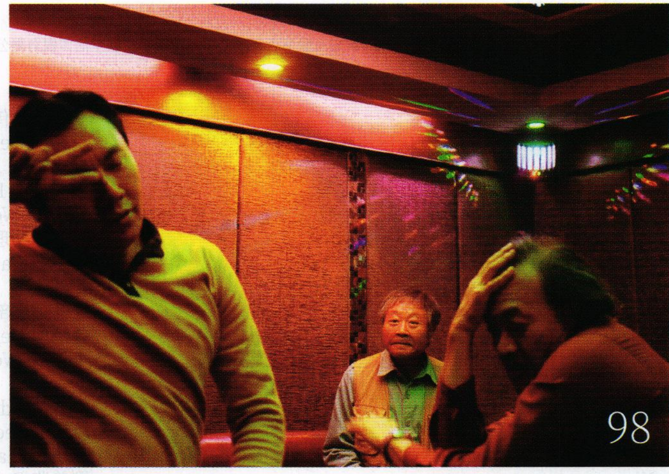


28 封面故事

玉器时代

红山 凌家滩 崧泽 良渚


86


98

封面摄影：张雷

2023年第20期，总第1238期，2023年5月15日出版。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业务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王东东 Wang Dongd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刘畅 Liu Chang
线上发行业务 On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王霄 Wang Xiao 李振宇 Li Zhenyu
王荻 Wang di 陆佳杰 Lu Jiajie
姚贺梅 Yao Hemei
线下发行业务 Off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杨雪梅 Yang Xuemei 嵇晓萌 Ji Xiaomeng
李涛涛 Li Taotao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中读 + 人文城市合作电话：(010) 84681395
联系人：蔡华
E-mail：caihua@lifeweek.com.cn
图书出版合作电话：(010) 84681019
联系人：赵翠
E-mail：xingdu@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 海：上海鸿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8017668286
成 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7427853
昆 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883566
哈尔滨：黑龙江视博图书经销有限公司（0451）88382909
青 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055155
长 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0431）82752206
大 连：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0791）88820509
太 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天津市文馨图书销售有限公司（022）87080096
河 北：兵行天下图书发行有限公司（0311）83035788
新 疆：乌鲁木齐大漠骏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99985971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82055352
长 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扫描二维码直接下载中读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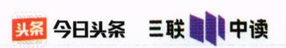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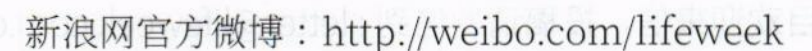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下载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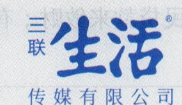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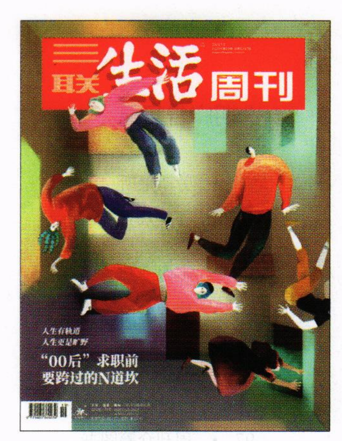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本期广告目录





2023 年第 19 期，总第 1237 期

"00 后"求职前要跨过的 N 道坎

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个道理，想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上大学是为了什么？你想通过大学教育获得什么？找工作、立足社会固然是其中一条，但不是全部和终极目的。最终还是探索自己的潜能和兴趣在哪儿，并在实践中摸索和调整。人不能太短视，也不能过于功利。(@ Echo)

在平衡各种角色中实现自洽，才是独立的人应追求的目标。如威廉·德雷谢维奇所言："一个人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他大量阅读，习惯思考，放缓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

(@ Lynn)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农村的熟人"骗局"

母亲给我打电话聊家常，告诉我前几天父亲不听劝做了一件事，说是太阳能板进村安装有惠民补贴，一年可拿到 1500 元，且来推销的是村里的一个熟人。母亲说父亲认识此人，合同都没细看就签了字。虽然 1500 元听起来不多，但对于父亲而言却是一笔巨资。这两年村里一亩地租出去给别人种一年只能拿到 100 元租金，1500 元相当于 15 亩地的租金，这样一换算，对老百姓而言确实诱惑不小。

我一听觉得像个骗局，赶紧去网上搜索了相关信息，发现这几年附近省市也是有不少农村太阳能板屋顶安装的活动，搜索出来的以负面信息为主。主要出现三类问题：一是合同上有猫腻，甲乙方租卖内容混乱，存在不少霸王条款。二是隐瞒以租赁贷款的方式安装太阳能板，嘴上说着屋顶免费安装每年给村民钱，实际上是靠着骗村民贷款来敛财；有些业务员为了成功签单，什么话都敢说，结果村民装上以后并不是所说的那样，和合同上写的内容大相径庭。三是对于房屋有不良影响也不主动告知，碰到下大雨屋顶漏水，上报维修时对方就开始拖延；一些老房子安装太阳能板后，会有墙体开裂的现象。有些合同上注明了太阳能板坏了需要赔钱，如果遇上房屋拆迁，还需安装太阳能板方同意，或者需要花费数万元自己把太阳能板买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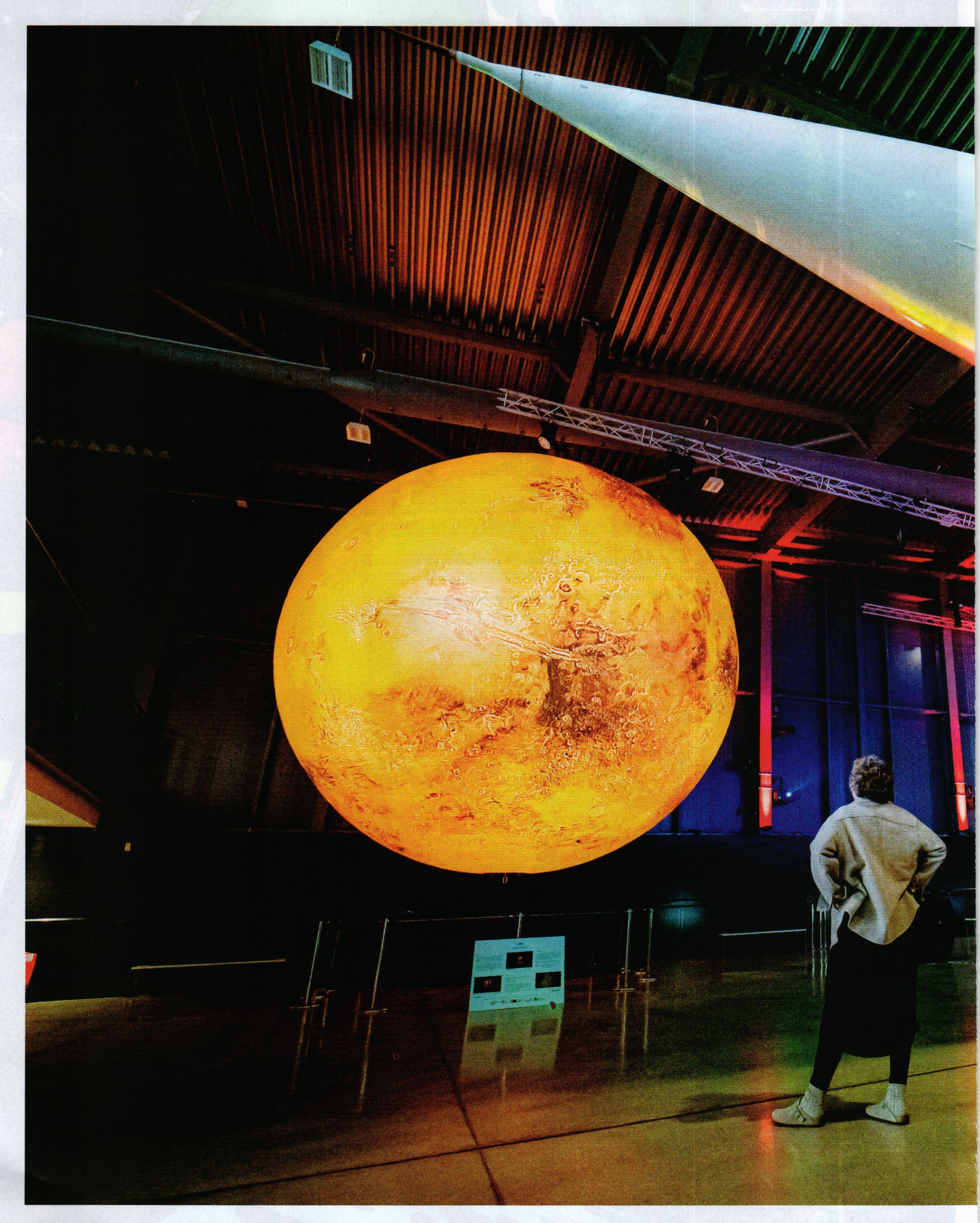
那个上门来推销业务的是本村村民，那人只说等着拿钱，让父亲其他就不要管了，至于合同的内容也没有和父亲详谈，只是让父亲签完字拿身份证去银行办了张卡，说是用来收安装太阳能板补贴的钱。父亲想着有钱拿，又是熟人的关系，也没什么顾虑，一股脑地就去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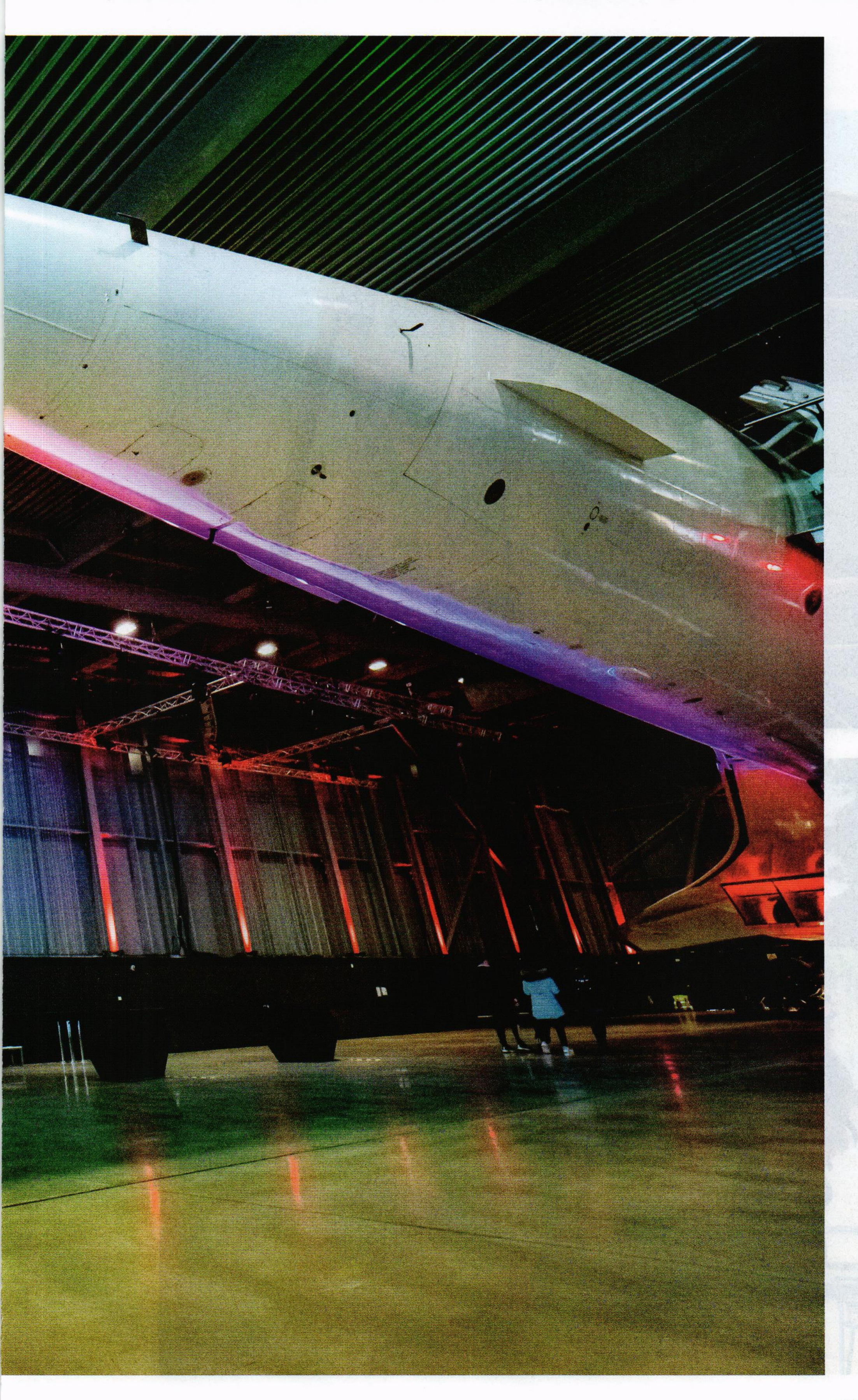
村里之前发生过一起熟人骗局。那是前年，屋后 70 多岁还在种着大棚蔬菜的爷爷，被同姓邻居的儿子借了 2 万元，说是做钢材生意周转一下，一年之后连本带息还 2.3 万元，结果今年那位爷爷突然因病住院才想起那笔钱还没收到，上门去要钱，才发现借钱的人出事了。那家的儿子借了村里十几个人的钱，2 万～10 万元不等，说辞不同，有说做生意，有说买商铺，等等。当初除了因为高利息的原因，大多数人愿意借也是因为彼此乡里乡亲，如今对方偿还不了躲在外面，听说他在网上欠了赌债，村里老人借出去的那几万元血汗钱大概率是收不回来了。

我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以后如果涉及签合同或办银行卡之类的事情要第一时间联系我确认再做，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以为熟人就相信，很多骗局都是从熟人下手的。农村的青中年基本不在家，或定居在城里，或长年在外务工，这也使得一些有不良动机的熟人钻了空子，专挑独居老人下手。父亲只是一个劲地说知道了，然后匆匆挂了电话，真希望他能听进去。（读者 王露露）

本期截稿时间：5 月 8 日 19 时。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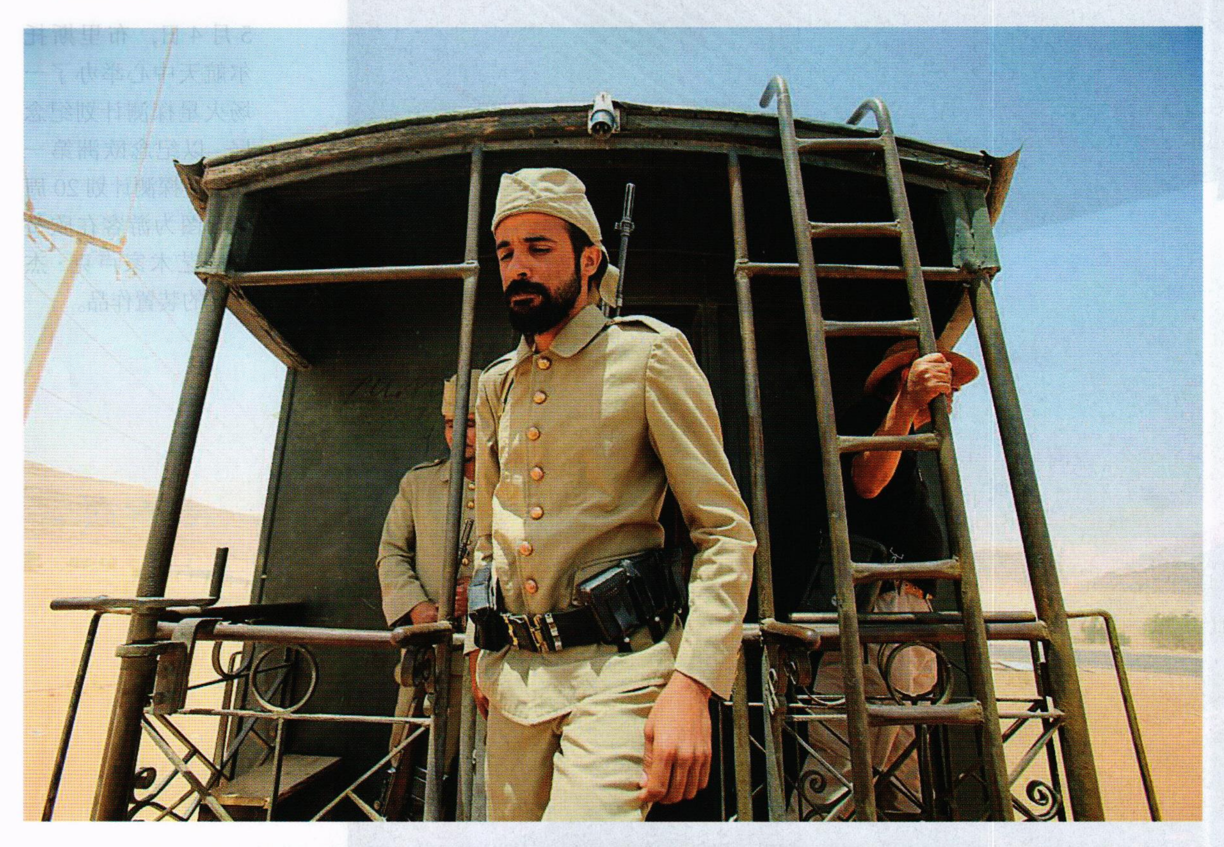

绘画：老牛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天猫旗舰店
微信书店





英国 | **火星探测计划纪念展**

5月4日，布里斯托尔航天中心举办了一场火星探测计划纪念展，以纪念欧洲第一次火星探测计划20周年。图为游客在欣赏英国艺术家卢克·杰拉姆的装置作品。





法国 | **养老金改革法案**

（右图）5月1日，抗议者在巴黎举行示威活动，继续抗议养老金改革法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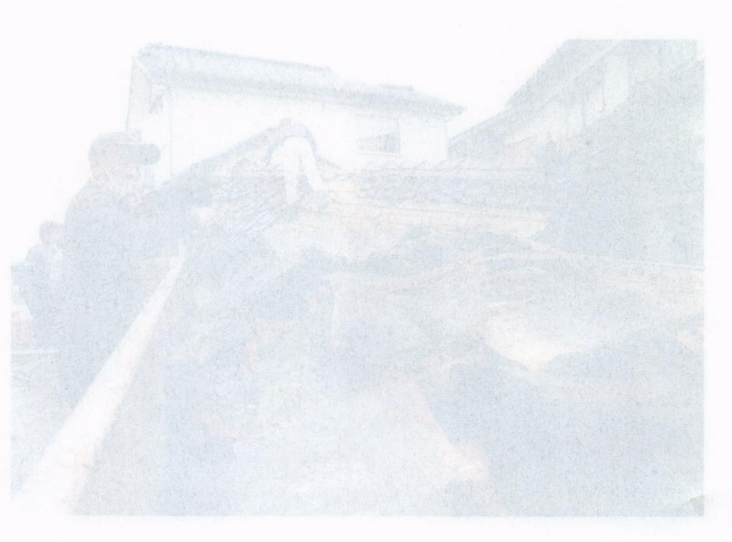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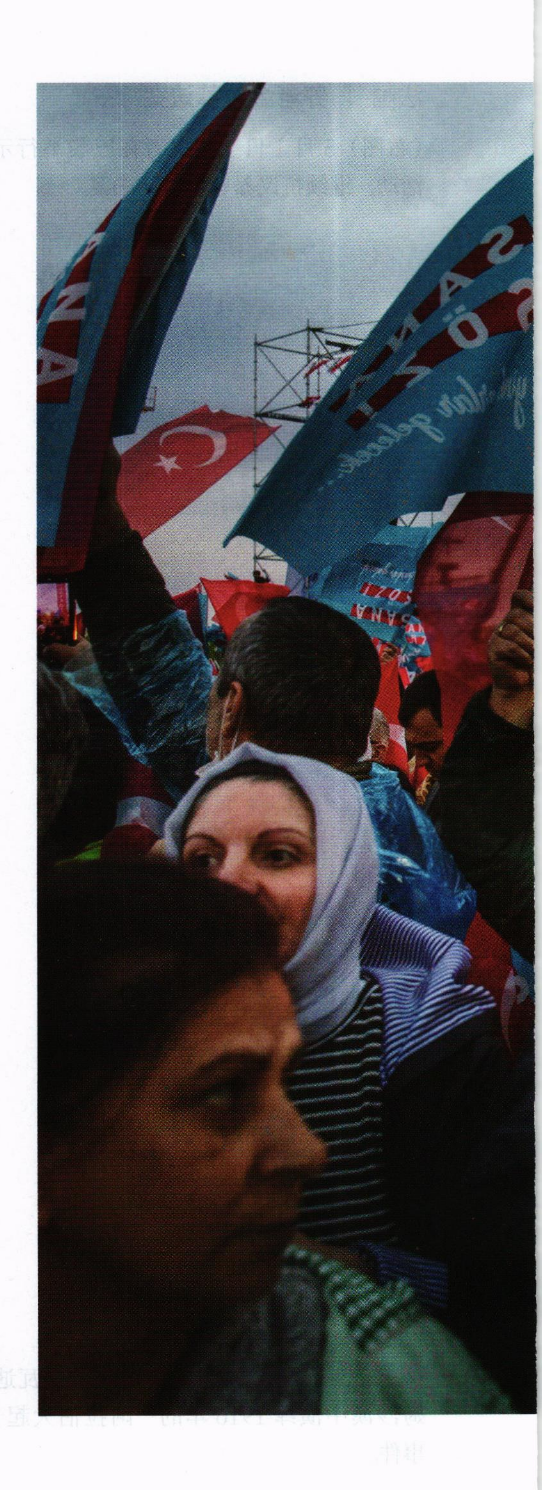
约旦 | **“阿拉伯大起义”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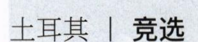
（左页上图）5月6日，一群演员在瓦迪拉姆沙漠中演绎1916年的“阿拉伯大起义”事件。

意大利 | **洪水**

（左页下图）5月4日，拉韦纳附近，救援人员帮助居民从被淹没的房屋中撤离。意大利北部最近连续降雨引发了洪水。







土耳其 | **竞选**

（右图）5 月 6 日，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共和人民党（CHP）领导人凯末尔·科勒齐达奥卢的支持者在集会中。他将代表土耳其反对党联盟在 5 月的大选中挑战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日本 | **地震**

（下图）5 月 6 日，石川县居民在震后第二天清理倒塌的建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 6 日 8 时，已发生余震 51 次。





淄博，小城旅游的可能性

文 · 邢海洋

小长假旅游，“躲在”山东中部的小城，蒲松龄的家乡淄博“出圈”了。一个并没有旅游资源的中原小城，仅凭烧烤就吸引了数十万游客，或提供了小城旅游市场的新方向。

“五一”是旅游季的开始，身边的很多家庭，早早就计划着出游，甚至在疫情中，他们都会走出家门，顶不济也是几个家庭一起到远郊住民宿。突然间民宿、酒店乃至机票的价格大涨，一次普普通通的旅游，就得两万到三万元的支出。这被称为新一轮的中产收割机制。房子这个大块支出没了，旅游成为信仰，却面临着被无情收割。以旅游为杠杆，财富分配完成新一轮转移。有一种说法，连锁酒店，尤其是不太看重度假游口碑的商务连锁酒店，为估值修复涨价最猛，涨得越离谱，它们的股价越受追捧。从这个意义上看，拼凑出的“五一”小长假，成就了资本的一次狂欢，却将社会决策缺乏话语权的中产或准中产们打回原形。如果是带薪休假，旅游成本可控，本不至于此。

“五一”出游，火车票全买爆，中短途开车自驾游是另一个选项。旅游市场的黑马淄博突然杀出，承诺开放全市政府机关的停车场，且当消息传来，外地车辆在淄博违规停车交警挨个打电话提醒，并没有贴罚单的时候，在这个用脚投票的旅游市场，旅游者于是有了新目标新方向。就在旅游大军奔赴山东的时刻，山西原平市政府承诺“五一”期间外地车违章不罚款、景点不收门票、景区不涨价，全市所有宾馆旅店不涨房价，另一个目的地也出现了。

笔者在山东生活过，一次路过栖霞，只是向路人打听哪儿有苹果卖，就被一位大爷塞了一篮子苹果，被山东人的好客所感动。那是少有的几次中的一次在省道县道上漫游，后来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在直道上拐弯被罚款。山东高速等级高、路网密，可下了高速尤其是东营一带很多地方都是限速40公里/小时，宽阔的马路车却跑不起来，到处都是摄像探头，立时就没了驾驶的乐趣。后来就尽量在高速上赶路，直奔目的地。其实胶东半岛沿途一座座城市都各有特色，自驾又拉近了一座座小城之间的距离，正可体会齐鲁大地古朴厚重的文化。可惜，那里的摄像探头太多了，外地人初来乍到总是提心吊胆，漫游而不能尽兴。

出差去看河北邯郸的磁山新石器文化遗址，那是一座盛产成语的古城，满溢着战国时期的历史。可刚离开就收到了违章提醒，闯了限行，想不到地级市都限行了。抱着不知者不怪的想法申诉，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回应——规定如此，外地车也不能例外。出门旅行，究竟要把功课做得多细致才能一路不误入限行呢？其实这也是绝大多数旅行者面临的问题。一次次被打击后，人们转向高速或者高铁，点对点地“跳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用脚步来丈量。这既是旅行者的损失，也是沿路小城的损失。

小长假里，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冷热不均，各地文旅局纷纷登场各显神通。一个本来没有旅游资源、根植于畜牧大省的山东中部小城，竟然以一己之力引领了文旅市场的大方向，真是意料之外，却给散乱差的旅游市场以启示。以市场经济为名，商家得益于拼凑出的小长假的集中需求大赚其钱，但作为消费者，是感受不到旅游城市的地主之谊的，感受到的是满满的生意经。偏偏旅游是一个生意与待客的混合体，生意经多了，就没人愿意来了。

如今的旅游市场，早不是过去的信息封闭、大好河山非游不可的市场。既然体验重于观光，那些如淄博一样好客的小城也就有了机会。

相对于2019年，小城旅游崛起



2023年“五一”假期不同线级城市酒店预订量同比2019年涨幅



在这里
陪你读懂
生活
LIFEWEEK
三联生活
公众号
三联生活周刊
发消息
消息
视频号
服务
给孩子花钱，我们太不理智了
危险的赶海，原来是传销团建
保洁阿姨，大隐隐于办公室
扫一扫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



栏目插图 · 范薇

被 AI 替代的职位

IBM 表示，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职位将暂停招聘。IBM 目前总计雇用了大约 26 万名员工，其软件开发和面向客户的职位仍在招聘。暂停招聘的是人力资源等后台职能部门，涉及 2.6 万名员工，其中 30% 的职位在 5 年内可以被人工智能“轻松取代”。ChatGPT 等应用可能影响美国大约 19% 的工作岗位所执行的至少 50% 的工作任务。

PMI 跌入收缩区

4 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6.4，低于 3 月的 58.2，高于 50 的荣枯线，服务业活动呈稳健扩张态势。制造业 PMI 从 3 月份的 51.9 降至 49.2，制造业活动出现萎缩。总体看，经济在复苏，但并不均衡。需求不足问题突出，国内外新订单指数均明显回落，反映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比重创近 3 年来新高。

AI 入侵文娱圈

由 AI 创作的第一首“神曲”《袖上之心》(*Heart on My Sleeve*) 走红不到一个月，便被唱片公司与流媒体联合抵制下架了。原因是，AI 克隆了知名说唱歌手 Drake 和音乐人“盆栽哥”The Weeknd 的声音。面对 AI 借用艺人声音，音乐人态度两极分化，已有艺人允许经纪公司销售自己的 AI 声音使用权。





美元利率“破5”

5月3日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25个基点到5%至5.25%之间。之前，国内商业银行美元存款利率大幅上涨，绝大多数商业银行美元一年期定存的利率已达到4.5%～4.8%，有的银行6个月期定存利率甚至突破了5%。美元加息之初，国内银行还维持着很低的利率，竞争之下不得不跟进。可欧元等外汇存款还是低利率。





养育成本第二高的国家

育娲人口研究智库的研究报告表明，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成年，其成本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9倍。这一数据是德国（3.64）的两倍，是澳大利亚（2.08）和法国（2.24）的3倍多。这让中国成为养育成本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韩国。韩国的养育成本是其人均GDP的7.79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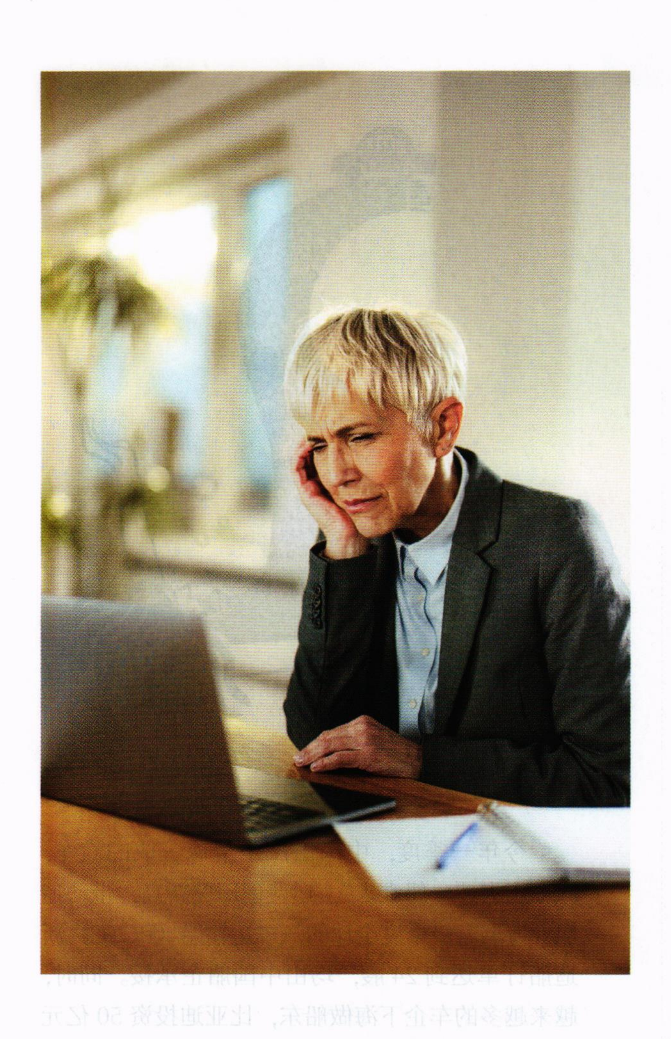


“海上印钞机”

今年一季度，中国出产了全球三成的汽车，汽车出海“一船难求”，运费创历史新高，带动造船业发展。一季度全球的汽车运输船（PCTC）新造船订单达到24艘，均由中国船企承接。同时，越来越多的车企下海做船东，比亚迪投资50亿元订造全球最大PCTC。随着中国汽车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航运公司接连布局汽车运输船。

文创雪糕

淄博烧烤出圈，文创雪糕也横空出世，火焰造型搭配“淄博烧烤”四个大字，为游客提供了更多元的打卡场景。自2019年故宫神兽雪糕出圈后，文创雪糕席卷了全国各大景区，“文创雪糕+建筑背景”成了最时髦的打卡方式。文创虽贵，但年轻人踊跃购买。不过，文创雪糕越来越多，出圈的却越来越少。



职业女性的更年期负担

美国梅奥诊所医生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在该诊所接受基础医疗服务的 4000 余名 45～60 岁的女性中，有 15% 曾因更年期症状无法上班或减少工作时长。其中，症状最严重者在工作上受到负面影响的概率是症状最轻微者的 16 倍，略高于 1% 的女性因为症状过于严重被解雇或辞职。据研究者估算，在美国，女性每年因更年期症状失去的工作时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 1.8 亿美元。有医学专家指出，实际的损失可能比该研究测算的更高，因为被调查的女性有医疗保险和治疗选项，而大量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女性可能受到更严重的负面影响。

好消息



乳腺癌的新风险标记

科学家此前已知乳房组织的密度与患乳腺癌的风险呈正相关。一项最新的长期研究显示，根据一组乳腺癌患者发病前后的数据，发生癌变的一侧乳房的密度比另一侧下降得更慢。研究者认为，乳房密度变化的快慢有可能成为新的乳腺癌筛查指标。



戒烟时间与肺癌生存率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在 5596 名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与没有吸烟史的患者相比，仍在吸烟的患者的死亡率高了 68%，已戒烟患者的死亡率高了 26%。这项研究再次印证，肺癌病人在诊断前不吸烟的时间越长，生存概率就越高。

坏消息



阿尔茨海默症与压力

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的科学家发表的新研究显示，在相似的高压环境下，雌性小鼠大脑中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淀粉样蛋白增高的水平比雄性小鼠更显著。这种对于压力反应的神经学差异，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何女性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接近男性的两倍。



更不健康的儿童食品

加拿大一研究团队分析了市面上 6000 种产品后得出结论，为吸引儿童消费者而设计特色包装的食品和饮料，比一般产品的含糖量更高、营养更低。有专家指出，食品行业针对儿童营销的更大危害在于，对低营养食品的偏好会持续到成人之后。



让人们乖乖排队的一个方法是，给他们找点事情做。有时我们可能会在酒店前台得到免费糖果作为安抚奖励，或者在诊所、理发店得到免费咖啡。这些对于我们宝贵的时间来说，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回报，但我们不会这样想，因为我们感到别人认可了我们的时间价值，而且还给了我们一些回报，尽管这些回报根本不值什么钱。

——英国心理学家安妮·鲁尼，《像心理学家一样思考》

一些学理科的人，表达意思往往句子写得特别长。为什么那么长呢？因为他们受外语的影响，经常写一些层次很多的包孕句。用我们语法的术语来说，叫作主谓结构作句子成分。在西方语言中，这种结构是通过关联词的使用来实现的。这些结构，并不适合汉语，给人的感觉就是“杂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

德行促进了顺从，它是一种秩序的媒介……为了否定德行，人们必须用怠惰抵制勤勉，用即时的满足抵制清教徒式的禁欲，用明天抵制今天，用大麻抵制酒精，用放纵激情抵制表达情感时的节制，用集体抵制孤立的个人，用粗心大意抵制精打细算，用狂喜抵制冷静，用反叛抵制臣服，用诗歌、音乐和舞蹈抵制僵硬的尊严。

——波兰诗人米沃什，《旧金山海湾景象》

在调情中爱情最少。

——法国作家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人能言，禽兽不能言。鹦鹉虽能言，然不能知言之意。若读书而不知书之意，与鹦鹉无异矣。

——1901年上海南洋公学《蒙学课本》

数字

4400 步

有多项研究表明，10000只是一个好看的数字，而不是有科学依据的金科玉律，将目标定为每天4400步即可。美国犹他州杨伯翰大学的研究人员2019年的一项研究认为，每天走4400步与死亡率的降低之间存在关联。

2.74 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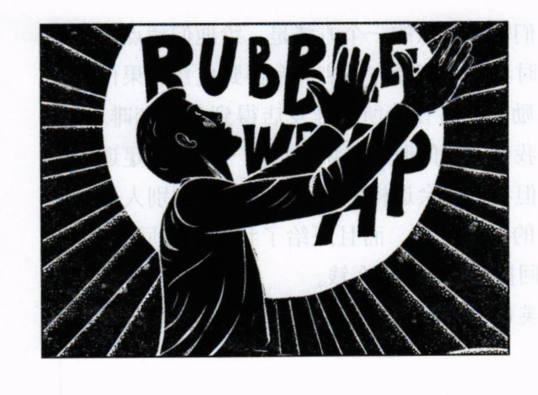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3年“五一”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74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480.56亿元，同比增长128.90%，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00.66%。

3 %

苹果公司2023财年第二财政季度营收为948亿美元，比一年前同期下降3%。净利润同比减少3%，降至242亿美元。苹果最昂贵的手机iPhone 14 Pro Max占苹果手机总销售额的24%。

解压泡泡纸

文 · Harps 图 · 谢驭飞



拆了一个小快递，里面是一瓶洗发露，外面裹了几层银亮崭新的泡泡纸。我剪开固定泡泡布的透明胶，手感微妙富有弹性的小气囊密集整齐地排列着，像是在发出无声的请求：捏我！捏我！忍不住一口气捏了小半张才放手。被大面积捏爆的泡泡纸几乎没有变化，如果现在有另外一个人捡起这张泡泡纸继续捏，他会失望地捏到许多哑炮，但还是不会放弃。毕竟在已经捏爆的泡泡纸中寻找个别漏网之泡，也别有一种乐趣。

1957 年，美国新泽西的两名工程师把两张浴帘和其间的空气封在一起，发明了泡泡纸。这种材料有非常好的缓冲性能，因此赢得了 IBM 公司的大订单，用于包装电脑。后来，泡泡纸走向了全世界，在发挥抗震保护的功能之余，还成了人们手里的解压玩具。摸到一个泡泡，缓缓掐下去，感觉泡泡里的空气压力逐渐变大，最终“叭”的一声破裂，这个简单的动作给人带来无上的触觉慰藉。可能因为城市空间中的物品触觉都过于光滑坚硬、干脆利落，远远不能满足人类指尖那些密集的神经末梢。如今，我们少有机会抚摸带刺的草叶、滑溜的鱼鳞、牛马的粗糙皮毛、小动物冷飕飕的鼻尖……泡泡纸不温不凉、柔中带刚，近于动物机体的手感让人欲罢不能。

塑料走哪儿都被嫌弃，所以泡泡纸的使用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广泛了，被瓦楞纸或波纹纸取代。泡泡纸也有成本，所以有的商家循环使用，东西收到时上手一捻就知道泡泡纸是旧的，霉霉烂烂，疲软不堪；但还是不甘心，手指地毯式搜索一个个泡泡捋过来，捋到了一个没破的，又珍惜又坚决地轻轻捏爆，心中的愉快就不用提了。

也有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充气塑料膜，有联排长条形的，有小枕头状的，都比泡泡布差远了。尤其是小枕头状的空气包，体积巨大，让快递公司完全抛弃了“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这一朴素真理，动不动就用巨大的纸盒装一样小小的东西。大箱子到家，撕开封箱胶先涌出一堆空气包，心头无名火腾地一下蹿起三尺高，和泡泡纸的效果完全相反。空气包如果直接扔进垃圾桶，一桶装不下，必须一个个用剪刀戳破，把空气挤出来，才能丢掉。空气包用的材料相当坚韧，不能像泡泡纸一样很爽地捏爆，真的捏爆会发出巨响，把旁边的人吓一跳。

跟空气包生完了气，就会非常怀念泡泡纸包打天下的年代。好在泡泡纸并没有退出市场，每次拆到有泡泡纸的快递，都好像得到购物券一样捡了便宜，把包装垃圾清理出门之前，要先好好捏几把。曾经有传说泡泡纸因为太不环保将被弃用，有人专门做了在 iPad 上玩的捏泡泡纸游戏。假如有一天人类真的以数字生命的形式存在，也会在赛博世界里纵容自己捏泡泡纸吧。

非传统饭搭子

文 · 欧阳宇诺　图 · 谢驭飞



年少的时候，我不需要饭搭子，就餐时的餐厅或食堂，被我默认为表演的舞台、观察的基地。在那里，我用优雅或夸张的肢体动作模仿卓别林式的无声电影，试图用一场内心戏十足的自我狂欢，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或者，如果餐厅里有什么有趣的人或事，我只有百分之十的精力放在饭菜上，另外百分之九十的注意力专注于我感兴趣的人或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面目重复、形态类似的人或事再也唤不起我的兴趣。就餐时，我新添了“反刍思考”的坏毛病，沉迷于回忆过往那些没做好的事、没怼好的人，任由脑回路中的默认模式网络（DMN）在脑子里恣意暴走。DMN的过度运作常常令我食之无味并在饭后郁郁寡欢，我意识到，如果我不想让我的大脑接受“经颅磁刺激技术”治疗，就必须转移注意力，让自己在吃饭的时候快乐起来。

我的饭搭子就在这时恰如其分地来到了我的身边。在她入职刚好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偶然在食堂相邻而坐，她正在和其他人讨论到底是海明威主动接近玛莎·盖尔霍恩、把她变成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还是盖尔霍恩想方设法吸引海明威，逼迫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波琳离婚。在这场事关历史与文学的讨论中，饭搭子已经顾不上餐盘里的食物了，她挺直腰背，仿佛备有讲稿一般，声音洪亮且语调流畅地将她的观点娓娓道来，令一旁的我既惊叹又感动。因为全程专注于她讲述的“故事”，这顿饭我破天荒地没有作“反刍思考”，饭后我备感愉快，并决定今后的每顿饭都要尽量跟她一块儿吃。

接触了一段时间，她的博学真是令我惊叹，从水星七杰的传奇故事到白垩纪霸王龙的习性，从天宫空间站计划到十二种佛法僧鸟的区别，从流星余迹通信原理到各种熟成牛排的烹饪时间，仿佛世间没有她不了解的事情。每天我从三层爬到四层去她的办公室，跟她结伴去食堂，只为在路途中听她再多说一点。她懂得多，会表达，说的时候还常常伴以恰当的手势与表情，仿佛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在表演。有一位体育作家赞美“棒球之神”贝比·鲁斯时曾经说过：“你必须当场见证。”是的，我无法用精准的词语来描述她的午间演讲是多么精彩，你必须当场见证。

她热爱海鲜，我海鲜过敏，她讨厌蔬菜，而我痴迷蔬菜。我们彼此颠覆了饭搭子必须口味相似的规则。对于一个像我一样寡言少语、乐于倾听的人，由她主导的整场午间演讲简直是一份超级礼物。不止我一个人喜欢这份礼物。她之前在另一家公司工作，上班两周后，她对面工位那个沉默寡言的男同事突然说：“我不爱说话，但是非常喜欢你的能言善辩，听着特别令人高兴。我有两套房、两辆车，收入水平你大概也了解了。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本栏目投稿信箱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绚丽材质

梵克雅宝 Lucky Spring 胸针上的梅花以白色珍珠母贝雕琢出五瓣圆融花冠，在柔和的玫瑰金圆珠映衬下，折射出温煦光泽，象征幸运的瓢虫则由明艳橙红的红玉髓和黑色深邃的缟玛瑙塑造。

坚不可摧

Ascent 笔记本具有碳纤维封皮和石头纸内页，可抵御水或火焰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让笔记本在极端条件下保持完整，搭配同样为极端条件打造的 Fisher Space 内芯太空笔。





飞返功能

浪琴表先行者系列飞返计时腕表区别于传统计时表，飞返功能按压一次即可完成停止、重置和重新启动，双向可旋转表圈。表圈采用彩色陶瓷材质，饰以夜光刻度，表带配备支持微调系统的折叠式表扣。



中底科技

昂跑 Cloudsurfer 跑鞋搭载最新 CloudTec Phase ™中底科技，由 Helion ™ Superfoam 泡棉制成的全新模块，如多米诺骨牌般排列互锁，模块在运动时的无缝滚动，确保稳定步幅的同时获得充足能量反馈。



艺术家居



Alexander Lamont Drift 地灯采用麦秆镶嵌工艺，将深浅对比的 Beechwood 色调排列形成几何重叠的表面，变化的灯体营造出流动上升的雕塑感，灯脚和灯颈底部饰有青铜细节。



携式扬声器

Beosound A5 的 4 个驱动单元由 4 个数字功放驱动，可提供共计 280 瓦的功率，将 360 度动态声效填满整个大房间；为了确保长期使用，其构造材料支持轻松拆卸，从而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节水理念

高仪 SPA 瑞雨 Icon 3D 花洒的造型如同水面泛起的波纹点点，雨淋式和纯净式两种喷淋模式提供双重体验，节水设计可轻松调出理想的水量和温度。

金属面包盒

Alessi Mattina 面包盒属于方便日常使用的多功能物品，金属盒子的侧面留有洞孔，确保面包存放所需的湿度，天然竹制盒盖同时用作砧板和托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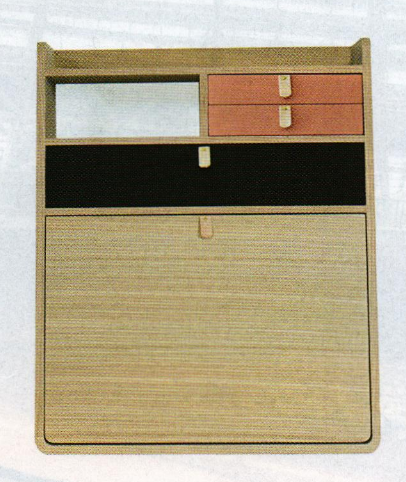
酒椰花卉

米色椰叶纤维编织的Anya Hindmarch Maud 手拿包，廓形包袋表面出现立体的花卉图案，金属封边的顶部点缀两个相互交叉的搭扣。

竹制灯罩

Good & Mojo Hokkaido 壁灯由越南手工制作，金色铁丝穿过圆形灯罩的竹制外框，镂空结构在墙壁上投下美丽的阴影。





壁挂写字台

作为节省空间的解决方案，Hartô Gaston 壁挂式写字台的台面可以拉伸和闭合。天然橡木搭配色彩明亮的涂漆纤维板抽屉，铜钉固定的天然皮革充当手柄。



弧形边缘

Muuto Nerd 餐椅融入斯堪的纳维亚木质元素，靠背和椅面以穿插的方式无缝对接，略微翻卷的弧形边缘是富有特色的设计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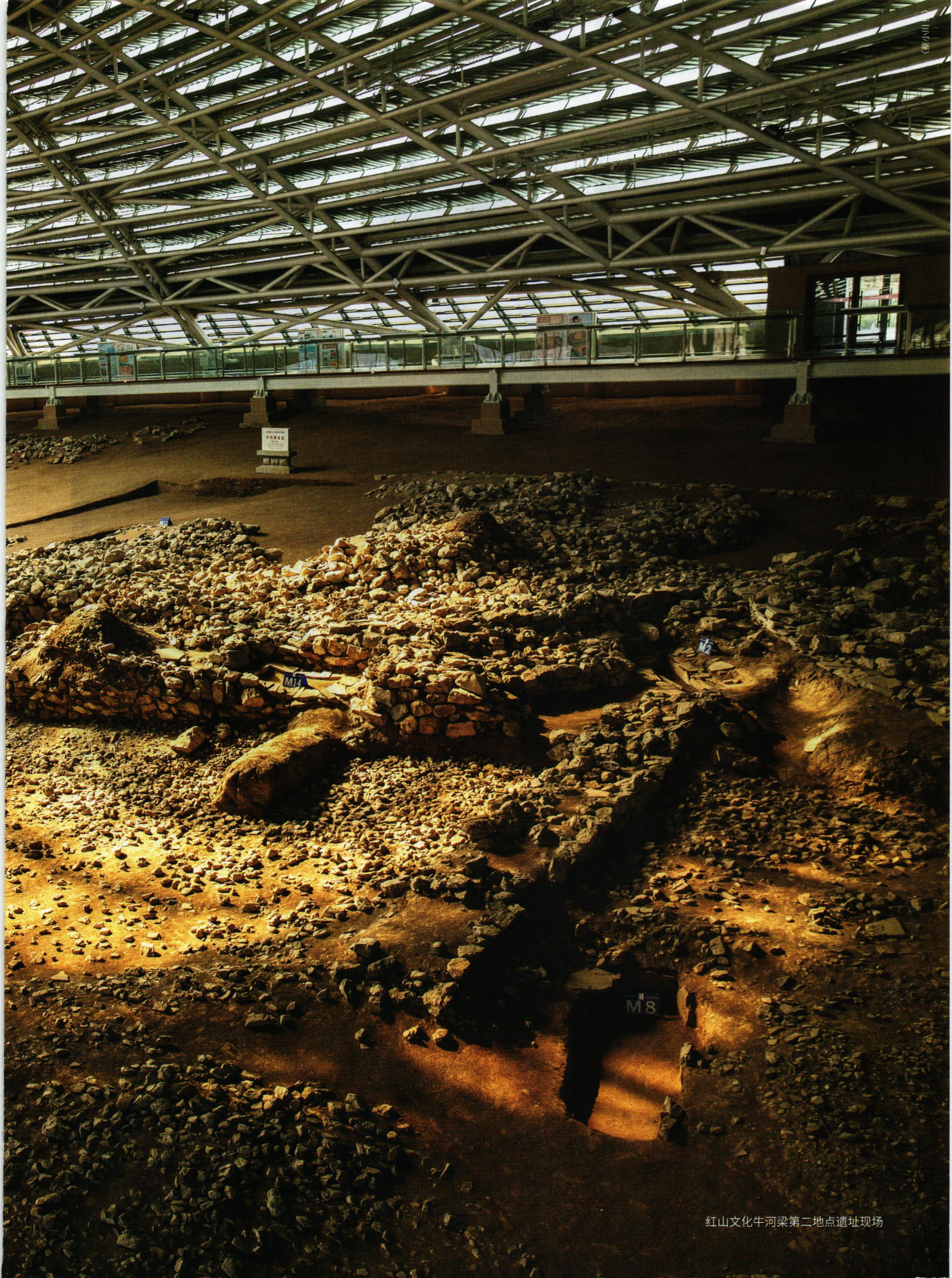
绿柄桑木

Gubi MR01 户外休闲椅以实心绿柄桑木作为框架，座椅和靠背由 90 米长的涤纶绳索手工编织。绿柄桑木是一种坚硬且有弹性的木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美丽的铜绿色调。



玉器时代

红山 凌家滩 崧泽 良渚



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二地点遗址现场


（张雷 摄）

位于太湖山脚下，裕溪河边一块冈地上的凌家滩遗址，是玉器大规模使用之初的一处史前治玉中心

主笔 · 薛芃

玉的使用从上古时代一直绵延至今，从巫玉、王玉到民玉，中国人从没停止过对玉的喜爱。1922 年，现代地质学家章鸿钊最早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存在“玉器时代”。在考古学领域，近几十年又再次提出“玉器时代”，但所指有了改变：世界史研究中，将距今五六千年，即介于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这一阶段，通称为“铜石并用时代”。中国自这一时间节点起，玉器发展进入高峰阶段，至距今 4000 年前后的龙山时代、即青铜器被广泛使用之前，可以单独划分出一个“玉器时代”，与世界史的“铜石并用时代”并列。

在诸多材料中，为什么中国人独独相中这种美石，使其成为最早的礼器，形成中国最早的等级和墓葬礼制？它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有怎样的关联？这是我们这期封面想要了解的核心问题。我们想透过玉器，去看距今 6000 年起，这片土地上是怎样开始交织起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史前社会发生了怎样的跨越式发展？为什么在东部率先出现了繁荣的玉器文化，而西部则在龙山时代才兴起尚玉之风？

东西分野

赤峰市东北部的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内，收藏有不少当地出土的辽代文物。在此之外，另有一件镇馆之物，那是一只筒形彩陶罐，高约35厘米，出土于20世纪70年代，来自距今约55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晚期。跟同时期的红山彩陶罐相比，它算是体量大的。陶罐不是完整器，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在土层中被挤压成了碎片。待考古工作者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罐身上的纹饰才变得清晰。纹饰没有通体附着，只画了大约一半，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突出视觉重心，也有人认为就是单纯的没画完。

陶罐上，上中下三层的几何纹样是非常明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指出，上层的菱格是红山特色，中间一层是典型的庙底沟风格，下层是简化对鸟纹，是庙底沟风格的红山化。这只大罐不是一个彻头彻尾从红山所在的辽西地区本土生发出的产物，而是一个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对撞的结果。

将视野从这只陶罐放大到当时整个中国版图上，它背后的信息更加复杂：距今5000～6000年前，即公元前第四千纪，仰韶在以如今河南三门峡为中心的豫、陕、晋、蒙一带，红山在辽西地区，两个文化之间相互有所交流，仰韶文化深刻地影响到了红山文化。

想象一下当时中国大地上的面貌，在黄土高原这边，村落星罗棋布，村落的人口逐渐从百人升至千人，时间前进的单位以千年计算，再细化一些，可以以500年一计。人们住在顶部金字塔形状的半地穴式茅草屋中。通常，村落会被一个人工修建的壕沟包围起来，有大有小，等级差别明显。他们已经可以更成规模、更胸有成竹地耕种粟黍，也就是小米和黄黏米；能养猪，有更稳定的肉食；他们有一套流水线，烧制和绘制陶器，他们会琢磨，把陶器画成什么样是好看且有意义的。

在辽西地区，大体看来也是这样的面貌。虽然地势比黄土高原低，但辽西地区河流山川纵横，并不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地貌。在红山，彩器的大规模出现是在仰韶之后，但他们拥有仰韶没有的——那些专业化更强的手工业者从山矿中找到与众不同的美石，制作成玉器，尤爱把玉做成动物形，他们更讲究沟通天地的信仰，没有仰韶人那么“务实”，他们中的大祭司会佩戴雕琢绝美的玉器来沟通天地，而不是为了美观，装饰自己。以玉为标识的载体的社会等级的分化在逐渐形成。

如果以现在的地理常识来看，很容易会把仰韶与红山都纳入北方地区。仰韶文化代表着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繁盛时期，它所处的区域，几乎就是黄土高原的区域，红山则是更北的东北地区的代表。视线再南移，黄河流域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又是另一种面貌。以上，都姑且可以看作是北方地区，直至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河姆渡、凌家滩、马家浜、崧泽，以及长江中游的大溪遗址一带，又是两团星罗棋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同样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变得活跃，尤其进入后半叶，是中国史前时代重要的转折期，这些南方地区也都积蓄着一股迈向更高等级社会的能量。

以南北视角来看中国上古时代的遗址分布似乎再合适不过了，沿着黄河与长江，早期文明、早期中国逐渐形成，南北分野与南北纷争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成为一个永恒的命题，也让文化传统的面貌差异很大。那么，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方式去看中国上古的版图？

仰韶文化独居黄土高原，遗址分布是同时期所有文化中最广的，其他几种文化类型，都自北而南地分布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它们各自的辐射范围没那么广且分散，但却可以找到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些族群都使用玉器，他们拥有更相似的宇宙观和天地观。这便是另一种观看新石器时代版图的地理视角——东平原与西高地。

早在将近90年前，历史学家傅斯年就提出过这一假说。1935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指出在东汉以前，中国只有东西之分，进入动荡的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南北之分。这与地理条件关系密切，如果要画出一条东西界线，可以沿着民国那时的平汉铁路，也就是北京到汉口的铁路画一道线，以东是广大的平原，以西则是山区密布。

上世纪20～30年代，“疑古派”学者开始质疑中国上古史中三皇五帝的可靠性，考古材料是他们最好的证据。傅斯年也希望可以提出具有挑战性的学说，他试图拆散原本中国古代史的构架，挑战

传统的“华夏”观，重新思考。地理成为傅斯年转化角度的关键所在，他曾提出一个公式，认为历史是种族与地理相乘之积。《夷夏东西说》的开篇就写道：“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他的“东西说”，落脚点是在夷夏之争与商周之争，至于三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傅斯年并没有说太多，他虽然意识到考古的重要性，不过当时还没有那么丰富的考古材料来佐证这一说法。但是，这个“东西之分”的理论已经为后来的多元学说奠定了基础。

从20年代开始，仰韶、殷墟、龙山的考古发现陆续出来，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时间线逐渐被完善，序列逐渐清晰，中原几乎不受质疑地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东西说”被搁置在旁。

1963年，考古学家张光直出版了第一版英文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数十年中，这本专著都是英文世界里极具权威性的中国考古学著作，1968年、1977年分别再版了两次。在前三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张光直都将中原地区看作是中国复杂社会和王朝文明的发祥地。进入80年代，随着中原地区之外一次次重大考古发现，“中原中心论”的观念也一次次受到考古实证的质疑。在1986年第四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中，张光直第一次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他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到进入三代文明之前，中国的文明进展是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相互作用远超于中原地区的中心作用。

同样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逐渐明确为六大相对稳定的文化区系，它们在中国的上古时代，都各成一体，在时间的纵向坐标轴上，形成了独特的发展序列，但彼此之间又有密切交往和链接；严文明也提出其“多重花瓣说”，他指出中原地区好比花朵的中心，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则像层层花瓣一样共同延续着，但与苏秉琦不同的是，严文明提出的模式虽然也关注周边地区文化的形成和相互作用，但仍强调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领导作用。

总而言之，80年代各地考古的重大发现，让“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逐渐成为共识。

玉器时代

回过头来再看，傅斯年的“东西说”是最初的多元论，虽然这样一分为二的方式已经稍显简单，但在当下，它却提供了一个复杂局面下的直接视角。东平原与西高地有一个重要区别——有玉器和无玉器，玉器就像是那条平汉铁路，将高地与低地分开，虽然东部诸地的文化也不尽相同，但以玉为纽带，可以找到彼此之间很多相似性和关联。

2021年，本刊曾以中国考古百年为引，做了一期重走仰韶遗址的封面。我们采用和以往做考古封面类似的方法，前往重要的考古现场，进行实地的采访和考察，试图将最新的考古进程与过去的认知、研究关联起来，还原出一个更生动的仰韶时代。在这样的设想下，我们几位记者以仰韶时代为时间轴线，以黄河中上游流域为地理上的重走路线，分别前往河南、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内蒙古这几个仰韶遗址分布最多且最重要的省份，去探寻这些地区在仰韶时代的不同面貌，也就是“西高地”的区域。

这一次，我们把视线投向东边，去探访与仰韶文化同时代的东部低地。那么，玉器就成了串联东部遗址时不可替代的媒介。

自北而南，首先是距今约6500年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命名地在如今的赤峰红山后，不过，它分布范围很广，横跨内蒙古东部、吉林、辽宁、河北，遗址点也很多，散落在辽西地区几条大河的周边，这是中国东北出现的第一个复杂社会。为人熟知的龙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一种是“C形龙”，另一种是玉猪龙。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红山文化并不是中国用玉的起点，但在红山，玉脱离了单纯的物质性，它们不再是普通的装饰物，而是有精神性和宗教性的物件，红山的宗教正是一种沟通天地的萨满式原始宗教。

大约同时，凌家滩文化和崧泽文化在长江流域出现，前者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后者则在现在的上海青浦。考古学家一致认为，凌家滩的面貌与红山最接近，其繁盛时期也与红山晚期的时间段有所重合，凌家滩人与红山人都将玉器用于宗教仪式中，他们有相似的玉人、玉蝉，还有龙和猪的形象。一些特殊玉器的形制也与红山极为相近，比如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器型很奇特，是一个中间挖空的玉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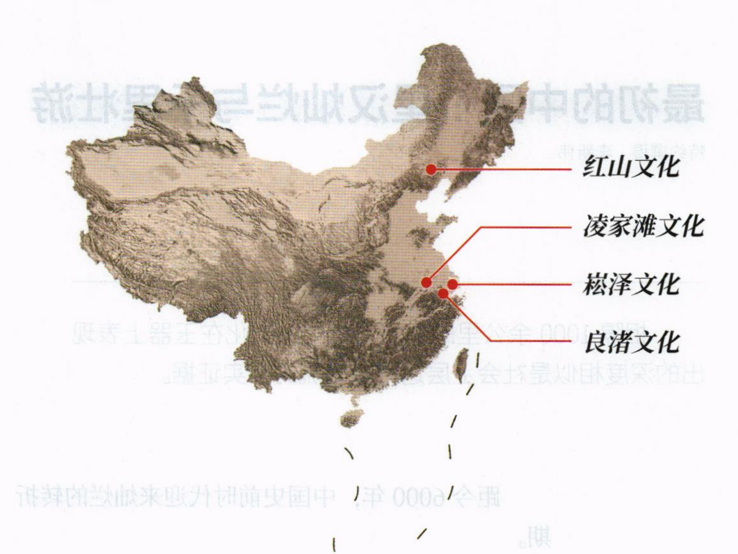
一头是平底，一头是斜口，这个东西在红山发现了很多，而且几乎只有红山有，但在凌家滩的新发现中，也有三件，比红山的略扁圆一些，有一种推断是巫师占卜时用的签筒。种种迹象表明，在凌家滩的阶段，红山对长江下游的影响是强势的。

今年凌家滩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城址和大型环壕的探索成为凌家滩考古新的关注点。一直以来，红山对凌家滩的影响在考古材料中有充分的体现，而反过来，是否有相应的反作用、如何作用、玉的使用是如何一步步南下生根的，这些问题在未来或许会有新的考量。

与凌家滩相近的崧泽文化，也有玉器出现，但却不像前两者那样，玉器蕴含着特殊的宇宙观和宗教力量，成为沟通天地的某种圣物，在崧泽，玉器的使用更加世俗化，多是装饰所用。此外，在崧泽文化最重要的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更引人注目的是墓葬中成套出现的陶器，意味着世俗和丧葬中的宴饮之礼，已经具备后来青铜礼器的雏形。

红山、凌家滩、崧泽文化都是活跃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人类聚落，还包括玉器文化并不发达的大汶口和大溪文化，前者在山东，后者位于鄂西，以及“西高地”仰韶，这些史前文化都繁荣于距今约6000年到5300年的时间段，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前“灿烂的转折期”，文明形成的进程开始加速：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业与手工业分离，并出现了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冶金等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类目分工；社会出现明显阶级分化，出现王权，有些地方神权更胜，有些地方则是军权更胜；人口更加集中，且显著增多，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出现，这意味着高等级权力有能力支配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大型建设。

所有这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表现，似乎都在蓄力，指向早期国家的诞生，也就是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直到约5300年前，良渚文明诞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是崧泽文化的范围，一般认为，良渚人群的主体是崧泽先民，但其信仰肯定是延续了凌家滩，良渚的社会上层，可能来自凌家滩。良渚的先民正是从凌家滩而来，崧泽文化也对良渚的形成影响很大。良渚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玉器，都表明良渚文化已具备了早期的国家形态。玉器到了良渚这里，已发展到史前炉火纯青的阶段，良渚的宗教与红山和凌家滩一脉相承，比较流行的解释是，把兽面纹看作萨满通天的形象，琮是贯通天地的法器。



正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所说，“玉器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元件”，在这一期的封面里，我们想以玉器为线索，把东部的诸文化串联在一起，讲述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国大地上的另一面。

讨论玉器时代，最终还是在讨论文明起源的本质，王权、阶级、礼制、地域观念、宗教信仰都是形成文明过程中的一环。每一件玉器的背后，包括以上提到的所有问题，它的生产依赖于一个有等级分化的大型聚落，这个聚落到达什么程度才有能力规模化生产玉器？为什么是玉器？我们带着疑问上路，从北往南分别踏访红山、凌家滩、崧泽和良渚的考古现场。几千年前，这些地方的面貌差异不大，而如今，它们却因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完全不同。红山的遗址点最多，也非常分散，赤峰市下属的几个旗都收藏有各自的红山文物，要想都看一遍，得跑上几天，在东北与内蒙古苍茫的大地上，每个遗址点之间，都有一段几小时的车程。再看另一头的良渚，位于杭州西北市郊，如今的良渚是杭州充满生气的文艺活动发生地，良渚文化也与年轻人群的城市文化融为一体。在通往每一个考古遗址现场的路上，都能感受到时间与空间交错的错位感，这便是考古的魅力之一，一直在路上，在田野里，在千百年天翻地覆的变化中穿梭游走。

最初的中国：星汉灿烂与千里壮游

特约撰稿 · 李新伟

相隔1000余公里的凌家滩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

距今6000年，中国史前时代迎来灿烂的转折期。

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蓬勃增长：莽莽川谷，处处炊烟袅袅；漫漫沃野，阵阵稻粟飘香。各地史前社会，加速裂变，竞相完成跨越式发展。被苏秉琦称作“古国”的复杂社会组织，如满天星斗，各呈异彩，渲染出“中国式”文明创生的动人画卷。

辽西地区，大凌河上游丘陵连绵的秘境，是红山文化的仪式圣地。三重圆环的祭坛，对应太阳在冬至、夏至和春秋二分的运行轨道，宣示着宇宙秩序。积石冢之下，墓圹凿穿坚硬的基岩，安葬着红山社会的领导者。伴随他们的，是蕴含宇宙观和增强通天法力的玉器。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最“豪华”的墓葬中，经过酸性土壤的千年腐蚀，包括尸骨在内的有机物已荡然无存。但330件随葬品铺满墓室，包括玉器200件，同样多是宇宙观的载体和社会领导者通灵的法器。填土中，是中国史前时代最大的玉器：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身如蚕蛹，獠牙张扬的头部破茧而出，如欲羽化飞升。虽然远隔千里，红山和凌家滩的社会领导者，都以沟通天地的神权为核心，完成古国社会的构建。

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和环泰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大墓中陈列成套的精致饮食之器，玉器仅为装饰，以精细的世俗礼制，规划社会，彰显领导者身份。鼎豆壶觚等陶制器物，成为后世青铜礼器的原型，“郁郁乎文哉”的中华文明礼仪制度，由此滥觞。

曾经亲手揭开尘封数千年的文明遗存的考古人，都体验过初见文明真貌那一刻的震撼。

2006年盛夏，我在豫西灵宝，发掘仰韶文化最繁荣的庙底沟时期的西坡墓地，经历了20多天的紧张和兴奋，终于完成规模最大的M27号墓的清理。这是目前发现的当时规模最大的墓葬，墓圹占地面积17平方米，深度近2米，需要10个壮劳力工作5天才能挖成。更独特的是，整个墓圹用特制的泥填埋，泥中掺杂了十余种植物的枝叶和果实。狭长的墓室，以木板封顶，上面再覆盖麻布。清理墓室前，大家满心期待，会有丰富的随葬品，揭开庙底沟社会蓬勃发展的谜底。但最后，只在墓主脚下发现几件陶器，能够表现其身份的，只是一对以涂满朱砂的麻布封口的大口缸。

这位高1.65米、年龄35岁左右的男性领导者，静静躺在空荡的墓室正中，竟无一物随身。填泥中有野茉莉花蕾的印痕，由此可知，他下葬的时节，正是盛夏。面对他的那一刻，这洒脱的孑然一身，同样让人震撼，更油然生出感动。仰韶文化庙底沟先民，高居第二阶地，以黄土高原的腹心地带为核心，覆盖范围最广，人口规模最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积蓄了最深厚的人力和物力基础，但其领导者竟如此“质朴执中”。他们可以聚集宗族，形成百万平方米的大邑，建设占地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但淡化以奢侈品表达个人身份。《尚书·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方略，隐然已经初具轮廓，如黄土般厚重。

与各地区异彩纷呈的社会发展同样令人激动不已的，是我们的文明第一代领导者们的千里壮游。他们踌躇满志，朝气蓬勃，有着强烈的探索远方、相互交流的欲望。获得远方的新知识和新物品是显示身份和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由此诞生。相隔1000余公里的凌家滩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钺作为权力的

象征物，在各地大型墓葬中普遍流行。西坡大墓中的大口缸，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大型墓葬随葬品中都有发现，摆放位置大体相同，反映了同样的墓葬礼仪。

参与远距离交流的领导者们，采取了亲身旅行的直接交流方式，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交流的内容包括密不示人的、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神秘知识，需要面传身授；第二，对于这些领导者来说，跋山涉水、经历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长距离旅行，是值得夸耀的、一般民众难以完成的英雄壮举，是提高威望的最佳方式。

密切的交流使得各文化区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宇宙观和天下观，逐渐在文化上形成一个整体，那正是历史时期多元一体国家的雏形，被称作“最初的中国”。我们不能低估那些能够组织大规模人力和物力，建造复杂的建筑、绘制生动的彩陶、制作精美玉器的社会精英们的能力和智慧。相信他们在每一次远游后，都会以某种方式记录见闻，勾画最初的“山海经”和“九州图”，展示给本地民众。“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山川形势和物产人文必然成为高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上层的必修课，代代相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授，各地区自然会逐渐形成对彼此共同拥有的、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

文献记载，“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的黄帝，“修德振兵”，征战四方，疆域东到大海，西至平凉的崆峒山，南过长江，北到草原地带。考古资料展示的，是更加壮丽动人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画卷。各地区独具特色的创新发展自成一元，又通过密切交流融为一体。遍布“最初的中国”的“古国”社会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并在各地区的“撞击”中不断迸发新的火花，造就出更具雄心的领导者。

距今530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熔合”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成为“最初的中国”形成后，“熔合”式发展的第一个典型，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实证。玉器的使用日益规范和完备：既有



牛河梁（左）和凌家滩（右）墓葬中随葬的玉人。出土地点相距千里，但深度相似，同样双腿弯曲，双臂回收，双手放在两肩，双目紧闭，凝神进入致幻状态，与神灵沟通。

装饰华美的玉钺，彰显王权和军权；也有琮璧和精雕细刻的“神徽”，展示俯仰天地、入幻通神的宗教特权。以玉为载体的“礼制”，成为良渚王者建立国家制度的重要依托。

放眼世界，唯有中华文明的形成，如此气魄恢宏，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灿然展开。正是因为在如此广大的空间中，经历了各地区的“裂变”“撞击”和“熔合”，方能孕育出完成各地区一体化的宏大政治构想，周人才得以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以分封制，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现实的中国”，创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政体，此后不断发展壮大，绵延至今。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之“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课题负责人。中国在中美地区首个考古项目“玛雅文明科潘遗址发掘和中美地区文明综合研究”负责人。研究方向为中华文明起源和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发表《仪式圣地的兴衰》《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和《“最初的中国”的考古学认定》等专著和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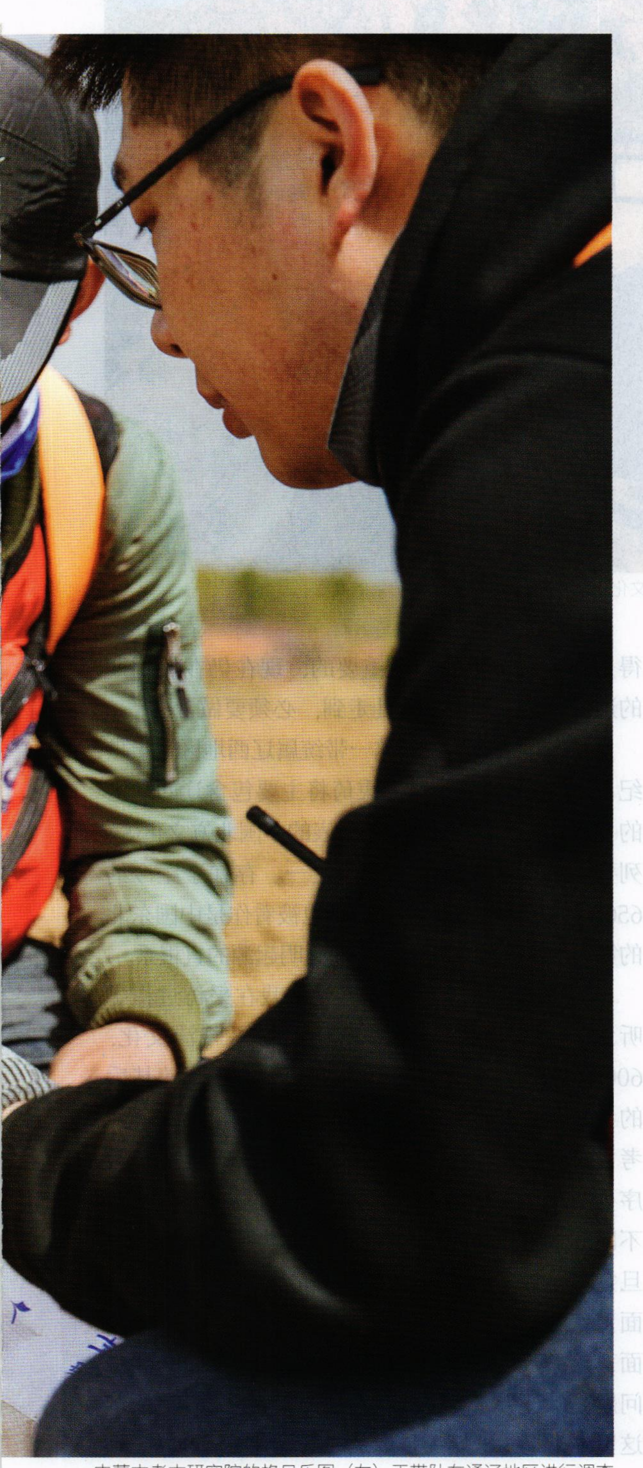
红山：以玉为器，找寻宇宙的秩序

主笔 · 薛芃　摄影 · 蔡小川



距今约6500年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史前聚落，目前中国境内出现的最早的玉器，可以再往前追溯3000年左右。可到了红山人这里，玉石不再只是石，而是“器”。人们把这种美石当作宗教和信仰之物，自此，对玉的使用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和制度的层面。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看红山文化或者玉器时代的诸文化时，总会有一种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切换的穿越感。器物是台前的明星，在这背后，是一个逐渐复杂的原始社会正在走向文明的过程。


内蒙古考古研究院的格日乐图（左）正带队在通辽地区进行调查

规划出一条合理的线路，在几天之内，把红山文化中重要文物和遗址点都看一遍，这件事远没有想象中容易。

单说目前公认的五件C形龙玉器，最知名的碧玉龙收藏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其余四件黄玉龙，一件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博物馆，另有一件是从“11·26”特大盗墓案中追缴来的，现在辽宁省朝阳市博物馆，还有两件分别在故宫博物院和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

国博那只碧玉的，有26厘米长，它摆在那里，是超乎想象的大体量和厚重感。另外几件相对小一些，更显精巧。必须要说的是，这五件C形龙，无一是出土物，前两件有明确的发现地，后面三件已经很难追索它们的出处了。

进入赤峰市内，路灯、桥栏、餐馆、公交站，C形玉龙的图案就像是现代赤峰的图腾，随处可见。翁牛特旗在赤峰市区以北，开车的话，一个多小时。到了翁牛特旗，往北边的戈壁深处再开一个多小时，是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的大批红山文物收藏在那里。东北部的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拥有一只特别的大型筒形彩陶罐。敖汉旗在赤峰市东边，大约又是两小时车程。2012年敖汉旗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陶人，如今盘坐在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它的样子让人想起卢浮宫的书吏坐像，相似的坐姿，相近的时间，位高权重的他们背后都勾连着一个复杂的社会。

赤峰是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之一，下属七旗两县

远眺赤峰红山，英金河从旁流过，但现在已经基本干涸，到了夏天才会有一些水流。红山文化的得名，正是因为红山后遗址的发掘


(受访者 供图)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右）在牛河梁发掘现场

三区，几乎都与红山文化遗址点相关。文物丰富的旗与区设有独立的博物馆，红山之外，辽与元的历史也绕不开这里。赤峰往东到了通辽，南接辽宁朝阳与河北承德，从红山文化的范围来看，遗址点都集中在这一带。但这里地理条件比较复杂，山川河流纵横交错，没有开阔的大片平原，遗址点与遗址点之间道路曲折，实地走起来又觉得是那么分散，即便是重要的、现在仍在发掘期的遗址点，也不可能处处走到，必须要做舍弃。

从地理概念上说，这一带统属辽西地区。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主要包含辽西地区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文化区”列为中国六大考古学文化区之一。存在于距今约6500年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也被看作是中国东北的第一个复杂社会，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直根系。

“远比想象中复杂”，这句话我在采访过程中听到过数次。从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6000年至7000年前的赵宝沟文化，到紧随其后的红山文化，再到后续逐渐衰落的小河沿文化，考古学家一直认为辽西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序列是很清晰的。不过，考古学上的共识总是在不断建立，又不断被质疑。新遗址如何定性？一旦定性是否会影响到对旧遗址的解读？考古学家面对红山文化这张大网，一边编织，一边修补。面对这个庞杂又神秘的史前社会，我好奇的核心问题是：玉从石“进化”为器，为什么会发生在这里？于是，一切还是要从牛河梁开始。

重启牛河梁

在2017年底之前，中国的铁路网上还没有牛河梁这一站。直到京哈高铁修通，专门设立了牛河梁站。这应该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以考古遗址命名的高铁站，它甚至取代了原本属于所在县级市的高铁站名——辽宁省朝阳市下属凌源市。

牛河梁遗址群内的村落都建在河边，地势比较低，而遗址点则在山冈上，地势高。由于地处辽西山区，位置偏僻，一直是历史视野里的盲区。明代长城自山海关起绵延向西，牛河梁遗址群甚至几乎整个红山文化区域都在长城以北，边外的地缘因素，意味着清代以前在这里定居的村落不多。

5000多年来，原始的地貌没有太大的变动。早年间修建了一条公路和铁路，再后来，为了保护遗址，牛河梁最重要的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盖起了两座大棚，把遗址点罩起来，周边建了停车场和其他零星人工设施，整个大遗址的历史地貌多了一些人工痕迹。

4月末，山上常起风沙。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工地现场，今年的发掘还没有正式启动，有几个当地的工人在做准备工作。红山区域其他几个遗址点的发掘，也要到5月后才开始，进入下一个新的周期。

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



1. 赤峰红山后，2. 翁牛特旗三星他拉，3. 巴林右旗那斯台，4. 围场下伙房，5. 敖汉下洼，6. 葫芦岛沙锅屯，7. 阜新胡头沟，8. 喀左东山嘴，9. 牛河梁，10. 半拉山，11. 小河沿

眼前的工地，是一幅少见的考古现场的面貌。一片密密麻麻的松树丛林里，树都算不上是年老的，树干大约十几二十厘米粗。在连片的松树之下，风沙倒是小了些。大块山石成堆垒着，七零八落地裸露在地表。

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郭明的指点下，我才恍然意识到，有些石块的堆叠呈笔直的直线，是明显人为堆砌的痕迹，可有些地方依旧看不出什么规律，混乱地铺散着。在树丛和石碓之间，探方反而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为了避开树与石，很多探方都不是完整的，不像平日里见到的考古现场那般，在平整开阔的土地上，齐齐整整地排着一些探方。这里的地况看起来要更复杂。

2017年，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导，重启牛河梁的发掘。从2020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接任领队。今年，已经进入了重启发掘的第六个年头。遗址位于山冈上，南边紧邻着“女神庙”。上世纪50年代末，山冈上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造林的时候，还不知道下面有遗址，直到现在，不断生长的根系还会伸展到土地下埋藏的石墙里。就这样，遗址本体遭到了一定的自然的破坏。大片树林遮蔽着遗址，无人机航拍也会受阻，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缺少了鸟瞰的“上帝视角”，要想把具体的遗迹点联系起来，难度加大了很多。

在现在发掘的区域，遗迹都是土石混筑的。“如果是纯土遗址，或是纯石遗址，都要好办些。土石混筑的话，原先的很多经验就不适用了，尤其是在判断遗迹‘叠压’或‘打破’的关系时，是非常难的。”贾笑冰解释说。

简单来说，所谓“叠压”，就是时间晚的房屋或墓葬建在了时间早的上面，叠了两层；“打破”就是较晚的建筑物破坏了较早的基址，一个坑开口是完整的，一个不完整，不完整的通常更早。在发掘土遗址的时候，这两种情况都很常见，很



牛河梁第一地点山台台基发掘现场

好判断不同坑的时间先后。到了石遗址这里，时间先后没那么容易定性。通常来说，用石头修一所房屋，会出现在一间基础上进行扩建的情况，时间早的空间就是完整的，时间晚的空间，其房形是不完整的，需要依靠在一面早期的墙上来进行新建，这种情况叫作依存关系。

面对眼前土石混筑的遗址，既有土，又有石，判断遗迹的早晚关系会更加复杂，既要去看土层的关系，又要参照石遗迹早晚关系的判断标准。一边是客观的自然条件受限，一边是复杂的土石混筑结构，这两点困难之上，还有第三点：由于是距今5000多年的建筑遗址，又非普通统一化的居住聚落，这是一处大型的特殊建筑，在修建的时候"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随机性较大，有的墙体可能依地势而走，就顺着台基或某个边缘去深入发掘，但是探着探着可能就没了"，找不到规律。

那么，这到底是一处怎样的建筑？又为什么用这么多大石块建成？

20世纪80年代，牛河梁进行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发掘，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出现，精美玉器的随葬，意味着这里曾是一处高规格的宗教仪式场所，很可能就是红山文化晚期最高等级的埋葬和祭祀中心。当时，发掘领队郭大顺和孙守道共同确认了牛河梁遗址群的16个地点，第一地点即女神庙所在区域。重启发掘的区域，也属于第一地点。

老先生们把第一地点分成了四个建筑址，女神庙是1号建筑址，眼前这片台基建筑群工地是2号，3号在女神庙东80米左右，发现了很多陶筒形器残片，叫陶片窝，4号则是东北一处近80平方米的大房屋基址。2号建筑址紧邻1号，如果把女神庙看作祭祀的一个核心场所，那么搞清楚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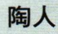
牛河梁第二地点积石冢墓

鸮形松石饰件

出土于朝阳市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现收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绿松石质，片状，分两层，做展翅状，鸮形体形较小，高 2.4 厘米，宽 2.8 厘米，厚 0.4 厘米。

绿松石器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出现时间晚于玉器，作为装饰品，绿松石器自然会受到玉器制作和使用上的影响。因为原料个体较小，早期的绿松石一般只见串饰。到了仰韶时代，绿松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发展的繁盛时期，更多地点发现有绿松石器，种类更多，加工也更精细，而且如陶器、玉器一样，绿松石器也经历了一个礼器化的过程。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陶人

2012 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工作者抢救性发掘出这尊约 5300 年前的整身陶人像，现收藏于敖汉旗博物馆。敖汉陶人是由考古人员找到的 65 片陶片，复原成一尊整身陶人的。陶人显现出男性特征，他头戴盘索冠盘腿而坐，两眼圆睁，呈张口交谈或呼喊状，右手握着左手腕放在脚上。经测量，陶人高 55 厘米，是发现的最为完整、最大的中国史前陶塑人像之一。目前，敖汉陶人被认为是巫师、家族祖先、受人尊敬的酋长或族长等身份，或集多重高等级身份于一身。

号就很重要。

2 号建筑址，是一片大面积的山台台基。按照现在的编号，由 8 个台基构成，在最新的发现中，9 号台基也显露出来；原先确认的 4 万平方米左右的面积，现在已扩至 6 万多；原先认为女神庙与台基是两处独立建筑，现在证明女神庙是建在台基之上的，二者本是一体。

想象一下，在 5000 多年前，这是一个壮观的场面：在一块相对开阔的山冈上，先民们用大块山石，垒砌出山台。目前看到的 9 座台基，不是分别单独摆放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一层一层往上接续的，一个台子压着一个台子，向上叠累。如果要找一个形制相似的古老建筑体作类比，有点像印加文明马丘比丘的阶梯式建筑群，不过后者是 15 世纪的产物，也更高级。

在考古人员的清理下，山台的建筑模式逐渐显现。红山人会先把山体的基岩稍作处理后，垫一层土，再铺上一层碎石，再夯一层土，有些地方会砌石头整齐地封边。总之，就是一层碎石一层土向上叠加。贾笑冰指出，这种做法可以在北宋年间成书的《营造法式》中找到记录，其中记载，这是修筑台基的一个基本技术标准，而目前发现的最初的原型，就在牛河梁这个红山晚期的台基建筑上。

站在山台上向远望去，是连绵起伏的山丘。其中有一处山，最是显眼，考古工作者们认为远看像猪，也有说像熊的，其实这是由三座山头组成的，无论是像猪还是像熊，都是红山人眼中神圣的动物象征。在古老的原始聚落遗址附近，似乎总会出现一座形状独特的山，不知当时的人是怎么想的，至少现在的人都会给它们赋予“圣山”的浪漫想象。红山也不例外。但无论如何，这幅



（视觉中国 供图）

郭大顺，红山文化考古学家，先后主持了小河沿、石棚山、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后及红山文化时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壮阔的景象，是红山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出来的场景，他们从四面八方会集到这里，面天，对地，敬神，祭祖。

从积石冢到祭坛

当这片盛大的砌石建筑遗迹出现在眼前时，自然会联想到不远处的牛河梁第二地点，那也是一大片复杂的石块堆叠。1983年初冬，第二地点开始发掘，积石冢墓地和祭坛逐渐显露出来。

其实对这片区域的发掘，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找玉器去的。因为早年间的田间耕种，有农民发现个别玉器，后来辗转流落到海外，人们一直以为这些是商周时的古玉。

此前一两年，位于朝阳喀左的东山嘴遗址，最先出现了石堆祭坛。在东山嘴，北边是方形基址，南边则是石圆圈坛址。这时，郭大顺已经意识到这种砌石建筑的宗教性，应该是一处具有祭祀功能的遗址。在后来的思考中，他观察到，包括祭坛在内的砌石建筑，以南北轴线布局，南圆北方，左右堆成的新的建筑形式，远不同于所知史前居住址的那种向心式或成行排列的情况。

虽然有了东山嘴的经验，但在面对牛河梁的时候，依然棘手。“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发掘和研究对象，它极具特点，又很难‘对付’。”现任辽宁大学考古系教授的张星德，1984年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就跟随郭大顺和孙守道，参与到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中。当时泥塑女神头像刚在第一地点被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女神庙，反倒是第二地点，还没太多头绪。

张星德记得，她刚到第二地点的时候，还是最原始的样貌，表面全是“封土积石”，看不到下面的墓穴，完全被石块封得严严实实，因此很不好判断墓圹的位置。这些是典型的积石冢：红山人先把山冈上的地面修整一番，然后挖出墓坑，墓是由较扁平的石板块垒砌起来的，中心砌一座大型的石棺墓，南侧边缘部位砌数座小型的石棺墓，之后在石棺墓的上面再堆放石块，看起来就是一个山包的“冢”状。但5000多年过去，覆在上层的石块也很杂乱了。起初清理时，他们试图把每一个石块编号，想着如果出现什么失误，还能按照标号把石块放回去。后来发现，这样做根本不可行，石块一旦取出，每一块叠放的角度就会错位，不可能再复原了。

如今的第二地点上，盖着一座非常现代的大棚，造价不菲。顶棚像百叶窗一样，不影响光线透下来。阳光照射下，东西两侧分布着冢群，中间则是圆形的三重石坛，都是由大石块堆砌而成，蔚为壮观。每座积石冢都有固定的冢界，又自成独立单元。一冢多墓，以石板和石块砌筑石馆，有中心大墓，也有相对较小的墓。

郭大顺说道，如果要说这些积石冢与随葬玉器最大的特点，便是“唯玉为葬”，墓内一般只葬玉器，或无随葬品，几乎没有看到随葬陶器，尤其是随葬玉器较多的大型墓中，没有见到任何陶器的迹象。

陶器不在墓内，却在地表。紧贴着冢上的石砌台阶上，大量的陶筒形器成排摆放，有彩绘，但没有器底。这意味着这些大型陶器并不是实用器物，它们也许是帮助划清冢界，也许是“起到保护塚顶封石和边侧石砌台阶不致塌落”，像坝一样。这些筒形器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底部，因此是“上下贯通”的，而上下贯通恰与史前人类信仰的沟通天地的祭祀内容相吻合，这甚至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也能相互呼应，有的筒形器上发现刻画符号，这也暗示着它们的非功能性。所以，遍置于积石冢上的这些陶筒形器群，应该也是一种祭器，

或许可直接叫它们“陶琮”。

贾笑冰指出，牛河梁积石冢的数量较多，在很多地点均有发现，其中二、三、五、十六地点经过了系统发掘，关于冢的概念也略有变化，最初将“以石筑墓、以石垒墙、以石封盖”的遗迹称为积石冢，第二地点的圆坛最初也被命名为冢，后来因为其中不见墓葬且可能与祭天有关，被单独区分出来。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积石冢概念的使用并未如此严格，积石冢所代表的是有较为明确的积石范围的埋葬区域。

三重圆石坛处于冢群中间，考古学家认为这里是红山人祭祀礼仪的最高等级场所之一。依旧是由石块堆砌而成，自内而外的三重原型，石块已经不完全了，考古学家根据残存的部分复原出当时的面貌，三重圆的直径分别为：内圈 11 米、中圈 15.6 米、外圈 22 米。

根据天文考古学家冯时的研究，三重圆的位置分别代表冬至、春秋分和夏至日地面上所观测到的太阳的运行位置，三环石坛既是反映天象的设计，也是祭天的圆坛。冯时指出，石坛的外衡直径是内衡直径的 2 倍，也就是说外衡周是内衡周的 2 倍，这说明冬至时太阳周日视运动的路径和线速度应为夏至日速度的 2 倍，这一现象与《周髀算经》的记述颇为一致。

这个结论，对于认识红山文化的原始宗教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红山人的宇宙观不再只是抽象的天地崇拜、天圆地方这样的概念，而变得很具体。冯时在他的研究中，还列举了凌家滩出土的一件三环玉璧，时间大约在距今约 5500 年至 4600 年，可能与牛河梁三重圆石坛所处的红山社会晚期相重合，或是更晚一些，这两者甚至与古巴比伦发现的星图也有相似之处，直到后世，北京天坛也是类似的三重圆祭坛，这种圆形祭坛即是祭天所用。所有这些，都指向人类最古老的宇宙学说。

牟复礼在谈到中国古代宇宙观时说：“真正的中国宇宙论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自然生发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红山人采用了一种以沟通为主的萨满式原始宗教。

在面对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宏大的石构遗迹时，还有一点，考古学家提醒了我们：红山人对石材已经有所认知。比如第一地点，大部分石头是本地的基岩，也就是山冈上原有的石头，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白色的石灰岩，目前在第一地点的山体并没有发现同样的白色石灰岩，最近的是在牛河梁南边的一处山体。可以想见，红山人动用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从另一座山搬运石头过来，用做建筑材料。这可能意味着，用不同的石头有不同含义，也可能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两种石头具有不同性状，在建筑搭建时，有不同功用。而在第二地点的三重圆石坛，围成圆坛的石头也不是普通的山石，而是一种特殊的六棱形石柱。这种六棱形石柱在周围的山上都没有，最近的出现在十几公里之外的沙海。这就说明，红山人对石头的使用是有所区分的，他们会远距离运输不同石材，来完成自己的建筑设想。

宇宙观念与修建大型建筑的能力都说明，红山人的世界远比想象中复杂。

唯玉为葬

既然在红山文化核心祭祀区的高等级墓葬内，玉器几乎是唯一的随葬品——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是玉——那么为什么是玉？

直到 2019 年，人们都将兴隆洼遗址中出土的玉器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玉器。兴隆洼遗址在赤峰市敖汉旗境内，也属于红山文化覆盖的区域，但时间整体早于红山早期约 2000 年。它也被看作红山玉文化的前身。

位于内蒙古境内西拉木伦河北支附近的南台子遗址，是一处红山文化中期遗址，发现的墓葬多为普通的社会成员墓，主要随葬陶器和石器，玉器数量较少，但发现一对兴隆洼文化典型的玉玦。玉玦是一种耳饰，通常是环形，有个小缺口，是兴隆洼文化中的重要玉器。佩戴玉玦的习俗至牛河梁积石冢阶段已基本消失，这时已到了红山文化的晚期，66 座墓葬中仅出土有 1 件玉玦，且由玉璧改制而成，放置于墓主人胸部。从兴隆洼到红山，玉器的品类发生了变化。

从 2015 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开始对黑龙江省



（黄宇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

的小南山遗址进行第五次正式发掘，小南山在双鸭山市，乌苏里江的左岸。在这几年的发掘中，出现玉器120多件，包括玉玦、玉环、玉管、玉珠、玉璧、匕形玉佩、觿形玉佩（弯条形器）、玉锛和玉斧等。经过碳14测定，这批玉器大约距今9000年。

小南山玉器的发现，将中国最早玉器的时间轴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有意思的是，不但时间前移，地理坐标的纬度也在上移。越是往北，发现的玉器时间越早，品类也越单纯且实用，都是些几何形的佩戴物，没有后来那些复杂的人形或是动物形。

古玉考古学家邓聪的研究，一直在追溯玉器出现的源头。他认为，东亚玉器的出现很可能与现代智人的形成有所关联，最早的玉器也是现代智人行为的一种表现。从考古材料上看，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玉器，出现在东北亚旧石器时代从中期转向晚期的阶段，约距今4万至3万年间。但目前在中国境内，小南山玉器是已知最早的玉器。

虽然碳14显示为约9000年前，但仍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小南山的这批玉器并没有那么早，甚至晚于兴隆洼，最早大约是7500年前的产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就是持反对意见者，除了对测年的质疑，他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如果说兴隆洼玉器受小南山影响，那么小南山不仅应该向南传播，理论上来说也应该向北传播，但目前在远东地区、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证据尚不充足。无论如何，在红山文化之前的玉器，仍多是装饰性的，且体形较小，多佩戴在身上，或是做成缩小版有象征性的仿形器，比如玉锛和玉斧。

玉为什么重要？因为玉是通灵的，有灵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指出，在这一点上，中国祖先和位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有相似之处。玛雅先祖认为，绿色的石头凝聚了生命的能量，因为植物是绿色的，意味着生命，所以对他们来说，天然的绿色材料都很珍贵。在中美地区，没有像中国这样的绿色的透闪石，但他们会使用翡翠，同样是绿色的珍贵石材。

在这一点上，邓聪也做过研究，他指出这是一种颜色象征主义，古老人类社会会赋予颜色以特殊含义，中国如此，其他古老文明也是这样，颜色是我们理解古代精神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他将兴隆洼文化中对玉器的重视，解读为当时特殊的植物宇宙观。植物宇宙观，在玉器的精神层面上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延续到红山，这种观念依然存在，绿色的玉象征着生命和力量，具有通灵的力量，这也与他们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信仰相契合。

目前通过正式考古调查和发掘，共发现红山玉器300余件，其中牛河梁遗址发掘出土183件，

采集13件，是其中最多的。在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积石冢群里，墓的形制和位置都有等级之分，但有意思的是，玉器随葬的数量多寡与墓的等级并没有直接关系，并不是越中心的大墓，出土玉器越多。而且从普遍平均数量来看，即便是中心大墓和大型石棺墓，一般也不超过10件，这似乎也与大规模、大体量的积石冢不成比例。

但在郭大顺看来，这恰恰反衬出随葬玉器的分量更重，“这些玉器主要不是财富占有的显示，也不限于表现等级差异，而是自有其特定的实用功能，就是作为通神的法器”。在红山人的世界里，财富、军力、等级可能都不是身份地位高下最重要的因素，是否具备与天地神明沟通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红山人在表达人与人关系变革时，重精神因素远在物质财富因素之上”。

相较于数量，玉器的组合关系更为重要。比如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及独特造型的玉器形成一种较固定的组合关系。“在大型石棺墓内随葬，只有勾云形玉器或斜口筒形玉器的墓葬仍有较高等级，而小型墓则主要随葬璧、环类玉器或以环为主的单一器类，有的甚至不随葬玉器。这种严格的等级划分，是玉礼制系统出现的证明，这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年代最早的礼制形态，也是红山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考古依据。”刘国祥解释道。

走进人的世界

看红山文化，我总有一种感觉，不断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切换。因为很多现实中的事物进入原始宗教体系中，就成了象征物，具有另一重含义；而回到现实，它又成了身边之物。

红山玉器中主要有两种龙，C形龙和玉猪龙。有学者认为，这两种龙虽然形态不同，但头部都有明显的猪的特征，也有人认为是熊，叫它“玉熊龙”。我们暂且还是把它看作猪，这在红山文化中是个有趣的存在。去不同博物馆看红山文化，总会下意识地去找有没有玉猪龙，是精巧的好看，还是那个拙气更重的有意思些。

以冯时站在古代天文学角度的解读，这种猪形玉礼器是北斗的象征。在各地遗址出土的玉猪龙中，最大的约长15厘米，最小的仅4厘米。身体蜷曲如环，大圆眼睛，有的有獠牙外露，几乎每一个背部都有钻孔，说明是可以悬挂或佩戴的。在其他器型上，也出现过猪的形象。甚至最有名的一个，出现在远在凌家滩遗址的那件著名玉鹰身上，鹰的翅膀便是两个猪首的样子。

在牛河梁第二地点4号大墓中，仅有三件玉器随葬。一件是斜口筒形器，枕在墓主人头下，另两件是玉猪龙，并排倒置在主人胸前。冯时认为，这两件玉猪龙是“巫官交通天地的道具，他具有掌握天极和北斗而敬授人的职能”，这也是猪的形象的意义。

另一方面，真实的猪在当时是怎样的存在？一些考古材料表明，在兴隆洼时期已经出现了猪的驯化，曾出土过两件完整成年猪骨架，一雌一雄，从出土的骨骼来看，在放进墓葬时，猪腿似乎被绑在了一起。这是墓葬中发现较早的完整猪骨，以猪随葬，在后来北方新石器时代成了一种流行的墓葬方式。或许是因为把猪作为图腾崇拜，又或许是对富足的显示，很难去揣测了。

很多人认为，红山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农耕社会，但在郭大顺看来，红山社会是一个渔猎社会，在东北亚一带，玉器的起源也与渔猎文化密切相关。红山社会虽然有较发达的农业，但渔猎和采集仍很重要。在渔猎生活里，人类的行为模式是受动物影响的，哪里有动物聚集，人类就要随之迁徙或是改变生活方式。而农耕文化依赖土地，土地在那里，种什么庄稼就会一直种，除了基本的家畜，对动物的关注度也就没那么高。在渔猎社会的生态下，人们更容易将动物作为崇拜对象，打制出大量鸟、鹰、鸮、蝉、蚕、龟、熊、猪这些动物形玉器。

牛河梁是红山文化的宗教中心，这几乎不受质疑。但这里没有发现居住村落，目前所有的村落遗址都散落在辽西大地上，也许在这个文化中，日常生活与祭祀崇拜是有明确界限的。

在从赤峰到牛河梁的路上，拐个弯，能分别经过两个遗址——魏家窝铺和马鞍桥山，考古学家经常把这两处遗址放在一起比较着看，因为都

是红山文化早中期的聚落遗址，都位于高处的山岗上，成片的住房依次有规律地排开，这是红山先民真实生活的地方。和仰韶人很像，红山人的住房也是半地穴式的，房屋向下开口，一个短门道之后，是单体的房屋内室。在马鞍桥山村落的边上，领队樊胜英发现另有一片小型的祭祀区域，这意味着，对于红山人来说，祭祀可能也是一件日常的、身边的事。

从陶器特别是彩陶的发生来看，红山跟仰韶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同时存在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两种文化，仰韶对红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红山有没有影响到仰韶，有多大影响，一直很难找到证据。

在最近几年的考古新成果中，红山文化的半拉山遗址中，发现了一件玉熊首形器，这是个典型的红山器物；另一边，仰韶文化的苏羊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非常相似的石雕。这或许是一个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上层社会之间的交流的案例，交流是发生在两种文化腹地的，而不限于边缘地区。

至于红山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张星德试图从人种的方向去进行解释，这也是她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在她看来，辽河上游一带，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辽西地区，这里的土著居民使用筒形陶罐；燕山以南地区，则是一批使用陶盂和陶支座组合或陶鼎的居民；在黄河中游地区是以使用小口尖底瓶为特征的居民。他们分属于远古中国北方三个最重要的族群集团。这三个集团，在距今6500年开始不断碰撞、融合，最终汇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红山的面貌。红山文化孕育和形成的过程中，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仰韶文化的彩陶进入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就不会形成。

女神头像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这件红山女神头像高22.5厘米，面宽16.5厘米，出土于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女神庙”，现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眼珠——由两枚圆饼状玉片制成，直径2.5厘米，正面凸起抛光，背面平齐且有加工条痕。有趣的是，背面正中像图钉一样琢出一个短钉，使得玉片能够牢固地嵌入眼眶。

女神头像是一尊塑泥像，塑泥为黄土质，有较大黏性，掺草禾一类植物，没有烧制。内胎泥质较粗，捏塑的各个部位为细泥质。外皮打磨光滑，出土时颜面呈现鲜红色，眼眶、面颊尤显，唇部涂抹朱色。女神头像后半部分断裂，但是较为平齐，研究人员推断，这可能是因为头像依附于墙壁上所致。在头后断裂面中部，能看见一个竖立的木柱子痕，直径约为4厘米，由颈部直通头顶。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这样评价：“女神”是由5500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和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回到女神庙

张星德意识到要跳出红山，从外围的视角去看红山人群的形成，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红山文化中出土了很多人物或人体塑像，有穿着衣服的很抽象的人物，也有裸体的具象的，他们形象各异，虽然很难真正分辨出样貌和体形，但这让她意识到，红山的人群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复杂的聚合下诞生的。

在看到从女神庙出土的人体塑像时，的确让人惊叹。虽然都是一些残部件，人体的手、耳、腿、躯干，又或是女性的乳房，但从这些细部的写实程度，已经可以想象得出，原本那个完整的塑像会是多么逼真，它们甚至还有彩绘的痕迹。有意思的是，这些零星的残件，并不都是真人大小的，而是有大有小，最大的一只耳朵有真人耳的三倍大，小的则如拿在手上的把件。而在看到牛河梁女神庙之前，发掘者已经在东山嘴发现了孕妇小雕像，没有头部，但有明确的乳房，双手交叉在胸前，腹部鼓起，背部有更细的加工，甚至特别突出了腰部的曲线。这样的小雕像，不止一件。

女神庙，也有类似小雕像。

1983年秋，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女神庙被发现，就在如今第一地点山台发掘现场的南边。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遗址时，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它真的是一座神庙吗？为什么如此小，又如此不规整？中间最窄处大约只有两米，这是一个看似有些逼仄的空间。

据测算，这个基址南北长25米，东西最宽处9米，窄处2米，再往南边，还有一个单独的小室，总面积约75平方米。房屋结构很不规则，像是一个跪坐的人形。但就是在这个空间里，发现了轰动全国的女神头像，还有诸多泥塑、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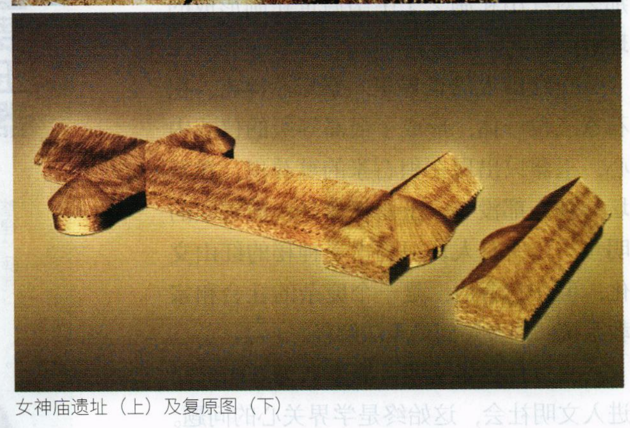
郭大顺回忆道，那几天，接二连三发现人塑像残件，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有一种预感，会有更大的发现。直到这个真人大小的头像露出地表，“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语，似流露着经漫长等待后又见天日的喜悦”。头像颧骨凸起，眼斜立，鼻梁低短，圆鼻头，上唇长而薄，且有朱色，这些都是蒙古人种的特征。

张星德记得，女神头像被挖出来时，现场的人激动坏了，又无法解释这个东西。他们很快带着头像，去找当时正在疗养的苏秉琦，“苏先生看到头像，不是那种看见神的敬畏感，他觉得很亲切，好像很多年在寻找答案的问题一下都打开了扣锁”。他认为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这个泥塑的头像，如今被收置在辽宁省考古院的库房里。因为是泥制品，即便被烧制过，有一定的硬度，但历经过5000多年的时间，它已经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材质变得非常脆弱。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件国家一级文物，它只能被放在那里，几乎不对外展出，甚至不能被取出库房。

80年代那一次对女神庙的发掘，并不是正式的发掘，而只是一次试掘。当考古人员清理出这些泥塑时，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再这样挖下去，很可能会是一种破坏。因为是泥塑，就像女神头像那样，即便是烧制过，但常年封存在泥土里，并不容易取出，材质非常脆弱，他们形容这种状态叫“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掘后，考古工作者已经大致知道了下面的情况，因此决定停工，不再继续发掘。





女神庙遗址（上）及复原图（下）

有关这座建筑的性质是不是神庙，至今学界也难持统一意见。有一个观点认为，这是一个类似仓库的地方，人们把祭祀所用的器物都储存在这里，待到用时再搬出去。但就现有的试掘材料，郭大顺非常坚定地认为，这就是神庙，而且是女神庙。他给出了几个理由：一是这个房屋基址虽然小，但结构很复杂，当时的房屋都是单体空间，他记得第一次看到龙山时期的“吕”字形双体空间时，都觉得“好高级啊”，而女神庙是由七个方形空间构成的复杂空间，这在5000多年前，对建筑技术是极大的考验；其二，在房屋内部，发现了一些残损的彩绘壁画，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壁画，虽然没有具体的形象，但赭红、黄白的几何抽象的图案也足以说明，此处具有祭祀功能；此外还有一些仿木建筑构件的出现，也证明这是个高等级建筑；更重要的证据依然是女神头像和诸多人体塑像的残件，三倍真人大小的耳朵说明，这是一个超大型人像，这种体量的人像直至现在，也依然是具有神性功能的偶像崇拜之物；除了人像，超出真实大小的熊下颌泥塑头像、鹰翅泥塑

都意味着，祭祀的对象不仅是人，还有动物，而这个人有可能是先祖的形象。

回到女神庙，站在大棚的楼上就可以看到下面松树丛覆盖的探方，随着石构山台台基逐渐变得清晰，贾笑冰和他的团队也在台基边角处新发现了与祭祀礼仪相关的器物，是一套燎祭、祼礼和瘗埋的遗迹，恰与《周礼》中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示的礼仪记载相吻合，如果这个推导成立，那么对红山礼制之于中国后世礼制形成的理解，也就又推进了一步。

在红山人的世界里，祭坛、神庙、积石冢三位一体，形成了最高等级的仪式中心，玉器只出现在积石冢的墓葬里，在祭坛与神庙都没有。玉器就像是台前耀眼的明星，让所有人认识到古老神秘的红山文化，但在它背后，是一个庞杂的社会和宗教系统，很多疑问仍无法解释。

究竟什么是文明，能否认为红山已经进入文明社会，这始终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如果以西方界定的文明三元素——文字、城市、冶金术来看，中国历史进程中只有到商代才完全符合这个标准。但是中国的学者一直在提出"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李新伟认为，文明应该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一般会有国家这样的政体出现。国家出现一般会有文字记载，如果早期没有文字，可通过考古学家辨认的物质形式来证明。二是文明是文化共同体的出现，美国的亨廷顿也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文明进程会大大提前。

在采访过程中，我也问过几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有关文明界定的问题。方向明认为，文明界定的标准可以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我们是在研究几千年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演变；郭大顺说，"文明在于传递"，他更相信能够延续下来的是文明。

红山文化 重要玉器

整理·薛芃



黄玉龙

现收藏于翁牛特旗博物馆，高约19厘米。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北天门肖家屋脊也都有类似的玉龙形象。

碧玉龙

1971年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玉龙高26厘米，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有獠牙，鬣鬃飞扬，躯体蜷曲若钩。背部有对穿单孔，以绳系孔悬持，头尾处于水平状态。这件红山文化玉龙是国内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龙形玉器，它的出土标志着早在5000多年前西辽河上游便已形成了对龙的图腾崇拜。

玉猪龙

这件玉猪龙由辽宁省博物馆从朝阳市建平县征集而来，高15.7厘米，宽10.4厘米，厚4.3厘米，通体呈鸡骨白色，局部有黄色的土沁，器身蜷曲，首尾相连，造型粗犷，为目前已知红山文化玦形玉猪龙中形体最大、形制最为规整的一件。白色蛇纹叶岩，肥首大耳，圆睛，吻部前突，口微张，有獠牙。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也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其短立耳、圆睛的特征与熊相似，应称之为熊龙。红山萨满将熊龙玉雕系挂在衣服上，是借着熊神果敢、勇猛、神力无敌的特性，增加自己的法力。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玉凤

出土于牛河梁第十六号地点中心大墓，出土时枕在墓主头下，现收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玉凤呈淡绿色，长20.4厘米，器体呈板状，近似长方形，中部略鼓，周边较薄，身体各部位用阴线雕出。有正面、背面之分，背面无纹饰，正面凤体呈卧姿，回首，弯颈，高冠，圆目凸鼓。翅羽和尾羽占据凤体的绝大部分，翅羽上扬，分成三道。玉凤造型构思巧妙，工艺精湛，是红山玉雕技术高度发达的代表性器型之一。

玉凤目前仅有该墓出土一件，另在第二地点有一件玉凤首出土。这件玉凤应具备独特的标志性功能和特定的专属性，其造型对西周玉器有一定影响。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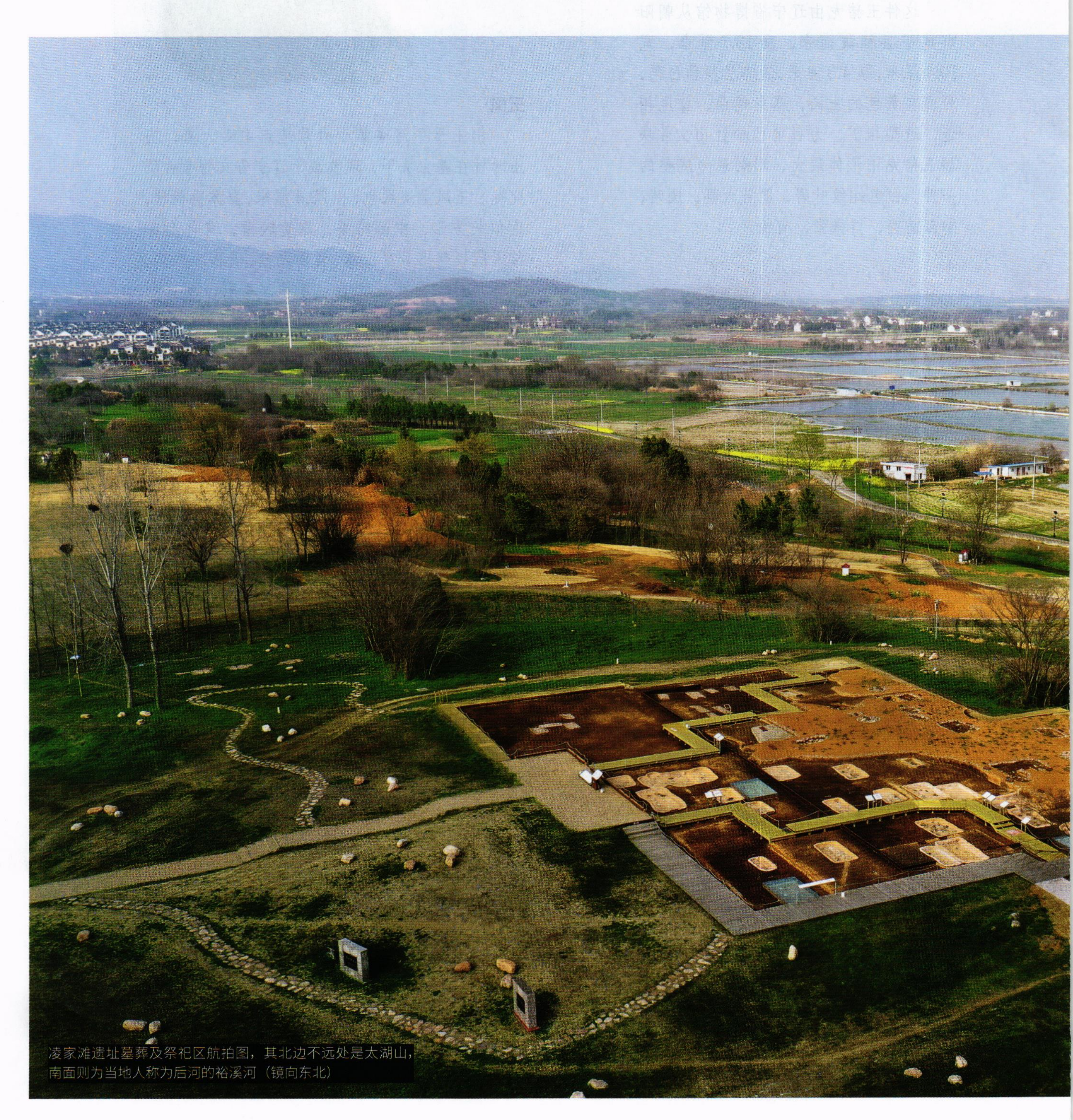
玉人

与玉凤同出一墓，现收藏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根据考证，墓主人为45岁至50岁成年男性，可能具有巫者身份，或是其他高等级身份。玉人整体呈黄绿色，背部可见红褐色石皮，是典型的河磨玉特征。颈部两侧和背面有3个圆孔，两两相通，可以悬挂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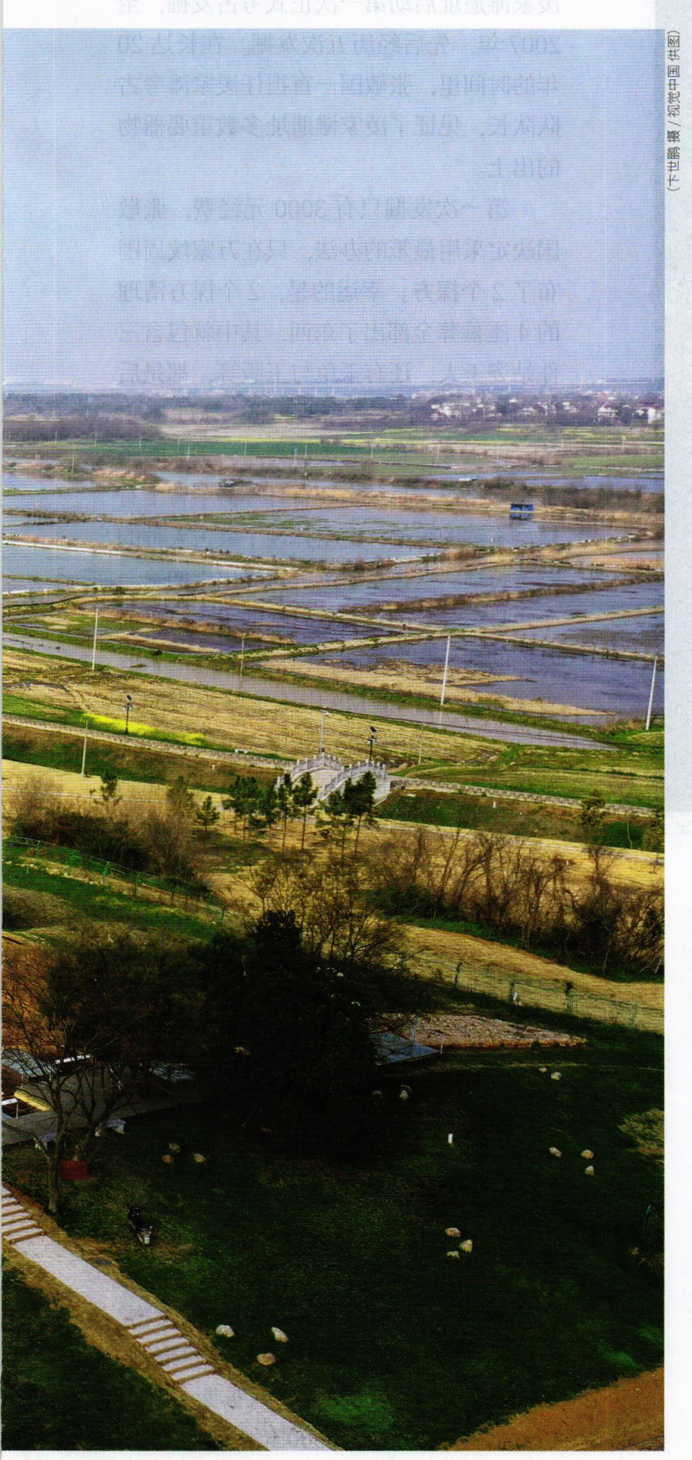
玉人双目紧闭、双臂曲肘立于胸前，与正在实施巫术的巫师状态相似，也可作为墓主人为巫者身份的另一证明。另有说法认为，玉人可能是被作为祖先神受到隆重祭拜，是一种族权和神权的象征物——“祖式玉人”。

凌家滩：充满创新活力的治玉中心

记者·艾江涛



凌家滩遗址墓葬及祭祀区航拍图，其北边不远处是太湖山，南面则为当地人称为后河的裕溪河（镜向东北）


（于世鹏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与红山、良渚不同，凌家滩作为“大规模用玉之初的创新时期”的史前治玉中心，体现出一种杂糅多样的创新风气。这点在它的典型器物齿纹璜与出廓璜上体现尤为明显，“不管是齿纹璜还是出廓璜，都会打破传统玉璜流线型轮廓的特点，这也是那个大规模用玉的初始阶段，整个社会充满活力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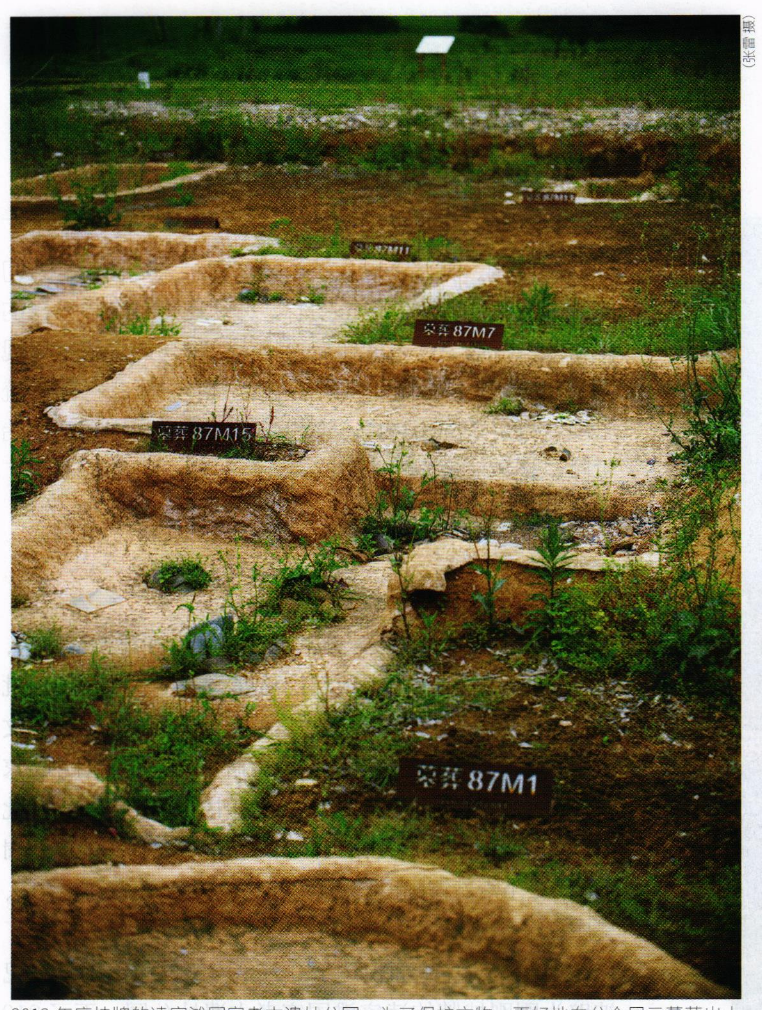
重玉时代的开启

1985年12月，凌家滩村村民万传仓在母亲去世后，按往常习惯在村北山岗顶部挖墓埋葬，无意中发现一批玉、石器和陶器。次年春天，这批东西被上交到含山县文化局，随后被报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由此揭开凌家滩遗址这一史前长江流域下游治玉中心的神秘面纱。此前，这片从太湖山脚往南延伸到裕溪河（后河）北岸的岗地上，只坐落着铜闸镇长岗村（原长岗乡）凌家滩、贾庄、吴庄三个默默无名的小村庄。

现在，这片总面积达140万平方米的聚落遗址，已被辟为刚刚挂牌的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下了213省道，是通往遗址公园的乡间小路，在2014年被扩建为一条景观大道。遗址所在的村庄也在几年前被集体搬迁到路边的长岗村。进入遗址公园，沿着新修的道路继续往南走，在大块油菜田和麦地前方，一块台地掩映在树木与房屋之中，5000多年前，它曾是凌家滩人生活、制作玉器的核心聚落所在。

198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接到上报文物后，派杨德标和张敬国前往凌家滩实地调查。由于只有一些陶器碎片和少量红烧土，起初两人判断出土地点可能属于窖藏一类，随着调查范围扩大，他们从村民口中得知以往耕作时偶有石器、玉器发现，结合凌家滩的地形地貌，判断玉石器出土的最高处可能为一处墓葬埋藏区。只是由于这些玉石器较为奇特，出于保守，当时断为商代文物。

75岁的张敬国已经退休多年，他在家中向我们回忆当年情景，仍对那大半蛇皮袋玉石器记忆犹新：成组的玉



（张雷 摄）

2012 年底挂牌的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了保护文物，更好地向公众展示墓葬出土时的情形，将原来的墓葬及祭祀区所在冈地整体垫高 30 厘米



凌家滩文化总分布面积仅四五千平方千米，核心区只有以凌家滩为中心、半径二十多千米的一千多平方千米范围

环镯、玉璧，光润的透闪石琢制的玉玦，虎首璜、出廓璜，还有刻着月牙形图案的石锛。只是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从此将与凌家滩牢牢绑定。1987 年 6 月，凌家滩遗址启动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至 2007 年，先后经历五次发掘。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张敬国一直担任凌家滩考古队队长，见证了凌家滩遗址多数重要器物的出土。

第一次发掘只有 3000 元经费，张敬国决定采用最笨的办法，只在万家坟周围布了 2 个探方。幸运的是，2 个探方清理的 4 座墓葬全部出了东西，其中就包含三件站姿玉人，还有玉龟与玉版等，都是后来引起持续讨论的重要玉器。“M1 出土了三件玉人，我一看太漂亮了，玉人帽子上有方格纹，耳朵上还有耳环，手臂上有层层玉镯的痕迹，完全体现了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这也是中国考古界出土的第一个也是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的玉人，以前发掘的都是陶器或石器，只有残缺的头或者半个身子。”87M4 中玉龟与玉版的出土同样让张敬国兴奋不已，“出土时，玉版夹在玉龟上下腹中间，一下就让人想到河图洛书，想到神龟把八卦从河里面驮出来的传说。和我一起发掘的巢湖市文管所的蒋楠大喊:不得了了，出原始八卦了！”

同样令人惊叹的是，墓葬中出土玉器数量之多。在 4 座墓葬出土的 180 余件遗物中，含玉人、龟、版在内的各种玉器达 129 件。同年 11 月第二次发掘清理的 11 座墓葬，出土 600 多件器物，包含双虎首璜、冠状器在内的玉器达 360 余件。

问题在于，这批墓葬中出土的重要玉石器究竟处于什么时期？首次正式发掘的收获，在于确认了这里为一处史前时期的墓地。发表于 1989 年第 4 期《文物》上的文博简讯，根据同出的陶鼎足形制，将最初发现的那批器物年代推断为大汶口文化中期（距今约 5500 年至 4800 年）。

然而1989年简报所发表的热释光测定年代，将当时发现的最重要墓葬87M4推断为距今4600年左右，这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年代认识上的混乱。据2007年第五次发掘采集数据的炭样测年，凌家滩文化的主体被分为两期：早期（距今5700多年至5500年）；中晚期（距今5500年至5300年）。凌家滩中晚期是整个聚落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出土这些玉石器的重要墓葬的下葬时期。

1998年的第三次发掘，同样在那片墓葬区，又出土了3件呈坐姿形象的玉人，还有玉龙、玉鹰等一批重要玉器。前三次发掘的总共44座墓葬，出土玉器中最为显眼的莫过于这批无日常生活实用价值的礼器。长期以来，这也是学者们对凌家滩玉器的关注所在。神似正在参加某种宗教礼仪的玉人形象，卷曲的玉龙形象，还有龙凤璜中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非常相似的龙，都引起人们对凌家滩文化和1000多公里外的红山文化在相似性上的猜测。

第三次发掘的另一重要收获还有祭坛。铺筑于凌家滩墓地中心最高处，面积将近1000平方米的不规则长方形祭坛逐渐被考古人员揭示出来。祭坛自下而上分为三层，分别为较纯净的黄斑土层、碎小石子及瓷土类较黏矿物铺成的碎石子层、较大石块和碎石子相间铺成的石块层，可能为两次建成，并可能修补扩充过。此外，他们在祭坛上还发现3处祭祀坑和4处积石圈。

在第三次发掘过程中进入凌家滩考古队、后来担任了第二任考古队长的吴卫红向我回忆，祭坛的确认，得益于对红山和良渚文化中贵族墓与祭坛一体化特点的参照。“凌家滩用石头块来铺筑我们称之为祭坛的祭祀场所，在南方这片地方显得很独特。在整个太湖流域，我们发现目前可以确认为祭坛的遗迹都是土筑的，只有良渚的瑶山和汇观山遗址是土石结合的，但在红山那边，用石头铺筑祭坛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也说明红山跟凌家滩以及良渚之间确实有一种很微妙的联系。”

如果说玉鹰、玉龟、玉人这种肖生类器形的相似还可以用环境心理的相似性来解释，那么这种“趋坛而葬”的习俗，包括卷曲的环形龙的设计，则显示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信仰体系。

只是，两个相距1000多公里的史前文化，究竟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呢？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在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东部地区建立了只有社会上层才能享有的物品和神秘知识的上层交流网，相距千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相似性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最明确的例证，凌家滩人曾远距离来到牛河梁的祭祀平台和神庙，拜访了红山仪式中心，学习了本地人群难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认为，李新伟的“上层交流网络说”能够说通，大的聚落总是有能力与更远的地方产生各种各样的交流，“这就像北京距离纽约远，还是距离云南某个偏僻的小村子远？肯定是距离纽约远，但北京跟纽约恐怕有更多文化相近的地方，比如麦当劳。”只是其间的证据很难寻找。

如果说在2007年之前，多数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影响了凌家滩，那么由于2007年在大墓07M23出土了玉龟、龟形器，部分学者也开始探讨凌家滩文化对红山的影响。吴卫红在其新著《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中谈到，随着人们对红山文化研究的深入，发现牛河梁遗址的二期晚段才开始了以玉质斜口筒形器为唯一玉器的葬玉习俗，到第四期遗存数量最多，墓葬中出土遗物已是仅见玉器，种类与数量明显增加，但按分期与年代测量结果推断，此时已在距今约5300年至5000年间，实际上已略晚于凌家滩文化。

不管怎么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2006年出版、记述截至1998年凌家滩考古发掘情况的《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中写道：“凌家滩目前发现的44座墓葬，显示墓葬中随葬玉器占主要比例，石器和陶器在大墓中退到次要的地位。这种现象，在凌家滩墓葬以前是没有发现的。”

这个重玉、大量用玉的时代，被一些学者描述为玉器时代。1990年牟永抗、吴汝祚根据考古大家苏秉琦的提示，以20世纪80年代红山、良渚的大发现为主，兼顾凌家滩的新发现，提出“玉器时代”的概念，并指出，“辽西的红山文化、太湖的良渚文化，显然是两支古老的用玉部族。最



近发掘的邻近巢湖的凌家滩墓地出土的大量玉器表明，包括鄂东在内，以巢湖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可能有别于上述两文化，是另一个琢玉中心地区”。

到此时，史前三大治玉中心已浮出历史地表。只是，凌家滩人究竟是如何治玉的？这一治玉中心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充满活力的治玉中心

截至2007年的四次凌家滩考古发掘，主要以挖墓追玉为核心。第五次发掘的最大收获是07M23大墓的发现，这座墓穴面积近7平方米的大墓，出土玉、石、陶器约340件，其中就有令人瞩目的悬挂在墓主腰部以下的组器，包含简约的玉龟、斜口扁圆形器。这也是张敬国退休前主持的最后一次发掘。重大发现的兴奋和劳累，一度令他心脏病发作。张敬国认为这件组器是当时凌家滩的领袖用来占卜的特殊礼器。大墓填土之上还压着一件重达88公斤的石雕猪，张敬国更愿称它为“玉猪”。

墓葬和祭坛逐渐搞清了，可凌家滩聚落的形态究竟如何？2008年，吴卫红接任考古队队长后，开始着力于探寻凌家滩聚落的真实情况，也就是凌家滩人“活着的世界”。

早在2000年第四次发掘中，考古队就在岗地南端发现了面积近3000平方米、最厚达1.5米的红烧土密集区，推测应为大型建筑区或广场。2011～2013年，考古队对凌家滩遗址及周边进



（张雷 摄）

左图：在遗址核心区旁的凌家滩遗址考古工作站文物修复中心，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现任领队张小雷（右二）为学生讲解如何绘图

右图：70岁的贾庄村民程年仓，现在是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自凌家滩遗址1987年首次发掘起，他便成为这里的看护员，曾22年义务看护遗址

行了拉网式钻探，内外壕沟、堆积丰富的生活区和大面积红烧土堆积被逐次发现。凌家滩聚落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在延伸向裕溪河的长岗上，遗址最高处的墓葬祭祀区高程约20米；被内壕沟与裕溪河围成的南北宽400多米、东西最长1200多米的封闭空间，正是凌家滩的主要生活区，其中长岗上的红烧土遗迹高程10～13米，长岗两侧和周围的生活区海拔高程约6.7米。内壕沟西段以西、以北500米外，还有一条只有一段的外壕沟。内外壕沟的北段均留有通道，内壕沟的通道所连接的，正是凌家滩人生与死的两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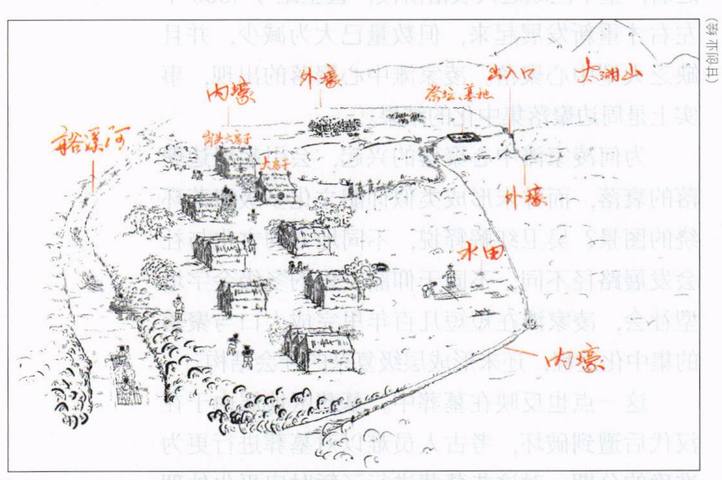
很长一段时间里，凌家滩的发现总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凌家滩规模宏大的聚落遗址，制作精美、数量巨大的玉器生产究竟从何发展而来？为搞清这个问题，2008～2013年间，吴卫红领队对裕溪河流域，也即凌家滩周边约50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拉网式的全面踏查。调查发现，凌家滩并非一枝独秀，而有着相对扎实的社会发展基础。在凌家滩兴盛之前，周边已有一定聚落分布，但面积最大只有几万平方米。凌家滩兴盛之后，整个区域进入衰落阶段，直至距今4500年左右才重新发展起来，但数量已大为减少，并且缺乏大型中心聚落。凌家滩中心聚落的出现，事实上是周边聚落集中化的结果。

为何凌家滩中心聚落的兴起，会引起周边聚落的衰落，而并未形成类似仰韶文化多级聚落环绕的图景？吴卫红解释说，不同地方的文化与社会发展路径不同，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多级金字塔型社会，凌家滩在短短几百年里完成人口与聚落的集中化过程，还未形成层级复杂的社会结构。

这一点也反映在墓葬中。墓葬区地层由于在汉代后遭到破坏，考古人员难以对墓葬进行更为准确的分期。对这些墓葬进行了暂时扁平化处理后，吴卫红发现，“在凌家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真正平民的墓葬，现在的这批墓葬即使里面最穷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也属于没落的贵族。



（张雷 摄）



（甘创业 绘）

上图：复原展示的一处凌家滩墓葬。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第二任领队吴卫红告诉我们，“在凌家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真正普通平民的墓葬，现在这批墓葬即使里面最穷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也属于没落的贵族。各个墓里面好歹都有一些玉器，或者玉器很少的话，也有不少石器。”

下图：凌家滩聚落生活方式示意图

各个墓里面好歹都有一些玉器，也有不少石器”。

尽管一些重要墓葬中玉石器数量巨大，甚至还出现玉钺和石钺，可吴卫红发现，玉斧钺墓占据发掘墓葬总数的30%，石斧钺墓约占墓葬总数的64%，从权力要求的稀缺性而言，与良渚社会不同，凌家滩墓葬中的玉钺与石钺与军权、王权无关，而更多是一种身份、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如果说玉人、玉鹰、玉龟、玉版、斜口扁圆形器这类特殊而数量极少的玉器带有某种原始宗教色彩，只由少数掌握神权的氏族领袖掌控，那么墓葬中的哪些器物还能体现主人独一无二的权力地位？吴卫红发现，“只有在几座大墓中才有玉料，不是工匠墓中玉芯那种边角料，而是经过简单打磨的璞玉”。这表明在当时的凌家滩社会，对玉石资源的掌控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力象征，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了凌家滩作为一个以玉石产业为主的资源型社会的独特性，用凌家滩现任考古队长张小雷的话说，如同现在高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区。

在这一新兴社会，少量具有原始宗教内涵的玉器已具有礼器的色彩，但大量出现的玉环、玉镯、玉玦、玉璜这类玉器，仍是比较常态的礼仪性饰品，玉器尚未演变为良渚社会中具有权力与法器象征的重器。吴卫红据此将凌家滩在整个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位置，确定为“大规模使用玉器之初的创新时期”。

变革时期的特征，首先体现为材质选择的多样化与不稳定性。凌家滩时期虽然已形成以透闪石为主体材质的使用状态，整体材质却非常多样化，这一点在87M15出土的玉璜组器上体现尤为明显，张敬国对此记忆尤深：“墓主人从脖子到胸前到腹部，挂了30多件玉璜，这些玉璜质地不同，有透闪石、蛇纹石、水晶、玛瑙等。”这种

多样化，同样反映在不同器物类型使用的玉石材料也非稳定状态。“比如我做一件石钺，可能用这种材质，也可能用另外一种材质，还没有形成器形与材质大体对应的稳定规制。”吴卫红说。

距今5500年至5300年间，凌家滩为何忽然出现高超的玉石器制作技术？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它受沿长江往东100多公里外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的影响。可随着对凌家滩研究的逐步深入，多数学者都认为凌家滩与北阴阳营文化同属一个时期，两者之间更多体现为一种互动交流，凌家滩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中心。考古学家严文明在2006年出版的《凌家滩考古报告》序言中就写道：“从各种器物特征来看，它的文化性质最接近于南京北阴阳营的墓地，二者甚至可能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这个文化的中心自然在凌家滩而不在北阴阳营。凌家滩也受到薛家岗文化的一些影响，或者反过来说是影响了薛家岗文化。但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北阴阳营和薛家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由于凌家滩地处连接巢湖与长江的唯一通道裕溪河岸边，这里正是沟通同时期本流域西北角、东北角两地聚落的最短水路中心，其中心位置的优势凸显，使其具备成为吸收多元文化因素进行创新变革的玉石制作中心的优越条件。

与红山和良渚相比，凌家滩最大的特点在于变革时期的创新。虽然在北阴阳营文化玉器中已出现线切割的治玉工艺，可是这种工艺在凌家滩才发扬光大，成为一种创新思维。“线锼工艺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在一个扁平的物体上，进行穿透式雕刻。它最大的影响在于打破我们以往玉器包括石雕只能在表面进行雕刻的工艺，产生一种透雕效果。”吴卫红说。再比如打隧孔的技术，北阴阳营那边一般是在那种半球形的器物上穿孔，还没有达到在一种非常扁薄的器物上打隧孔的高度。如果不是在安徽省博物院看到那两件高仅8.1厘米、厚仅0.8厘米，制作却极为精美、闪着莹润光泽的玉人，我还不能理解吴卫红所说的，在玉人背后打通孔径仅1.5毫米穿孔的难度。

齿纹璜、出廓璜、虎首璜，是凌家滩最为典型的玉器，沿着长江，无论东西，同时期的许多遗址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这些玉璜，也最好地体现了凌家滩在那个变革时期的创新活力。“不管是齿纹璜还是出廓璜，都会打破传统玉璜流线型轮廓的特点，这也是那个大规模用玉的初始阶段，整个社会充满活力的体现。”吴卫红说。

中心转移：从凌家滩到良渚

伴随着整个凌家滩遗址的发掘过程，由于出土器物，包括“趋坛而葬”的习俗有种种相似，凌家滩与红山、良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的关注焦点。与红山相比，良渚与凌家滩的关系似乎更为清晰，那就是前者深受后者的影响。



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首任领队张敬国，先后主持凌家滩遗址截至2007年的前五次发掘

在《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一书中，吴卫红考察了凌家滩典型玉器齿纹璜、虎首璜向东传播的脉络，发现从北阴阳营二期文化，渐次到马鞍山烟墩山遗址崧泽晚期、良渚早期墓地、高淳朝墩头遗址，再到良渚核心区的官井头遗址，都有这两类玉璜的身影。大量出土的良渚文化早期花斑石钺，更被认为是对凌家滩文化“追模祖艺”式的继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凌家滩玉、石器制作在影响东南地区的过程中，对良渚文化早期玉、石器特别是玉器的大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严文明在那篇序言中写道：“虽然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凌家滩人）的后继者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曾经拿过接力棒奔向文明社会，但从各种情况分析，在凌家滩之后，文化发展的重心可能有所转移。至少玉石生产的重心转到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那里去了。”

只是，凌家滩究竟是如何衰落的？从凌家滩到良渚，又发生了些什么？

对裕溪河流域的拉网式调查钻探中，吴卫红发现，在距今5300年至5100年的良渚早期，凌家滩周围只有两个直线距离约8公里的小聚落：钱墩和杨巷，凌家滩昔日超大聚落的辉煌已经落下帷幕。2021年底，为配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凌家滩第三任考古队长张小雷在带队对外壕北段沟体的发掘中，发现一些凌家滩晚期陶片，经测年为距今5300年至5100年。这一发现将凌家滩遗址的下限延伸到距今5100年，也进一步拉近了凌家滩与良渚的年代，但距今5300年左右，凌家滩的衰落与良渚几乎同时兴起的事实，则显得颇为巧合。

吴卫红也注意到了这种巧合。2011年，吴卫红在以前玉文化研究界“玉石分化”的基础上提出“玉石分野”的观点。“玉石分化，指的是古人对玉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把玉从石里面很明确地区分出来，很重视玉了。我讲的玉石分野，包括人们对玉和石的认识更加清晰，更多还有一个地理概念在里面。那就是大概在距今5300年前后，玉石并重的凌家滩出现了衰落，恰恰在这时，长江下游东头的良渚兴起，形成‘以玉独尊、以石为辅’的发展道路；长江下游西头的薛家岗晚期文化，形成‘以石为主、以玉为辅’的发展道路。在我看来，良渚选择了一条以宗教为核心的发展道路，玉器成为王权表达的重要载体；薛家岗则走上一条相对世俗化的道路，虽然也出产一些高端的非实用的石器，但主要用其反映自身最高工艺水平。”吴卫红解释说。

凌家滩究竟是如何衰落的？从凌家滩到良渚，又发生了些什么？

不过，这一观点依然充满争议。张弛便认为，与凌家滩和良渚这样的中心聚落相比，薛家岗遗址规模较小，不具可比性。“不仅是区域性的问题，社会规模也不同。你到凌家滩周围或者良渚文化区域，找到一些更小的遗址，会发现它们之所以也没有多少玉器，石器显得比较发达，可能是因为没有能力追求美玉。”有关凌家滩衰落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一种比较有影响的看法认为，凌家滩当地的玉石资源枯竭之后，凌家滩人向东转移到良渚一带寻找新的玉石资源。只是，距今5300年前后，凌家滩中心聚落衰落以后，长江下游的玉文化中心究竟如何转移到良渚？

张弛倾向于将距今5300年至5000年划分为凌家滩晚期，而距今5000年之后良渚水坝建起，才正式进入良渚时代。在他看来，凌家滩晚期依然还有玉器，只是没有兴盛时期那么发达，这一时期玉器最发达的地方已转移到太湖地区，只是目前尚未发现。

五一节前一天的中午，张小雷在匆匆赶赴高铁站的路上提醒我，傍晚可以到裕溪河南岸观察凌家滩遗址的三级地貌，非常清楚。下午我和摄影师到河对岸拍摄，举目望去，逐级抬升的凌家滩遗址在落日的余晖下愈发显得神秘。

（本文写作参考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吴卫红、刘越著《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张敬国主编《凌家滩文化研究》等书。感谢周广明、赵波、徐红霞、叶润清对采访的帮助）

凌家滩遗址重要玉器

整理·艾江涛

玉龟、玉版组合器

故宫博物院藏



玉龟腹甲和背甲长9.4厘米，高4.6厘米，宽7.5厘米，厚0.3～0.6厘米；玉版长11厘米，宽8.2厘米，厚0.2～0.4厘米。

这件组合器出土于87M4墓葬。据凌家滩考古队首任队长张敬国介绍，出土时，玉版夹在玉龟上下腹之中，符合“元龟衔符”之类的神话传说。玉版呈牙黄色（反面略内凹），中部刻一圆，圆内刻方形、八角形纹。据研究，小圆及八角形纹是太阳闪光的图案，为东夷人太阳崇拜的反映。小圆之外又刻一大圆，此圆及玉版的方形，象征天圆地方。此外，玉版两端短边各钻五个圆孔，上下两长边，一边对钻九个圆孔，另一边在两端各对钻两个圆孔。

玉龟呈灰白色，分为龟背甲和腹甲。背甲和腹甲对钻用以拴绳固定之用的圆孔。1989年考古材料发表后，学界对玉龟、玉版的研讨十分热烈，包括饶宗颐、李学勤在内的诸多专家提出河图洛书与八卦说、天文说、数理说、方位说、风水式盘说、日晷说等，成为凌家滩遗址此后十年的研究热点与主题。



玉双虎首璜

故宫博物院藏

外径11.9厘米，内径7.1厘米，宽1.9厘米，厚0.5厘米。玉灰白色，有黄色浸斑。器扁圆弧形。璜的两端各浮雕虎首，用阴线、钻孔、浮雕刻出眼、鼻、嘴、耳、脑门上的皱纹及向前奔跑的前爪。造型独特逼真，神似下山猛虎。表面温润光泽。凌家滩还出土带有暗槽的半截虎首璜形器，据俞伟超研究，是虎符最早的源头。

齿纹璜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外径11.3厘米，内径2.4厘米，宽4.4厘米，厚0.2厘米。器半圆扁形，璜的正面略凸，反面平。沿外圆弧边刻一周凹边，上饰22个齿牙。两端中间各对钻一圆孔，表面润亮。齿纹璜与出廓璜是凌家滩遗址的典型玉器，影响所及，见于长江流域多处史前遗址。这种打破半圆形璜流线型的造型，也体现出凌家滩那个玉器变革时代的创新活力。



凌家滩遗址 重要玉器



玉鹰
安徽博物院藏

长 8.4 厘米，高 3.5 厘米，厚 0.3 厘米。玉灰白色，器宽扁形。鹰做展翅飞翔状。头和嘴琢磨而成，眼睛用一对钻的圆孔表示，两翅各雕一猪头表现展翅飞翔，腹部规整刻画一圆圈，内刻八角星纹，八角星纹内又刻一小圆。圆内偏上有对钻孔眼，尾部雕刻呈扇形齿纹。鹰两面雕刻相同，表面抛光润亮。一些学者认为，玉鹰是当时凌家滩人太阳崇拜、鸟崇拜、猪崇拜三位一体的综合体，造型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大汶口文化辗转向南部地区辐射的影响。

玉龙
安徽省含山县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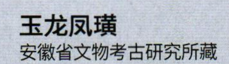
长径 4.4 厘米，短径 3.9 厘米，厚 0.2 厘米。玉灰白色泛青，器扁椭圆形，首尾相连。龙吻部突出，头顶雕刻两角，阴线刻出嘴、鼻，阴刻圆点为眼，脸部阴刻线条表现褶皱和龙须，龙身脊背阴刻规整圆弧线，连着弧线阴刻 17 条斜线并两面对称，似龙身鳞片，靠近尾部对钻一圆孔。玉龙两面雕刻基本相同，通体抛光温润。据张敬国介绍，凌家滩出土的玉龙为史前时期最接近现代形象的龙。





玉龟状斜口扁圆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器内腔中空，背面略弧，腹面较平，整体形制似龟。器一端为平口，另一端为斜口，通体厚度较均匀。器腔内放置一枚玉签，背面平口一端两边及中间各有一个对钻圆孔。2007 年出土于 07M23 大墓，同类器共发现 3 件，悬挂在墓主腰部以下，可能为占卜工具或举行某种仪式中的道具。



玉钺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长24.2厘米，刃宽13厘米，顶宽9厘米，厚0.7厘米。玉灰白泛绿斑纹。近顶有一对钻圆孔，钺面有数道略似弧形砣切磨痕。中部略厚，两边及弧刃部打磨较薄，刃部两端呈尖状上翘，整体呈“风”字，这种造型可能受到宁镇地区北阴阳营玉钺的影响。据凌家滩第二任考古队长吴卫红研究，凌家滩的玉斧钺墓占发掘墓葬总数的30%，石斧钺墓约占墓葬总数的64%。与良渚社会不同，凌家滩的玉钺和石钺与军权、王权无关，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玉龙凤璜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外径16.5厘米，内径13.6厘米，宽0.9～1.5厘米，厚0.5厘米。玉灰白色。器半圆扁方形。由两件组成，璜中间分开，两端平齐，侧面各对钻一圆孔，并有暗槽相连。两端一琢猪龙首形，一琢凤头形。在猪龙首眼部和凤首眼部各对钻一孔。表面润亮。据考古学家俞伟超研究，此璜为当时部族的联姻信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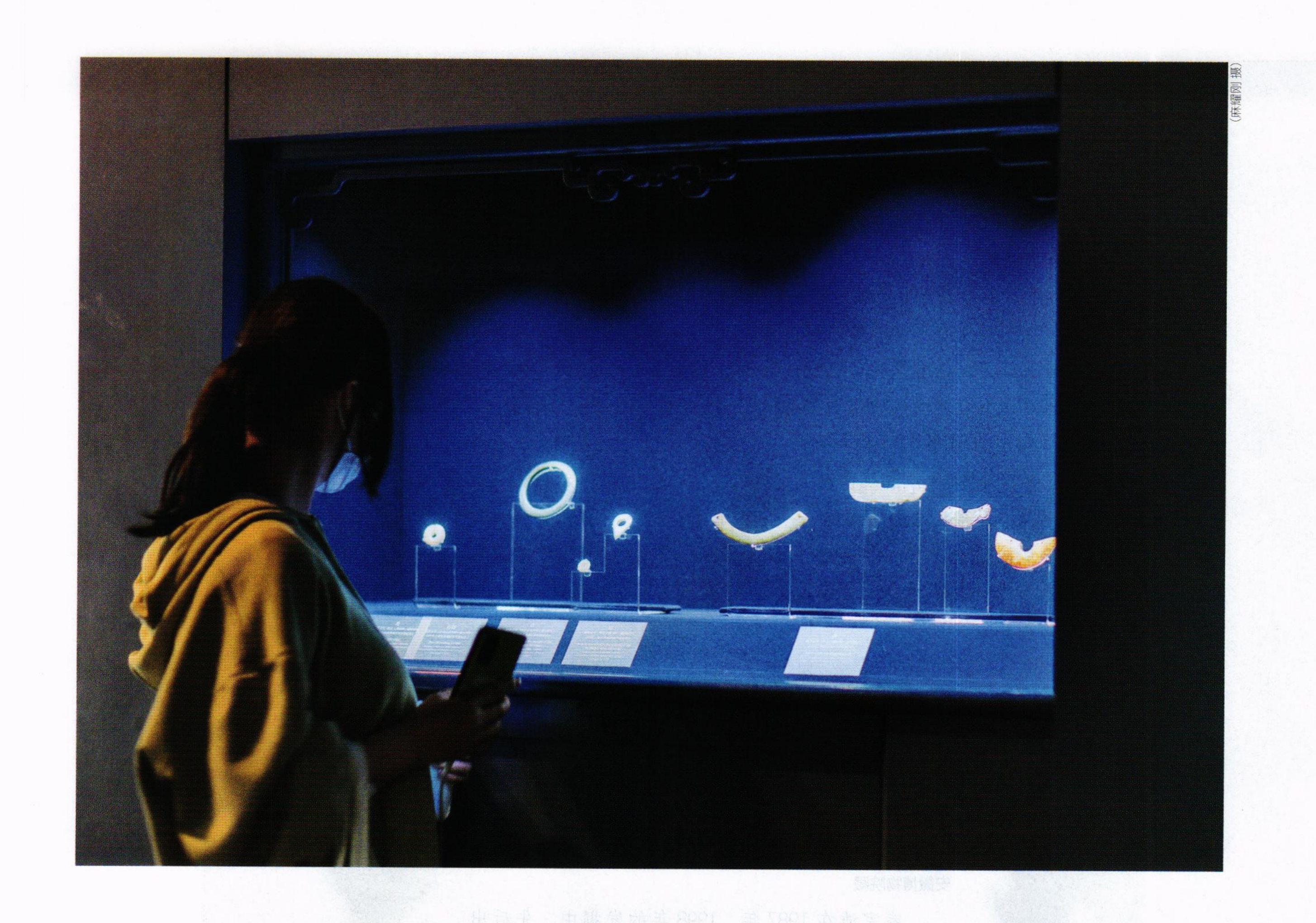


玉人
安徽博物院藏

凌家滩在1987年、1998年的发掘中，先后出土2组6个玉人。1987年出土的一组3个玉人为站立姿势，1998年出土的一组3个玉人为蹲踞姿势。此外，2016年考古队在清理万家坟时，还发现2件玉人残件，属于圆雕或半圆雕，立体性更强。

此图为1998年出土的3件玉人之一，高8.1厘米，肩宽2.3厘米，厚0.5厘米。玉灰白色，器长扁形。浮雕，长方脸，头戴圆冠，冠饰方格纹，冠上有一尖顶，顶上饰一小圆纽饰。冠后面至颈部饰横线垂帘。浓眉大眼，双眼皮，宽鼻头，两大耳下部各饰一孔眼，大嘴微闭，上唇留八字胡须。两臂弯曲，五指张开置于胸前，臂上各饰8个圆环。腰间饰有五斜纹的腰带。大腿和臀部宽大，腿显短，脚趾张开，背后饰高颈脖服饰和对钻的隧孔。玉人表面抛光。

（上述文字内容参考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玉器》、张敬国主编《凌家滩文化研究》等书。图片由张敬国老师的助手徐红霞提供）



（麻耀刚 摄）

崧泽："王"与他的时代

记者 · 陈璐

崧泽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文化圈逐渐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

张家港博物馆的二楼，与东山村遗址发掘的其他高等级墓葬分开陈列、单独展示的，是被考古学家严文明称作"崧泽王"的大墓：M90。这座大墓，不仅是东山村遗址发掘的9座崧泽时期大型墓葬里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崧泽文化中随葬品最多、等级最高的墓葬。

通过展览现场一张发掘时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墓葬主人仅剩头骨尚存，下葬时四个角落里堆放的陶缸、陶鬶、陶壶、陶豆等器物已被挤压成碎片。作为配饰使用的璜、镯、玦、管等19件玉器组合，依稀可辨曾按照某种佩戴方式安置在墓主人身上。尽管有机物早已腐朽，但可推想，他可能曾经头戴两枚大玉玦和一串玉管，颈下佩戴着玉璜，耳朵上夹着玉玦、挂着耳坠，手腕上还戴着玉镯。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散落在墓主人四周、经过精细打磨的5件石钺，以及西北角落的一件大石锛。

M90大墓里出土的这5件石钺，整体都近似



左图：上海博物馆玉器展厅的第一部分，即是崧泽文化时期的玉器

右图：东山村遗址大墓区发掘现场

圆角方形或梯形，磨制光滑，刃部未见使用痕迹，中间均有圆形穿孔，显然不具备任何实用功能，除材料并非良渚文化中常见的软玉外，其形制已经与良渚文化的玉钺极为类似。并且，一件石钺所在的土面上还有数道朱砂痕迹，可推测原本这件石钺的圆孔两侧还曾绘制有图案。

良渚文化时期，玉钺与玉琮、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是权贵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将玉钺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则最早开始于崧泽文化时期的石钺。东山村遗址发掘的高等级墓葬显示，崧泽文化时期氏族里的权势成员，不仅使用丰富的日用陶器、玉器随葬，还拥有象征军权、王权的石钺。这些发现，将以石钺、石锛和石凿为代表的军权、王权相结合的初级王权的出现时间，往前至少推进了300年。

按照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若非族群里领袖式的高贵人物，不可能拥有如此排场。此外，墓主人的下颌及颈部周围发现了较多石英砂粒。石英砂又常被称作“解玉砂”，是对各种玉石材料进行磨削的工具。他的头部右侧上方还出土了一件铁质含量较高、刃部有疤痕的石锥，身边搁置着一个打磨用的砺石。考古学者们由此推测，这是一套琢制玉器的工具，表明“崧泽王”拥有治玉权，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发现“崧泽王”

东山村遗址位于张家港博物馆西北部19公里处，坐落在香山由西向东延伸的斜坡上，地势较高，紧邻长江。这里曾是金港镇乡政府所在地。2009

崧泽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



1. 崧泽，2. 东山村，3. 青城墩，4. 茅山，5. 小兜里，6. 窑墩，7. 南河浜，8. 邱城，9. 姚家圈，10. 福泉山，11. 澄湖，12. 姜里，13. 薛城，14. 南楼，15. 徐家湾，16. 青墩

年撤乡并镇后，被废弃的乡政府旧址上就只剩下几座建筑，虽然外立面还贴着红色瓷砖，但墙脚生出的青苔、探出窗外的草木，都在显示人类活动的痕迹是如何在历史进程中被逐渐抹去的。

考古学家的工作正是重新发掘这些被遮蔽的历史。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林留根还记得，当时张家港市的宣传部长找上门来，希望考古所能够在当地做些工作，挖掘更多历史文化内容。然而在对张家港的几个遗址进行调查后，林留根发现大多数遗址都在城市建设中被破坏掉了，只有东山村遗址，“还有可能更进一步开展些工作”。

1998 年金港镇进行乡政府建设时，苏州博物馆曾在东山村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发现的主要都是些距今 7000 年至 6000 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因此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处马家浜文化的早期遗址。由于出土的随葬品与草鞋山等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太一样，当时给它命名为“马家浜文化东山村类型”。

等到金港镇撤乡并镇时，东山村遗址有了进一步发掘的条件。此时乡政府建筑还未被完全废弃，一些工作人员仍在这里上班，遗址上满是房屋，食堂、篮球场、停车场、宿舍楼、办公楼……几乎“没地方下脚”。负责现场工作的领队是当时考古所的副所长周润垦，他带队花了好几天在遗址四周探了情况，观察哪些地方还遗留有文化层。篮球场所在的位置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底下有文化层，地上没有地面建筑，砸掉地表便可进行发掘。

进行半年多的发掘工作后，一小片墓葬进入大家的视野。这片墓葬并不属于马家浜文化，随葬的陶鼎、陶豆以及打磨光滑的石器均显示，这是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遗存。尽管由于建设施工，遗址大部分已遭破坏，只剩下一点点痕迹，但仍可以看出，这片墓葬排列比较有秩序，并且还算完整，多数陪葬有几件或十几件随葬品。“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崧泽文化遗址不多，比较好的有上海崧泽遗址、嘉兴南河浜遗址等，所以这本身是个很重要的发现，远超我们最初觉得只是挖点马家浜文化遗存的预期。”林留根说。

不过，看着这些长约一米、宽几十厘米，排列似乎井然有序的墓葬，他忍不住想：这个墓葬群的规模可不可能其实更大？墓葬区既然已经被发现了，这些远古先民的居住区又在哪里呢？

林留根等人在接手东山村遗址的考古工作时，其实带着一种聚落考古的观念，也就是除了挖出东西，更重要的是得了解聚落的生存、发展和兴衰，以及聚落周边的环境，揭示出聚落自己独特的生命史。按照这种思路，当他们发现了篮球场底下的墓葬区后，紧接着便开始试图寻找居住区、生产区、手工艺作坊区等。不久后，他们在篮球场西面的高处又开了几个探方，发现了一片有红烧土的文化层堆积。

这片文化层位于乡政府大院的一条马路上，马路修得很宽阔，可以停放车辆，两旁绿化也很好。他们这次是敲开了马路往下挖，地层表面大面积

的红烧土显示，这里可能是一处古代先民利用木骨泥墙的建筑方式，再经过火烧加固后的房屋，坍塌后形成堆积现象。经过清理后，房屋柱洞明显，是一个方形房子加一个圆形房子的配套组合，每座房屋面积约在 85 ～ 95 平方米。

“根据当时我的经验，这么大的房子在崧泽文化考古工作里都是没有见过的。”林留根解释说，“马家浜文化也有圆形的房屋，但面积没有这么大，而且东山村遗址的房屋是一个很大的方形建筑，外面搭配一个小点的圆形建筑。圆形建筑可能类似于附属建筑，相当于厨房、仓储，与方形建筑结合使用，而方形建筑里可能还有空间区域的分割，整个房屋等级规模明显比较高。”

他开始考虑这片建筑遗址与此前发掘的小墓葬群之间的关系，“小墓里埋葬的人绝对不可能住这么好的房子。放眼整个长江下游地区，这几乎是新石器时代最好的房屋了，无论凌家滩还是良渚，都没有发现多少大房屋，发现房子最多的就是苏州吴江的龙南遗址，但都比较小。”

这些大型房屋的出现，更让林留根感到东山村聚落十分不寻常，他判断周围可能还存在更高等级的墓葬。按图索骥，考古队又将调查范围继续往外围扩大，但由于遗址的南面已经建起了不少别墅，一线的工作人员虽探清楚了情况，却没办法进行发掘。

他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西边山上的香樟林。此前，考虑到若是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需要赔偿大笔青苗补偿费，成本过高，所以他们一直没纳入计划，但眼下这里成为考古队员们最有可能继续下去的现场。最终，在张家港市政府的积极配合下，这片香樟林被移植到别处。

最初，铲开土层逐渐露出的红烧土让林留根以为这里可能也是一片居住区。不过很快，接下来显露的就是后来被誉为“崧泽王”的大墓 M90。

“它的墓坑达到了三四平方米，而马家浜的墓坑只有一点点大，良渚反山、瑶山的大墓，尽管出土的玉器比它多，但墓坑也没它大。”墓坑里密集陈设的随葬品也让林留根十分兴奋，他意识到这将会是一个重要发现。

东山村遗址

顺着 M90 大墓，考古队很快又在附近依次找到了 92、95 等 10 个大墓。这些墓葬排列很有规律，互相之间没有打破关系，清理后里面的陪葬品都很丰富，除大量陶器、石器外，还共计出土了 121 件玉器。林留根内心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崧泽时期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但又不敢妄下判断，因为此前考古学界认为由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的崧泽文化，作为良渚文化的前身，虽然也存在社会分化现象，但总体延续了马家浜文化比较平等的社会面貌。

2009 年秋天正值浙江省考古所成立 30 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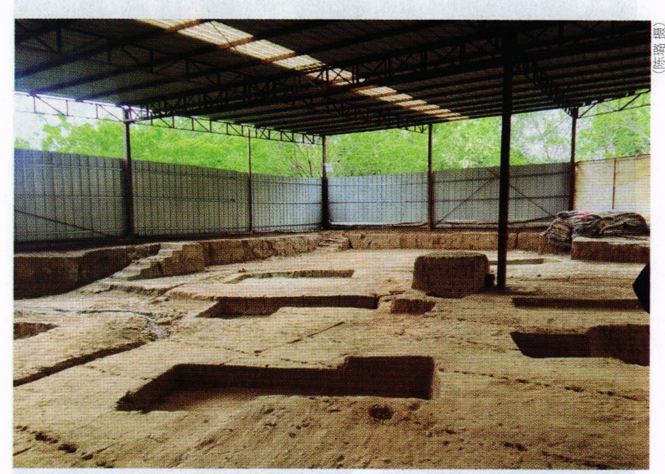


（黄宇 摄）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林留根



(张家港博物馆 供图)


(陈璐 摄)

上图：被誉为“崧泽王”的M90大墓发掘现场

下图：如今被大棚围起来的东山村遗址大墓区

张培忠、黄景略和严文明等考古学家都齐聚杭州。作为江苏的代表，林留根也来到会场，他趁机邀请这3位著名学者与会后前往东山村遗址现场参观。张家港市政府派来了一辆商务车，载着他们一路颠簸至东山村遗址。

细雨蒙蒙，还没来得及吃饭，一行人决定先上考古工地。现场的地面微微有些潮湿，已经提前收拾干净的10座大墓清晰排列在遗址现场，几位老先生站在探方上安静又认真地端详起来，林留根觉得可以用“鸦雀无声”来形容。隔了半晌，张培忠提起拐杖，往探方上轻轻一敲，感慨了句“这还了得”。严文明和黄景略则久久沉默不语。

为了避免玉器露天陈列会被盗走，考古队早已将这批墓葬中发现的小件玉器都拿回了标本室收藏。考察完工地后，专家们立刻直奔标本室，仔细地查看起了这批玉器，过了许久看完，这才返回到张家港博物馆休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见几位大先生到来，送上了提前准备的笔墨纸砚求字，一向谨慎的严文明竟欣然应许，提笔写了三个大字：“崧泽王”。

“经过这几年的研究，我渐渐了解到，当严先生落笔写下‘王’字时，他心里其实有个长江下游古国文明的概念。苏秉琦、严文明先生认为良渚是一个早期古国文明，他们一直在探索这种文明到底从何而来，因为它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发展出来的。”林留根很是感慨道。

实际近年来，考古学家李伯谦指出，东山村在崧泽文化时期已经进入到了苏秉琦所说的“高

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古国”阶段,也就是他所理解的“酋邦”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从原先考古界认为的距今5500年到4500年,提前至距今6000年,中国古代社会在更早时间里,发生了由相较的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的社会结构重大转型。

“东山村大墓区是从崧泽早期到崧泽中期,延续了好几百年好几代人的墓葬群,类似于这个古国的王陵。这几个高等级墓葬的主人,便是这个古国的国王,基本上每个墓葬里都发现了钺形器,95号墓里出土了一把玉钺,其他墓葬里均出土了石钺,它们都是权力的象征。”林留根表示东山村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对于长江下游的文明发展进程而言,崧泽文化处在一个关键的变革阶段,“它在距今大约5800年前就发生了社会分化,这是有基础的。实际良渚所在的钱塘江区域,不如太湖西部沿江地带出现社会分化那么早或者那么明显。因为要出现社会分化,既需要内部因素,也需要外部因素。太湖西部沿江地带因为先天矿石资源的优势,玉石器工业更为发达,这些玉石器既是产品也是商品,慢慢就成为一种财富的象征。”

良渚文化里像反山、瑶山这类墓葬都位于高出地面人造的祭台上,浙江嘉兴的南河浜遗址也曾发现过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人工堆筑的祭台。那么,东山村遗址是否也有类似的祭台呢?时间序列上比良渚更早的崧泽文化,到底给良渚文化带来了哪些影响?它的这套文明因素是如何被良渚所继承的?

带着这种思考,林留根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变成了寻找祭台,结果却没有找到。但考古队对整个东山村遗址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勘探,发现这个遗址的面积大概在25万到30万平方米之间,整体略呈圆形,其北部紧邻长江,南边靠近河道。在已经发掘的2000多平方米内,崧泽文化时期的27座平民墓均位于东区,而9座同时期的大墓都在西区。

直到2017年,在针对常州青城墩遗址

尖底瓶

口径11.2厘米,高47.3厘米

马家浜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

这件夹砂红陶的尖底瓶,是东山村遗址M97墓葬的随葬品之一。其形态介于大口尖底缸与小口尖底瓶之间,这类器物在马家浜文化遗址内还是首次发现,也是长江下游同时期遗存内的唯一发现,表明它并非马家浜文化的传统器物,具有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特征,现代科技检测发现系由当地的土烧制而成,可见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中国大地上南北方的史前文化已经存在紧密交流。

盘形豆

口径22.8厘米,足径14.6厘米,高23.2厘米

崧泽文化,公元前4000～前3300年

这件泥质灰陶的盘形豆,胎色发黄,喇叭形圈足。柄部饰有3组细弦纹,间饰以5个菱形镂孔。马家浜文化的陶豆通常是喇叭形、弧线的,而崧泽文化的陶豆里面分了好几节,有棱角,装饰也发生了变化,既有弧面三角纹,也有镂孔的纹样装饰。





（麻耀刚 摄）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

的考古发掘里，目前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唯一的高台式贵族专用墓地终于展现在众人面前。并且，该遗址双重环壕的聚落格局也极为少见。此外，青城墩遗址 71 号墓里还出土了一个小小的玉龙，它在下葬时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这条玉龙直径只有 1.2 厘米，被设计成一个蜷曲的玉环，需要借助放大镜才可以看清它浑圆且突出的眼睛、向上弯曲翘起的吻部和紧贴在颈背的双角。不论龙纹还是玉器，都与先民们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些发现都表明，该遗址是江南地区一处难得的较高等级的史前聚落中心，而 71 号墓的主人应该属于这个族群的权力阶层。

作为长江下游的两个史前玉器中心，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与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至今成谜。从两地的用玉习俗或玉器的制作工艺上看，它们必然存在着一定联系，因此有学者认为，由于凌家滩玉资源或者玉工的衰退，造成了玉工的迁徙，令良渚文化最终得以崛起。但究竟它们之间是如何转变的，则缺乏更多的证据。

与通常认为文明发展往往遵循从神权到王权再到帝权的途径不同，崧泽文化在发展到良渚文化的过程中，由军权、王权的道路开始走上军权、王权与神权相结合而突出神权的道路。东山村遗址的玉器较多，还出土了一些异形玉器，这都在良渚文化时期得到了更多发展，形成以琮、璧、钺为中心，用以区别阶层、标识身份、反映等级的玉礼器系统。

这种发展路径，“一方面有效地巩固了良渚上层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走上了以神权为主体的发展道路，导致统治脱离了现实，最终覆灭。而中原地区走向了以王权为主体的道路，王权更加务实，逐渐崛起”。林留根说。

大崧泽文化圈

崧泽文化是以上海市青浦区的崧泽遗址命名的，虽然现在有的考古资料显示这里只是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普通聚落，但它为认识距今5800年至5300年间长江下游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在2004年曾参与过一次现场考古发掘，他们发现了多座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时期的墓葬，并且首次发现上海地区带有人类骨骸遗存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这具人类骨骸也被称为“上海第一人”。

了解到我们是为崧泽文化时期的玉器而来，陈杰将我们带到了上博的玉器展厅，指着展览最开始位置的一个小小展柜说，崧泽文化里玉器并不突出，偌大的玉器展厅里，只有这里面的几件装饰性用玉属于崧泽文化时期。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用玉特征。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用玉的传统形成很早，最早可以溯源到距今8000年至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时期。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以及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用玉更加普遍。作为上承马家浜、下启良渚的崧泽文化，却“由于现在崧泽文化时期高等级墓葬发现很少，还没办法将当时的用玉图景加以清晰描绘”。陈杰介绍，“但崧泽时期应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用玉体系。首先比如装饰性用玉，从原来头部、耳部的装饰，已经开始往胸部、腕部乃至全身扩展，胸前会佩戴玉璜，手腕上戴玉镯等。这种组配式的装饰体系在崧泽时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其次这时期也开始形成了一些礼制性的器物，不少崧泽文化的遗址里一些身份较高的墓葬中都发现了玉质的斧、钺等器物，这类器物本身没有开刃，材质也不具备实用价值，应该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另外还有类遗物，目前发现不是很多，如桐乡普安桥遗址发现的玉龙反映了当时的某种精神信仰，再如东山村遗址的那件小型钺形玉器，它可能是某种装饰品，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虽然馆里观众熙熙攘攘，但他们几乎都是冲着“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而来，没人注意到中庭高高悬挂的一幅海报，上面预告着博物馆接下来的6月即将开幕的“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陈杰强调他们特别在展览标题中加入了公众不太了解的“崧泽”，因为实际上崧泽文化是长江下游早期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

“有专家认为崧泽文化已经达到了‘古国时代’初期，跨入了早期文明的门槛。虽然它没有良渚文化体现得那么明显，但当时社会的分化、技术的水平，已经和一般平等社会不一样了。从这点上，我觉得崧泽文化对研究长江下游早期文明意义非常重要。”陈杰所指的崧泽文化即包括了分布在太湖流域的狭义的崧泽文化也包括了皖江流域的凌家滩文化。这一时期长江下游地区不同聚落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文化面貌趋同，生活方式相似，因此被专家们认为同属于大崧泽文化圈。

“以东山村遗址和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大崧泽文化圈。这些遗址都明显反映出了聚落的分化，阶层的分化，是新社会阶段的体现。要理解整个大崧泽文化圈，凌家滩遗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口。”陈杰说。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凌家滩遗址的年代在距今5600~5300年左右，相当于崧泽文化的中晚期，而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大型墓葬则相当于崧泽文化的早中期。从考古学判断文化类型的重要依据陶器上看，凌家滩遗址与崧泽文化联系紧密，但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器又如此独树一帜，或许太湖地区还有崧泽文化晚期重要聚落尚未被考古工作者发现。

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过程里，其背后代表的长江流域湿地稻作农业是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范本。世界的饮食体系里，多数是以旱作农业小麦为主，而长江中下游在很早便开始了以湿地稻作农业为主的实践。这些稻作农业遗址可以追溯到距今1万多年前，典型的有浙江省浦江县的上山遗址、杭州市萧山区的跨湖桥遗址。但最初，它只是作为一种人类生产的补充，还没有发展成主要的食物来源。进入崧泽文化时期后，稻作农业

“我们认为在这个时期，长江下游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相较文化一统，各区域交流互动特别紧密的格局。”

才逐渐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这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非常重要。

因此，崧泽文化的许多遗址里，都发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一套套规范性器物组合，形成耕地时有石犁，收割时有石镰、石刀等完整的石器使用体系，并被良渚文化继承了下来。这些器物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事实上，崧泽晚期的遗址数量迅速增加，说明当时的人口迅速增加，也开垦了更多新的土地。

陈杰说，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凌家滩遗址的年代在距今5600年至5300年，相当于崧泽文化的中晚期，而东山村遗址的崧泽文化大型墓葬相当于崧泽文化的早中期，或许太湖地区还有崧泽文化晚期重要聚落尚未被考古工作者发现。

那么，究竟良渚文化是如何从崧泽文化里的军权、王权的道路，走上了以神权为主的道路呢？陈杰认为根据玉器的发现，这可能与信仰体系上的变化有关。崧泽文化的玉器造型非常丰富，有虎、鹰、龙等。而良渚文化逐渐形成了以神人兽面纹为特点的重要信仰符号，并在1000多年历史里贯穿始终。“这或许是一种祖先崇拜。从崧泽文化时期的陶器造型来看，它们许多仍取之自然，崇尚自然，有许多动物造型的遗物，它的信仰呈现多元的形式。世界各地的人类信仰都是从多神信仰逐渐转变为一神信仰的。统一信仰的形成或许促进了良渚社会的统一和增强了社会组织能力，从而铸就了长江下游早期文明的高峰。”

在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修建人工池塘时发现的一口六朝古井，恰好位于遗址的居住区和小墓区之间。早已被大棚围起的东山村遗址发掘现场，绿荫环绕下的六朝古井，以及荒废的红砖墙现代建筑、无人问津的残余篮球场……令历史在这里交织叠加，具有了可视的厚度。崧泽文化尚有许多未解之谜，它们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发掘，但这些想象已构成了我们对这处平常山麓的向往。

（感谢张家港博物馆田笛对采访的帮助）

崧泽文化重要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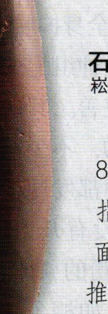
整理·陈璐

带柄钺形器

崧泽文化，公元前4000～前3300年

这件玉器长3厘米，最宽径2.5厘米，厚0.15厘米，使用的是东山村遗址玉器常见的透闪石和阳起石材质，通体呈现出乳白色，带有墨绿色沁斑。它由一个长条形和一个扁方形结合而成，形状酷似一把带柄的石钺，说明当时已经出现对石钺所代表的王权的崇拜。

实际上，除了M98墓中的这件带柄钺形器属玉器外，东山村遗址的高等级大墓里还出土了一些“异形玉器”，比如M93墓里的钥匙状玉饰、鱼钩形玉饰和“G”形玉器。部分学者认为仅是作为装饰件，还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落后，玉料获取困难，工匠们最大限度利用边角料信手制作的。但不论按哪种说法，这些被仔细放置在墓主人身旁的玉器，必定与墓主人的特定身份密切相关。



石锥

崧泽文化，公元前4000～前3300年

出自东山村遗址M90墓的石锥，长8.8厘米，最宽径2.56厘米，和人的拇指差不多大，整体呈现深红褐色，横截面近圆形，锥尖刃部为小扁平形，有疤痕，推测可能是制玉工具。并且这件石锥的含铁量很高，但附近并无铁矿。墓葬里与石锥成套出现的，还有打磨用的砺石和被称作“解玉砂”的石英砂，考古学者们推测这可能是一套琢玉工具。在那个时代，治玉权基本控制在部族领袖级人物的手上，可见墓主的身份十分显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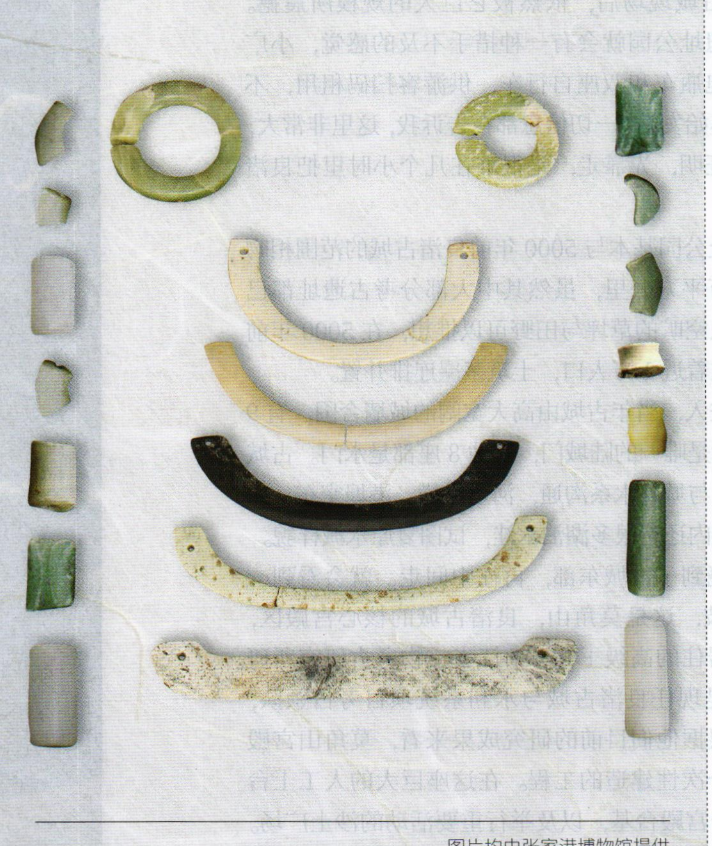
石钺
崧泽文化，公元前4000～前3300年

东山村遗址M90墓里出土的5件石钺，整体都近似圆角方形或梯形，磨制光滑，刃部未见使用痕迹，中间均有圆形穿孔，孔中留有对钻痕迹。并且，一件石钺所在的土面上还有数道朱砂痕迹，推测原本这件石钺的圆孔两侧还曾绘制有图案。这些石钺明显是高贵的礼器而非实用工具，是墓主人崇高身份的象征。

组玉饰
马家浜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

该套组玉饰出自东山村101号墓，由2件玉玦、5件玉璜与14件玉管组合而成。玉玦出土于墓主人头侧，被用作耳饰或配饰；组合玉璜按直径由小到大，形体依次由半璦形舒展为两端翘起的长条形，出土于墓主人胸腹部，可能是佩戴在颈部的装饰品；玉管出土于墓主人身侧，也是重要的装饰品。

东山村101号墓是已知随葬品最为丰富的马家浜文化大墓，出土玉器多达32件，也是最早使用组璜的墓例。此外，东山村97号墓发现了开刃未经使用的软玉质锛，青浦崧泽、溧阳神墩墓地分别发现了将玉管、玉璜作为口琀使用的现象。这些发现均表明太湖地区是原始礼制的重要发祥地。



图片均由张家港博物馆提供

良渚：权力与信仰的巅峰

主笔·张星云　摄影·黄宇

玉器时代在良渚时期达到巅峰，古城巨大的土方量、发达的稻作农业、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统一的信仰，意味着已经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这背后，是良渚创造了以玉琮为代表的完善的权力等级制度和信仰体系。

超级大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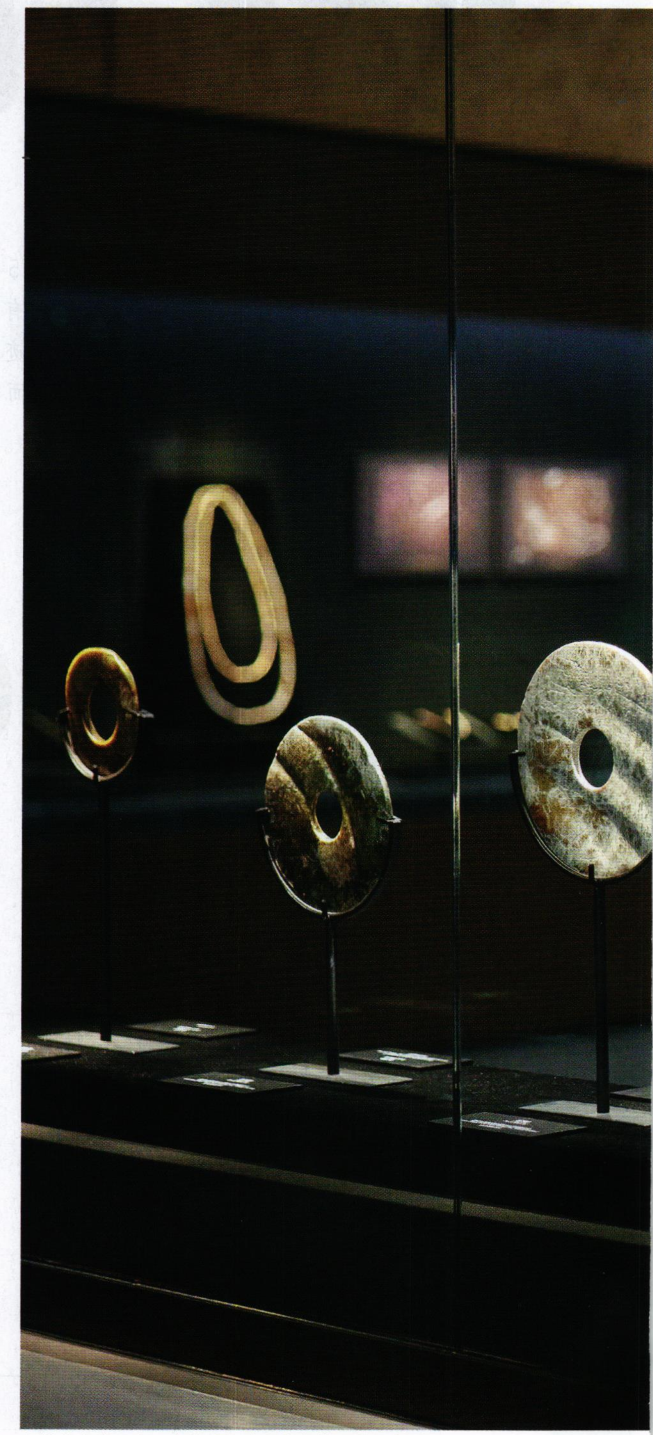
良渚位于相对偏远的杭州西北市郊，坐车从市中心过去需要1小时左右。不过如今的良渚早已不是远郊的样貌，这里不仅离阿里总部很近，还因为一座安藤忠雄设计的文化中心，成了杭州文艺青年的打卡地，热闹非凡。

尽管以前通过文字了解过不少良渚的历史，但我真正到了良渚古城现场后，依然被它巨大的规模所震撼。刚进入良渚遗址公园就会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小广场上停满了电瓶车和双座自行车，供游客扫码租用，不远处是摆渡车始发站，一切信息都在告诉我，这里非常大，后来实际也证明，光靠走，是很难在几个小时里把良渚古城逛遍的。

良渚遗址公园基本与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范围相吻合，占地3万平方公里，虽然其中大部分考古遗址都已经回填，但从空旷的草坪与田野可以推想，在5000年前这里曾经居住着近1万人口，土筑茅屋连排并置。

从南门进入，当年古城由高大宽阔的城墙合围，有9座城门，这里是唯一的陆城门，其他8座都是水门。古城里水系发达，与城外水系沟通，河道纵横，港埠密布，如今的遗址公园内还有很多湖泊水洼，试图复原水城样貌。

我先是绕到了古城东部，再往中间走，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土坡，这是莫角山，良渚古城的核心宫殿区，最高统治者居住的高级王宫。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是现任良渚古城与水利系统项目考古领队，他告诉我，根据他们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莫角山宫殿区在当时是一次性建造的工程。在这座巨大的人工土台上，建了3个宫殿台基，以及举行重要活动的沙土广场。整个莫角山宫殿区的土方量达到228万方，与古埃及胡



良渚文化发展出一套代表权力与信仰的玉礼器制度



夫金字塔的石方量几乎相同，“它可以说是中国史前史最大的单体土建筑”。

王宁远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分析，古城如此巨大的工程量，以及水利系统与城市营建的因果关系，都代表了良渚古城在营建之前就已经有了十分高端的设计。而在施工建设过程中，需要有强大的执行力，在人力、物力、技术管理、组织体系等方面都已经达到极高水准。而后的历史时期，哪怕是明清两朝的紫禁城，也不过这座古城面积的四分之一。这一切都说明，良渚古城早已超越血缘氏族的聚落模式，进入了早期国家发展阶段。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给良渚古城遗址的官方表述是“早期区域性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也告诉本刊，到目前为止，考古界还没有发掘到同时期与良渚相似规模的古城遗址。在良渚同时期的中国东部地区，江汉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现在已经发现了十几座城址，但都没有达到良渚古城那样可以被称为早期国家的巨大规模。大汶口文化近几年发掘了焦家遗址、岗上遗址，城址都有一定规模，但依然是“众邦林立”的状态。通过与这些文化的比较，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良渚的特殊性和野心。

良渚文化建造超级大城，如此违背自然经济规律地汇聚人到城里，城里进行了严密的社会分工，那么多人远离农业生产的直接发生地，远离农田，城外需要大量农民耕种才能长久养着城里的人，意味着良渚古城必然给整个族群提供了某种特别的价值。而在王宁远看来，在青铜器还没有出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尚处于石质武器的时代，军事威慑力并不足以长时间统摄如此多的人。

那么到底良渚人是通过什么来动员那么多人力建造超级大城的？如何长久地统摄如此多的人，又是怎么实现他们这种违背自然经济规律的野心呢？答案就是玉礼器，以及其背后一套完整的权力等级制度与信仰体系。

良渚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



第一等级聚落：1. 良渚古城遗址

第二等级聚落：2. 双桥，3. 戴墓墩，4. 亭林，5. 福泉山，6. 草鞋山，7. 邱承墩，8. 寺墩

第三等级聚落：9. 余墩庙，10. 荷叶地，11. 新地里，12. 普安桥

玉礼器制度

良渚玉器的发现故事颇具传奇性。1986年，牟永抗、王明达等第二代良渚考古人准备筹办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大会。“考古人开会一般就两件事情，一个是把挖出来的东西给大家摸一摸，另一个是弄一个野外考古发掘现场，让大家看看。”王宁远回忆说。那时候，从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挖出黑陶以来的50年里，浙江省良渚考古没什么大动静，吴家埠挖出来一个小墓，浙北嘉兴地区也有若干小墓，出土的也主要是陶器。于是他们决定在开会前再找一个现场挖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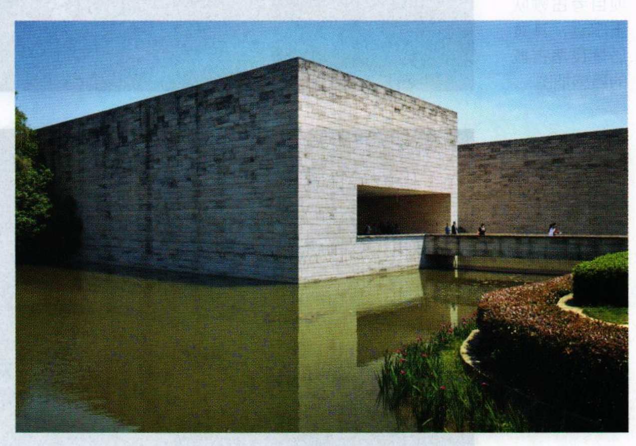
恰好此前上海青浦区福泉山遗址考古发掘传出消息，一座7米多高看似平平无奇的大土墩，被发现是一个人工堆筑而成的高台墓地，内有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战国、汉、唐、宋墓葬100多座，由此被称为“东方土筑金字塔”。王明达从上海回来后，也决定在良渚周边找找，而这片地区最高的土墩就是反山了。

挖掘工作很快展开，最初的半个月，除了一些汉墓遗迹，没有发现任何史前痕迹，直到5月



上图：整个莫角山宫殿区的土方量达到228万方，与古埃及胡夫金字塔的石方量几乎相同

下图：良渚博物院



31日下午3点多，挖到了玉器。之后的一段时间，反山陆续发掘出11座高等级墓葬，共出土玉、石、陶、象牙、漆等质地的器物达1200余组，其中玉器占90%以上——玉琮、璧、璜、冠状器、三叉形器、带钩、管、鸟、鱼、龟等各种器型，等级最高的12号墓出土了精美的“琮王”和“钺王”。如此大规模的玉器出土，在此前的史前考古中从未有过。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莫角山宫殿区旁边的反山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内也是同时期墓葬中等级最高的。

从反山遗址发掘开始，原本默默无闻的良渚，就开始了接二连三的重要考古发现。第二年发掘瑶山祭坛和墓葬，发现莫角山宫殿区，然后是汇观山祭坛和墓葬，再后面是塘山水坝，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都入选了年度十大考古发现。按照王宁远拿到的数据，良渚至今出土玉器总数达到约7500组，单件约1.5万件，如果说玉礼器数量与文化宗教规模成正比，那也就意味着，良渚的信仰体系是巨大和深远的。

如今再看80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认为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就在1986年良渚反山墓葬发掘的前后一两年里，凌家滩、红山牛河梁等遗址也先后发掘。“大家几乎同时在东北和长江下游突然发现了这么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有玉器出土，它们不是零星的，并且各有特色。”从红山玉龙，到凌家滩刻纹玉版“河图洛书”，再到良渚的玉琮，大家试图将这些东西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图）

上图：1986 年反山遗址发掘现场

下图：良渚古城与水利系统项目考古领队王宁远，其背后是良渚古城的遥感地图



放在一起比较。牟永抗又重新提出了“玉器时代”。

这种玉器研究热潮一直持续到2007年，当年良渚古城遗址范围确认，再后来发现外围水利系统，考古界将关注重点转向大遗址考古聚落结构的研究，以至于无论红山还是凌家滩，后来都在寻找是否存在相匹配的大型建筑，乃至城址。不过放在当时，玉作为礼器所体现的身份等级和社会阶层，是考古学界讨论良渚社会状态的重要依据，因为其他出土器物都不够系统。

随着不同等级墓葬的发掘，方向明他们试图在纷繁复杂的良渚玉器中理出线索。他认为，良渚人当时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玉礼器系统，除了琮、璧、钺之外，还有锥形器、冠状器、三叉形器等组成的复杂玉头饰。这些玉器的组合，不仅能够反映当时良渚人权力、等级的高低，也有性别之分，这一整套玉礼器系统得到了良渚文化分布区大家的广泛认同，形成了统一的信仰。

在这个系统中，除了主流的琮、璧、钺，玉头饰是最能区分贵族性别和等级的。冠状器男女都戴，此外，男性贵族会佩戴三叉形器，女性佩戴玉璜，头上一根根成组的锥形器则是男性贵族等级的重要区分，最多有10根，之后9、7、5、3、1根，依次递减，权力等级也依次下降。贵族墓主最少也有5根锥形器，而普通墓葬里，最多只有3根。

如反山、瑶山这样的最高等级墓葬，墓主除了王之外，还可能有王族成员。王的墓中，琮、璧、钺和玉头饰是齐全的，而低一等级的墓中可能就只有其中一部分组合了。一些特殊领域的负责人可能也会有特殊随葬品，比如人员管理者、水利设计管理者、玉器漆器高级手工业者，这些特殊身份可以通过随葬品来反映。

其中，玉琮是良渚文化独创的玉礼器，也是其权力与信仰体系最重要的象征。

从凌家滩到良渚，玉琮的起源

实际上玉琮的起源与良渚文化的起源是并行的。这要从全新世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开始说起。距今5500年的崧泽文化末期，发生了一次大降温，人们开始从高地、山坳、山冈前往平原居住，生存方式转向大规模农业种植。与此同时，距今6000年开始形成的长三角平原逐渐稳定，这片由长江泥沙被海潮堆积而来的沼泽最初盐分颇高，后来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海平面稳定下来，雨水把土壤中的盐分带走。到了距今5500年时，这里已经适宜人居住，于是，四面八方的人移居到长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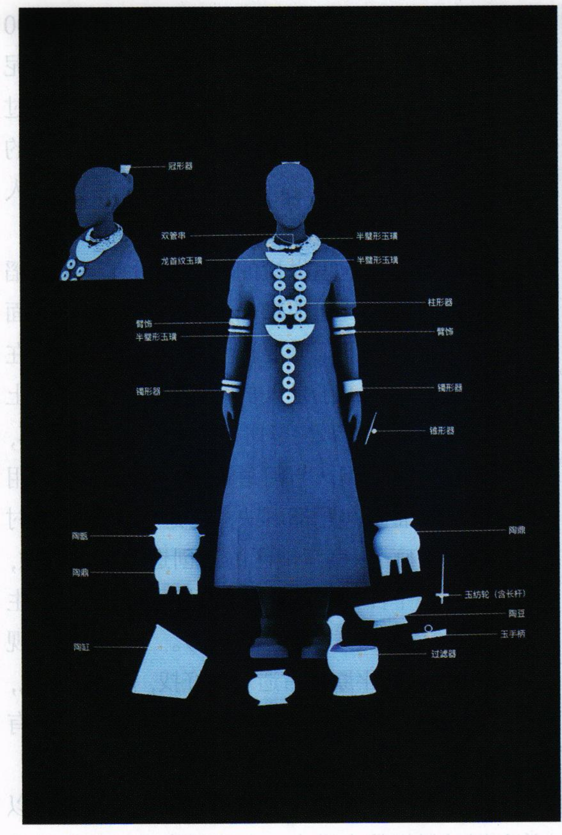
长三角沼泽地里纵横的河网最适宜种植水稻这类禾本科植物，但很难住人。这里距离海平面只有三四米，一下雨就要被水淹，又不可能住在离田很远的山上，于是人们开始堆墩，在高台上搭建住所。每个堆墩上聚居一个家族或一个村落，周边开辟为水稻田，与河道连通，一下子生活用水、交通、灌溉问题都解决了，进而再与周围村子形成“连廊”。良渚地区的人创造了堆墩居住，后推广到整个江南地区，这就是所谓的“江南生活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王宁远说，现在去苏南、浙北平原找古遗址很好找，村子在哪儿，就在哪儿挖，往下挖70%都是良渚人造的，还有30%是南宋的。

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最初也曾带来混乱。以前在相对封闭的山坳中，人们通常是以血缘关系来组织聚落的。但到了崧泽文化晚期，由于气候变化，人一下子汇聚到太湖平原，没有了自然阻隔后，开始争抢资源和土地，进入了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王宁远介绍说，对应崧泽文化晚期，良渚这一地区有些聚落遗址出土过很多作为近身搏杀武器的石钺，甚至在一座男性墓葬里出土了数个头颅，说明当时战争、冲突不断。

此时就需要一类神人或者英雄式人物，制定一套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运行规则，推行一种新的超血缘关系的组织形式。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的推行并非依靠军事威慑，而是依靠比世俗权力更强大、影响力更广的宗教，而这种信仰体系的核心介质便是玉器。

按照目前考古学者们的推测，良渚文化玉器的源头之一，可追溯到凌家滩文化中的刻纹玉版——方向明说，考古学家牟永抗最先提出来，凌家滩刻纹玉版的图案与良渚玉琮仰视后的展开效果惊人一致。

不过凌家滩文化的高峰距今5500年，良渚文





左、右图：良渚文化通过琮、璧、钺和玉头饰区分墓主性别和权力等级

下图：反山王陵出土的“琮王”上刻画的神徽

化开始于距今5300年，从凌家滩到良渚，从玉板到玉琮，中间缺了一个200年的环节，也许周边可能还有过渡性的大聚落，但还没有被考古发现而已。2021年，王宁远他们在良渚古城南边的北村发现一个遗址，时间与瑶山遗址差不多，都在距今5100年左右，即在良渚古城建成之前。他们在这处遗址中发现，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居住空间被栅栏隔开。王宁远生出的疑问是，这些贵族是移民过来的吗？当时良渚古城还未建成，所以他们才需要与当地居民混居？王宁远还注意到，当良渚古城建好后，留在北村的人就很少了，那些外来的精英分子全都住到城里去了。

他们进一步猜想，最初很可能是凌家滩的后人移民到良渚地区后，为了统治良渚，从他们已经掌握的玉礼器制度出发，创造了新的宗教。为了让外来人与本土人都能认可这个新的宗教，还需要寻找一个共同认同的物质载体，于是，玉琮和刻画其上的神人兽面纹被创造出来。

神人兽面纹遍布良渚文化分布区，是贯穿良渚文化始终的神徽，形态固定，成为良渚玉器图案的母题。王宁远从这个角度分析神徽，认为良渚玉琮上刻画的神人兽面纹，实际上是这两拨人的代表。神人兽面纹下部刻画了一只蹲踞趴伏的神兽，糅合了多种动物造型的元素，有着阔嘴獠牙和鸟形趾爪，以及一双重圈大眼。而神人兽面纹的上部则刻画了一个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介字形大羽冠，这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王宁远认为，神兽的双重圈大眼也可以上溯到本土河姆渡文化的序列中，因此神兽可以理解成当地土著，而凌驾于神兽之上的神人，则代表着自凌家滩而来的高端分子。在这样



良渚博物院还原的良渚高等级墓葬陪葬品，其中玉礼器众多



左图：良渚古城反山王陵是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内同时期最高等级墓葬

右图：良渚文化持续了一千年，古城地层众多

的结合之下，良渚形成了一个本土人和外来人都认同的天神形象，可以说良渚几乎达到了一神教的状态，统一了宗教和信仰。

宇宙空间的构想

玉琮是神人兽面纹的重要载体，也是良渚宗教独创的核心礼器。

在墓葬中，玉琮通常被放在墓主头侧、手边或者套在手臂上。有些会作为特别的底座，用来插放豪华权杖。方向明推测，玉琮在墓葬中与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方式也许差不多，因为在良渚古城钟家港河道等地，也曾出土过残缺的玉琮，不太可能是制作过程中破掉的，而可能是玉琮在日常使用时的损坏。

玉琮内圆外方，中部贯穿，四角对称施刻四组相同的图案，四壁有纵向直槽，是良渚先民天地宇宙观的反映。方向明认为，玉琮正中贯穿的“射孔”与上下端面“射面”的结构组合显示了当时良渚人对于宇宙空间的构想，与萨满教的多层宇宙观一致。沟通上界、人类居住的中界、下界，是萨满教的理想的宗教追求。上界位于“地球”上方，有太阳和萨满的庇护神，天体辅助神有熊、偶蹄猛兽和鸟；下界辅助神是带两条小鱼的猛犸和全能的蜥蜴与蛇；通往上界和下界有入口和道路，各种鸟类往往成为萨满的精灵诸侯，它们既是向导，也是保护者。不过相比于半坡、仰韶彩陶上描绘的二维图案，在良渚社会，玉琮所代表的三维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在史前中国是极其完善和全面的。

玉琮仅出土于高等级墓葬，是良渚社会通天地、敬鬼神的重要宗教法器。在所有良渚出土的玉琮中，



1986年于反山王陵第12号墓出土的一件，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其4个直槽上刻画的8个神人兽面纹是目前考古学者们公认的最完整构图。

李新伟更多从红山、凌家滩代表的宇宙观念来理解玉琮上的神人兽面形象。他认为，神徽上方的神人，象征着正在羽化变成鸟的人，他就是良渚的王，既是通天统地的神灵，也是征战四方的英雄，还是治国安民的王者。神徽下方的兽面，则代表着天极之兽的动物形象，在红山、凌家滩的宇宙观念中，神鸟可以协助天极之神运转，化作神鸟的良渚王参与到了与天极之神的沟通中，也就是参与到了宇宙秩序的维护中。

方向明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玉琮上的神徽，他认为，神徽既代表良渚统治者自己，也代表他的祖先们，所以玉琮的直槽上才会有那么多重复的神徽。而像反山12号墓出土的“琮王”，其每面直槽上都刻有两个神徽，这证明直槽是重要的“通道”。有意思的是，良渚社会发展到晚期，玉琮越来越高，目前发现的最高的玉琮有50厘米，那就意味着一件玉琮上有更多神徽，更多祖先。

上海青浦福泉山吴家场207号墓出土过一件良渚晚期的象牙权杖，权杖上刻有10个神徽，令人惊讶的是，其神徽形象与良渚早期“琮王”上的神徽形象几乎一模一样，不曾发生变化。实际上在良渚文化存在的1000年里，刻在各类器物上的神徽形象，从外形到结构，几乎都没有任何变化，说明在整个太湖流域，方圆6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大家高度认同，形成了持久的统一信仰。

王宁远的团队近两年试图复原玉琮的制作方法。他们在江苏磨盘墩、丁沙地、良渚塘山金村段、良渚古城钟家港等地都发现了黑色的燧石，其硬度比软玉要高，良渚人就是用它来刻玉。不过切割玉料却不容易。他们发现，无论通过线切割还是片切割的方式，每一刀下去都要起码半个月时间。后来王宁远找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木匠来复原，老师傅制作了许多传统装置，将芦苇或竹子加以固定，向中空的竹管倒灌解玉砂，再转动竹管，这样可以在十几个小时内完成玉琮管的钻孔。

美玉终有碎时

良渚文化在持续了1000年的辉煌后，却戛然而止，全盛的良渚王国迅速衰落，繁盛一时的中心遗址被废弃。关于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在距今4300年到4200年的时候，长江流域曾暴发过洪水，良渚古城里很多河道淤积了。在余杭茅山，他们从遗址堆积中发现了厚约1米左右的淤积层，说明洪水泛滥持续多年，把稻田淹了。

有植物考古学家则观察到，良渚一带按理说是常绿阔叶林，但根据现在的木材鉴定，良渚晚期植被发生了明显变化，常绿阔叶林减少了，专家推测很可能是良渚古城周边的过度砍伐所致。还有学者指出良渚文化晚期可能遭到了龙山文化的入侵。也有人认为，良渚晚期社会风俗崇尚厚葬和享乐，即使在中小墓葬中也能出土不少玉质饰品，社会投



王宁远的团队试图复原玉琮的制作方法

入大量非生产性劳动，导致畸形化发展。

除了这些原因以外，方向明也从玉器本身寻找线索。距今4500年至4300年之间，是良渚文化的晚期。前几年考古人员在德清中初鸣遗址发现过一座良渚晚期的大型制玉作坊，范围有100万平方米，方向明将这里比作义乌小商品市场，因为这里专门制作低端玉器，如锥形器、管珠等，玉料几乎只用硬度很低的蛇纹石，不再见早期高等级的透闪石软玉。与此同时，良渚文化晚期的嘉兴、湖州地区，普通平民的墓里，透闪石软玉几乎不见，人们甚至使用更低端的叶蜡石。这不仅说明，良渚文化晚期手工业分工更细，玉器在晚期已经非常普及，不再只是高等级的人才使用，也带来另一种设想，即高等级的透闪石软玉是否在晚期出现了资源枯竭的现象？

高品质玉资源发生枯竭后，高等级大墓随葬玉器使用蛇纹石的比重都开始增加了。这种硬度只有摩氏3的玉料很软，没法在其上进行精细刻蚀。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到了后期，玉琮上神徽的形象越来越简化的原因。当神徽难以摹刻，神的权威就受到了挑战。虽然晚期玉琮越做越高，玉璧也越来越大，但玉的品质却越来越差，远远不能和良渚初期相媲美。代表身份等级和地位的特殊资源发生了枯竭，对权威和信仰体系是个巨大的挑战。

考古人员还发现，对这个时期的墓葬，他们已经没法判断墓主的性别，因为早期女性佩戴的玉璜突然不再出现了。是女性地位下降了，还是男女更加平等了？

随葬的玉钺也在晚期发生了变化。这种由斧演变而来的玉礼器象征军权和世俗权力，在良渚文化早期墓葬中，通常每座墓只会随葬一把玉钺，且如果上下端装配造型取自神徽的玉瑁和玉镦，则代表等级更高，体现王权神授。但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晚期的一座墓址里，竟然发现随葬了两三把玉钺，这是僭越了，还是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

随葬石钺也在发生变化。有些石钺使用容积凝灰岩打造，硬度很高，有些临平出土的石钺却

极其粗糙简陋。此外还有一些墓葬中，会随葬一把与玉钺外形几乎一模一样的石钺，推测也许是玉钺的替代品。良渚文化晚期，几乎家家户户的墓里都会随葬石钺，有些墓里一下可以出土很多把石钺，作为武器和世俗权力象征的钺的增多，是否代表着当时社会有尚武的风气？或者当时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

都还没有确实答案。

目前学界更公认的一种说法是，良渚文明遭遇了“4200事件”，即史前史的第四次气候事件，也就是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那时在太湖地区，海平面抬升，海水倒灌，真正毁灭良渚的不是洪水，而是咸潮。良渚开始不适宜居住，这种状态持续了整个龙山时代。

“4200事件”后，良渚的政治实体瓦解了，良渚的高级阶层和精英分子待不住了，四散而走，被其他族群吸纳。王宁远将这比作“技术移民”，良渚的高端技术和先进的意识形态被他们带往外地，知识体系和政治组织形式传播到其他族群，玉琮作为高端文化因子也因此流传出去。

方向明在采访中为我们列数了现在所能见到的、直接受良渚影响的文化考古遗址。良渚之后的龙山时代，良渚玉琮最北传到了石峁文化所在的陕北，在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以及新华等龙山时代的遗址中，都出土过良渚式的玉珠、玉钺、玉璧和玉璋，以及V字形石刀。其中玉琮不仅四面有竖槽和分节，还刻画出与良渚玉琮一致或相似的图案，显然是直接吸纳或借鉴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晚期玉璧和玉琮上的鸟立高台图符，在龙山时代更加流行，并发展成为主流文化信仰。近年来浙江好川墓地、温州曹湾山墓地，以及山东莒县陵阳河等遗址，都出土过有鸟立高台图符的玉器。石峁文化的祭祀方式从对神圣空间的打造，到与天极之神的交流，也与良渚极其相似。此外同处于龙山时代的山西陶寺文化遗址中，也出土过明显的良渚风格玉琮。

最南，良渚玉琮传到了粤北和珠江口，石峡马坝和英德岩山寨出土过良渚玉琮。尤其地处广东韶关的石峡文化马坝人遗址，出土过大量玉琮、玉钺、玉璧、锥形器。最初学者们根据出土玉琮又高又瘦的特点，认为这一地区与良渚文化晚期交往频繁，但后来方向明根据出土的两件带有良渚早期风格的龙首纹玉镯推断，这里与良渚早期就开始相互交往。不过，良渚典型的陶器在这里的出土量很少，方向明认为，此地日常生活中用的坛坛罐罐都是自己创造和生产的，但所用玉礼器却是来自遥远的良渚，这说明两地共享着相同的精神信仰，这对多民族的中国来说，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西，良渚玉琮后来在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都很流行，但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改制。良渚玉琮在内圆外方的结构之外，外壁呈现一种弧突状态，但在商晚西周初的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其外壁的弧突消失了，只剩下纯粹的方与圆。

在二里头、殷墟等许多夏商时代的遗址中，考古人员也都发现了源自于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钺等。后世礼玉的器种大部分源于良渚文化，其中玉琮的装饰纹样及技法还被青铜礼器所吸收。良渚玉琮所代表的宇宙观和信仰体系，同样为夏、商、周三代所继承和发展。商代青铜器营造出上、中、下三界，马王堆帛画也描绘的是上、中、下三界，上界有天门，中界是人间，下界有大鱼。三星堆的神树，也像玉琮中部贯穿的“射孔”一样，代表着沟通上下的中界。

“我认为历史特别是考古学文化所展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区域内的一个延续的过程。中国历史的无间断性，更是要求我们在一个过程中连续地看待文化现象。从以玉器为线索的文化现象看，良渚文化并不存在灭亡的问题，良渚文化的因素在良渚文化以后的时代，融进了一个更大的范围之中。”方向明说。

良渚玉琮后来在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都很流行，但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改制。

良渚时期的稻作农业

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到良渚时期，这里的稻作农业极其发达，进而解放了一大批人不用去打猎，由此产生了详细的社会分工。莫角山宫殿区东侧，有一条超一公里长、贯通古城南北的人工河道钟家港古河道，河道两侧台地上遍布一排排玉器、漆器、木器、骨角器等手工作坊，只有高级手工业从业者才有资格在这里工作。有意思的是，也许由于陶器过于普通，或者怕污染环境，在钟家港河道两旁并没有制陶作坊。

古城内没有农田，所有农田和农民都在城外。古城外，乡野、村落与稻田相间，与如今的江南水乡风光相似。2021年王宁远的同事王永磊他们在余姚施岙发现了一片80万平方米的古稻田，配备完善的灌溉渠、田埂、注水口、排水口，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这处稻田在良渚时亩产可以达到140～150公斤。

良渚古城外东北和西北部，分别有瑶山和汇观山两座高台祭坛，不仅用于祭祀活动，很可能也与观察农业节气有关。学者们通过两年的实地观测，发现冬至日的日出方向正好与两座祭坛的东南角所指方位一致，而日落方向正好与西南角所指方位一致，如果将祭坛移位，则会因为周围山脉的遮挡而无法在同样的角度看到日出日落。

再往外，还有一圈更大的外城和水利堤坝。水坝是近几年良渚考古的着力点，王宁远带着团队通过遥感地图，逐一定位，发现良渚古城周边山上几乎每个山口都有水坝，至今已经找到接近30座水坝。整个水利系统在良渚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储水面，蓄水量可达约275万立方米，不仅可以在涝季防洪，或作为石料和木材的运输方式，还可以在旱季为巨大古城提供用水以及周边的灌溉支持。

站在瑶山祭坛上遥望良渚古城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大坝工程早已超过视距，更不要说那是在遥远的没有遥感、等高线、水平基准点的新石器时代。更让人震撼的是，这一超大规模的城市，曾持续存在了近1000年。以古城为核心的良渚文化更是辐射整个环太湖地区，北至江苏的常州、武进，东至上海的青浦、松江，东南则沿余杭的良渚、瓶窑至嘉兴的桐乡、海宁和平湖。

良渚遗址重要玉器

整理·张星云



玉琮
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986年出土的这件玉琮重达6.5千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琮王”的出土，使考古人员得以了解“神徽”完整的构图。

玉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能代表权力与信仰的一种，为良渚首创。其外形内圆而外方，中部贯穿，上大下小，四角对称施刻四组相同的图案，四壁有纵向直槽。复杂的平面和立面，投射出他们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是沟通天地神人的礼器。玉琮正中贯穿的“射孔”代表人类居住的中界，而上下端面“射面”则代表上界与下界，组合在一起对应了萨满教的多层宇宙观。

玉钺
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雕刻有神人兽面纹和神鸟纹的玉钺，堪称“钺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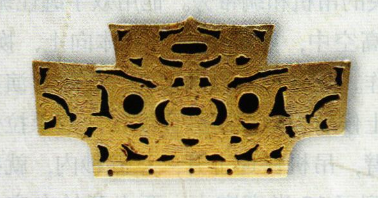
良渚文化豪华型玉钺，会在钺上刻画神徽，并且在上下端装配玉龠和玉镦，玉龠造型取自神徽的羽冠，将神徽羽冠加在代表世俗权力的钺上，那么军权与王权也便赋予了神的意志。这种王权神授的理念，从此延续下来，达数千年之久。直到商周时期，钺仍然是最高的指挥权杖。据《史记》记载，周武王伐商时，“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而商汤在伐夏时，也是“汤自把钺”。



玉璧
反山遗址20号墓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若以单件器面积而言，玉璧当属首位，是良渚玉礼器系统中的重器。良渚玉璧外缘近圆而非正圆，中钻圆孔。玉璧的用料一般与其他玉器的质料有所不同，多呈现斑杂结构，表面肉眼可见纤维状组织。一座墓可拥有数十件玉璧，反山墓地出了150多件玉璧，其中23号女性墓葬出了54件。

玉璧的造型可能是对天体的描绘和物化，《周礼》称“苍璧礼天”，将其视为祭天的礼器。还有学者认为良渚玉璧以量取胜，应是墓主财富的象征。



玉冠状器
反山遗址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除了琮、璧、钺三大类之外，玉头饰也是良渚玉礼器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承担了区分墓主等级身份和性别的功能。在反山、瑶山等高等级墓地中，每座墓都有一件冠状器，而在中等级的许多墓地中，只有地位较高的墓葬才会有冠状器，这反映了它在标明身份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可或缺的地位。将代表神冠的冠状器戴在巫师和首领的头上，那么巫师和首领便成为神的化身，这也正是良渚文化神权统治的一种表现。

玉三叉形器
瑶山遗址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三叉形器出土时多位于墓主人的头部，应是冠帽上的饰件，有的三叉形器背面有钻孔的凸起，以便连缀。约半数器件上雕琢有精致的神人兽面纹图案。很多玉三叉形器会与玉管相连。

玉璜
瑶山遗址11号墓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玉璜是从马家浜文化晚期即开始出现的一种玉器，在崧泽文化中是一种表示身份的主要装饰品。良渚文化的玉璜多雕琢或镂刻有神徽图案，主要出自良渚早中期的女性墓葬。这样的传承表明，玉璜从崧泽文化的装饰和显示身份主要功能，统一转入了良渚以神人兽面崇拜主题为核心的玉礼器系统之中。



（参考资料：《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浙江省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本文图片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一位大龄杂技演员，从高空坠落

记者 · 吴淑斌 陈银霞

看起来，孙艳艳确实是“有天赋”的演员。虽然“半路出家”，但她已经多次参加高难度的演出。在过往的演出视频里，她拉着一个大吊环，身体像蛇一样柔软地缠在吊环上，升上十几米的高空做出腾空翻转、倒立等动作。她也表演过坠亡当晚的那套动作——如果没有发生意外，她应该在高空中用双手钩住搭档的脖子，然后快速一跃，用双腿夹住搭档的身子，整个人轻盈地倒挂在空中。

致命“脱靶”

一台吊机升出十几米长的大臂，大臂尽头的钩子上挂着两条米白色绸带。男演员把双手手腕和绸带缠绕在一起，后退一两米，为助跑做准备。穿着蓝色演出服的女演员从舞台左侧走过来，双脚踩在搭档的脚背上、男演员搂住她的腰。在炫目的灯光和充满动感的音乐中，两人向前小跑，吊机大臂加速升高。这对搭档开始了今晚的第二次合作，在此之前，节目已经进行了近8分钟。

这是4月15日在安徽省宿州市蒿沟镇尹楼村举行的一场演出，是当地首届文冠花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的一部分。蒿沟镇是全国有名的马戏之乡，驯兽、表演马戏的历史已经有上千年。最近十几年，随着抵制动物表演的呼声越来越大，以及对马戏团“顶梁柱”老虎的运输管理日趋严格，马戏表演随之没落。为了寻求转型，当地开始种植有药用价值的文冠花。4月中旬正是文冠花开花的季节，今年是第一次以文冠花主题设置文旅节。舞台就搭在尹楼村村委会门口五六十亩的空地上，现场人山人海，当时在现场的何欢欢估计，“至少来了三五千人”“水泄不通”，挤在人潮里的她感到“温度都升高了一点”。

晚上8点30分左右，几个唱歌节目结束后，来到了整个晚会最刺激的节目——高空杂技。演员还没登台，大屏幕上已经开始播放他们的介绍：“魅力舞姿、傲行天下”“中央电视台嘉宾组合——影子组合”。“影子组合”由38岁的男演员张凯和36岁的女演员孙艳艳组成，他们是一对夫妻，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表演组合，曾经在《黄金100秒》《中国达人秀》等综艺节目里亮相过。舞台的大屏幕上播放着他们在电视台的表演录像，两人悬挂于绸带或大铁环上，在高空中旋转腾挪。

让人眼花缭乱的视频和隆重的背景音乐中，男演员先登场了。他做了两个后空翻，从舞台右侧落到中央的吊机和绸带旁。他用双手缠住绸带，独自升到高空中，熟练地做出引体向上、换手、劈叉等动作。几分钟后返回地面，此时女演员已经在舞台上候着。她双腿缠住绸带，双手拉住男演员的手臂，吊机快速上升，三五秒内，就把这对搭档带到了15米高空中，两人开始在空中旋转。“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主持人激昂的语气回荡在夜空中，“我们要演就要演真实的！”

在现场的何欢欢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舒服，是一种隐隐的不安。吊机上升速度很快，加上那天风很大，扬起地面的沙尘，也摇晃着空中的吊机。此前男演员的独演环节，他被升到五六层楼的高度时，何欢欢看到，吊机的钩子和两根绸子都在风中“荡着”。两人升空开始旋转后，长长的绸带在空中画出大圈，“感觉离心力挺大”。女演员还在一边做着动作。她的双手已经移到搭档脖子处，钩住脖子的同时双腿向后翘起，整个人悬挂在搭档身上。但还没来得及做下一个动作，她突然脱手，从十几米高空中直直坠下。

台下传来一阵惊叫声，“掉下来了？！是掉下来了吗？”观众席里的人们大声地相互询问，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可置信。何欢欢一时也没有反应过来，起初，她甚至以为这是节目设计的一部分。但站得靠前的观众看得真切，“真的掉下来了！”甚至还有人听到女演员着地的脆响，清晰的“砰”


（插图：老牛）

的一声。

嘈杂的观众区忽然陷入寂静。舞台上的背景音乐也停了下来，只有大屏幕还在轮流播放着“影子组合”的表演视频和当地的广告片。在闪烁但沉默的缭乱荧光中，吊在空中的男演员被缓缓放下。他冲到女伴身边，急切地跟周围的人比画、叫喊着什么。一位参加了现场救援的村医向媒体回忆，当时女演员躺在地上，“心跳达到96，脉搏35，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从演出现场到市区医院有40分钟车程，但更大的难题是，现场的人和车太多了，距离舞台三四公里远的地方都停着来观演的车辆，原本只能容纳两车交会的村道已经被占用了一半，救护车根本不可能开进来。

最后，女演员被救援队用担架抬出去，送上了救护车。事故发生大概20分钟后，演出又重启了。但现场观众已经散去一半，几位歌手唱了三四首歌，主持人便草草宣布活动“圆满结束”。那天晚上，何欢欢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才知道，坠落的女演员孙艳艳在抢救三个多小时后去世了。后来的调查通报认定，承办方“演出过程中未提供必不可少的演出安全应急防护，违规使用吊车吊人，操作不规范”。

岔路口的选择

4月下旬，一阵寒潮席卷了北方好几个省份，其中就包括河南省永城市。孙艳艳的老家在永城市西南方向的村子，连续两天的大风、暴雨过后，这个三四百人的小村庄更为冷清，只有村里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显出一丝生气。孙艳艳家就在一条小路尽头，是一栋灰白色外墙、红瓦斜顶的两层村居，门口还用活动板搭了一个储物用的大棚。



高空绸吊是高空杂技里比较成熟的项目。正规演出时，需要在有“顶”的场所进行，以固定绸带

坠亡事故后四天，家里为孙艳艳举办了葬礼。本刊记者是在葬礼结束后第二天到达村子的，村里一位个子矮小、有轻度智力障碍的姑娘指着远方麦田中央，“艳艳就埋在那里”。

几乎所有村民都知道这起悲剧。村里学杂技的人不多，36岁的孙艳艳是中年人里唯一的一个。和很多杂技演员不同的是，孙艳艳并不是从小学起的“童子功”，而是在二十出头时，才突然选择了杂技。

“当初就不该让艳艳入这一行。”孙艳艳的叔叔看起来很疲惫，他正在帮村里盖房的人家砌墙，说一句话，叹一口气。那几天，孙艳艳父母和孩子的精神状态恍惚，许多后事都是叔叔婶婶操持的。他和妻子都劝过孙艳艳，像村里其他姑娘一样，在县城里寻一份卖化妆品、收银这样的普通工作。在他口中，干杂技“就是受罪的活儿，很穷苦人家的孩子不得已学的”。

孙艳艳的家庭算不上“很穷苦”。永城市是商丘市代管的县级市，因为拥有煤矿资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水平在全省一骑绝尘，至今仍是全国百强县。30多年前，在县城开运煤车、收煤渣、做矿场食堂师傅等一系列和煤矿有关的工作，都是不错的选择。孙艳艳家离煤矿资源集中的老城区只有两三公里，父母长年种地，年轻时也曾在老城区打工，靠着“半工半农”，这个家在村里的条件中等。孙艳艳在家中三个姐妹里排行老大，长得清秀，大眼睛、鹅蛋脸，从小留一头黑长发，“在村里见人就打招呼，爱笑”。一位小学同学至今记得，孙家父母很疼爱这三个女儿，三姐妹常穿新鞋子，“一人一双，不是大的穿完留给小的”。

等到孙艳艳长到十几岁时，煤炭资源带来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千禧年起，永城市的煤矿开始限制开采，整个城市的发展中心向老城东北方向二三十公里转移，在那里，一座新城拔地而起。这一头，孙艳艳十五六岁辍学，到沿海的发达省份打工。没有特别的技能和学历，她辗转在江浙一带：去过上海，在一位老表开的饭店里做服务员和后厨帮工，也短暂地进过纺织厂、制造厂，一年到头忙得只有春节才能回家。

这样的经历，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高度相似，就像一列列驶上既定轨道的火车。直到二十出头，孙艳艳遇见了如今的丈夫张凯，才在轨道的岔路口选择了一条与别人都不同的路——学杂技。

张凯今年38岁，因为长年在外演出，皮肤晒得黝黑，这反而让身材显得更加精壮。在张凯过去发布的短视频里，他总是穿蓝色演出裤，赤裸着上身，露出饱满的肌肉。这种力量感是一名男性高空杂技演员必不可少的，但张凯练得比其他人都要好，下的功夫也多。他曾经在自己的短视频里说，没有演出时，自己会在家里客厅做100多个俯卧撑。视频里，他做俯卧撑的速度快，动作也标准。

张凯练杂技已经超过20年。他的老家在商丘市另一个县城的村庄里。这是一个比永城市穷困的地方，张凯的邻居叔叔记得，“三十几年前连电视都没有，出门打工不敢跑太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张凯家里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对于只靠种地养家的父母而言，负担不小——

一直到现在，村里许多人盖了小楼，张凯家依然是三间平房。十二三岁辍学后，因为年龄太小无法打工，张凯选择到十几公里外的“杂技村”温良村学杂技。

温良村流传着一句俗语，“喝了温良水，傻子也能踢两脚”。村里遍地是杂技艺人和私人杂技团，招人的方式更像是传统的“拜师”，学员交很少的学费甚至不交钱，就能加入团里学习，同时要无偿参加团里的演出，偶尔也能分到很少的一点收入。在这里，杂技学徒的学习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十几岁的孩子，每天花七八个小时练劈叉、下腰、肌肉训练等基本功，稍微大一些，才开始学具体的表演节目。

练杂技是个辛苦活。张凯的大哥曾经也学过杂技，邻居见过他在家练气功，一块木板钉满三四厘米长的钉子，人躺上去，“一不留意，背上就戳出血印子”。和张凯一起去的还有同村另外三个十几岁的孩子，几个月后都跑回家了，只有张凯坚持下来。那时，他练的是耍猴、骑独轮自行车之类的简单节目，开始能跟着杂技团到沿海富裕的村子里“巡回”演出。演出结束后，需要有人拿着碗向观众收钱或是粮食，年纪小的张凯就承担了这一角色。邻居记得，张凯“能说会道，从来不怯场，还能讲两句俏皮话”。

孙艳艳的亲人们对张凯的过往并不了解。以前，“杂技”很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直到听说孙艳艳找了个男朋友，“家里好几个人是搞杂技的”；再后来，孙艳艳干脆自己也要学杂技。“她想能和男的在一块，两个人一起出去表演做个伴。”叔叔虽然觉得不妥，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心里琢磨，杂技这样高难度的身体动作，“不得是小娃娃开始学起吗？”

“刀头舐血”

孙艳艳最常出现的舞台是在各个县城或乡镇。安徽、河南一带的农村地区习惯在举办“红白事”，或是村里各种大大小小的节日时，邀请唢呐班、杂技演员或戏曲演员来“热场子”。场子说不上专业，但有股热闹劲儿，音响的音色嘈杂浑浊，鲜艳的灯光照在亮晶晶的演出服上，混杂出怪异的颜色。这些年来，她和丈夫就辗转在安徽、河南交界处的不同小城，回家的次数也更少了，住在同村的表妹甚至不知道孙艳艳做的是高空杂技表演，“一直以为是平常的酒席演出，真不知道会是这么高风险的工作”。

演员在空中需要变换动作，一般不会在身上系保护绳，但平时训练，不影响演员助跑的前提下，会在地面铺设一张很大的弹性安全网。

所有杂技项目里，高空表演的风险是最大的。张凯的一位朋友杜明也是高空杂技演员，他有些夸张地将之称为“刀头舐血”。杂技演员身上少不了大大小小的伤痕，表演时间长了多少都会习惯，但高空表演“只有一次失误机会”。

在高空杂技领域，绸吊表演是个相对成熟的项目。今年44岁的尹国富从事杂技行业已经快30年，如今是河北吴桥一家杂技学校的高空杂技教师。他告诉本刊记者，演员在空中需要变换动作，一般不会在身上系保护绳，但平时训练，不影响演员助跑的前提下，会在地面铺设一张很大的弹性安全网。更重要的是，正式表演高空杂技时，需要在有“顶”的室内才能进行，舞台顶部有一个固定点用来连接钢丝，再把绸带连接在钢丝上。现场通过卷扬升降机来控制演员的上升高度，根据排练时设置好的升降速度和节奏，用电脑精准操作，保证绸带的稳定性，“不会因为升降太快，或者风大，突然变得晃晃荡荡”。

但安全而理想的舞台，几乎只存在于中高端剧院里，科班出身的知名杂技团才能享用。孙艳艳、杜明这样的民间杂技演员，在整个行业里占了八九成，他们的舞台往往是农村大地。在孙艳艳以往的许多演出视频里能看到，舞台不大，三米多宽，拉一块大幕布做背景；有时甚至连舞台也没有，演员直接在沙土地上表演。室外没有“顶”，也就没有固定绸带的地方。行业里的默认工具是吊机，吊机大臂下方的钩子连接着绸带，与演员的身体相互缠绕——尽管“吊机吊人”在安全规范里是被绝对禁止的。吊机一般由演员自行联系，

看起来，孙艳艳确实是"有天赋"的演员。虽然"半路出家"，但她已经多次参加高难度的演出。

承办方负责费用。杜明说，演员和吊机师傅之间能看懂简单的手势，但"谈不上默契和配合，演出当天，哪台吊机有空就哪台来"，升空的速度也无法准确控制。孙艳艳从高空坠落那天，现场的人都能看到，吊机上升的速度太快了——这很可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在张凯的解释里，夫妻俩选择做高空杂技表演，一是因为"成家后条件不好，没别的本事"，二是2010年前后正好遇到高空杂技市场发展的火热期。那时候，尹国富所在杂技团的高空杂技演员一天要扑两三个场子，即使这样，也无法应付巨大的市场需求——从大城市的剧院，到县乡的文艺汇演，"都想要高空杂技"。尹国富觉得，一方面是因为马戏表演数量逐渐减少，杂技行业的关注重点逐渐从"与兽共舞"转移到演员本身功力上；另一方面，简单的喷火、走钢丝等节目已经不够看了，人们更愿意为观赏性、刺激性更强的高空杂技掏钱，杂技界也掀起了一股"绸吊热"。高空绸吊成了杂技团的必备节目，一个百人的杂技团有四五组绸吊人马都不算是稀罕事。

当大批演员进入高空杂技领域后，为了能在行业竞争中立住脚，大家心照不宣的是，表演的节目难度越大，越惊险，演员就能接到更多的订单，拿到更高的出场费。"观众图的就是刺激，背上加一条绳子，就没有心跳的感觉了。"杜明说，高空杂技常常需要做出助跑、空中翻转等动作，系在演员身上的安全绳可能成为干扰。至于安全网，"在舞台上铺一块那么大的垫子，成本可能比请我们演出都要高"。演员们唯一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办法，就是检查吊车的钩子和绸子勒得是否足够紧，以及看看搭档有没有身体上的不适。当然，也很少有演员给自己买保险。一般杂技公司的正式员工，才会有公司买的团体险。本刊记者接触的几位民间杂技演员都没有给自己买保险。他们说，个人买保险很麻烦。因为本来就是高风险工作，买保险的限制很多。

虽然有这么多风险，孙艳艳还是在高空杂技发展的"黄金时期"入行了。尹国富说，高空绸吊表演的关键是强大的臂力和身体平衡控制力，每天让演员锻炼手臂肌肉、练习走钢丝，1米、2米、3米，慢慢抬升高度。一位有着七八年基本功的杂技演员，至少需要一年、1000多小时的训练，把动作练习到形成肌肉记忆，才能从事高空杂技表演。张凯的一位同行告诉本刊记者，张凯曾特地到山东的一所杂技学校学习高空表演，加上他小时候的杂技习练经历，算是有些功底。但孙艳艳跟着他一起学时已经20多岁，成年人从零基础开始学杂技，并很快成为高空杂技演员，这样的发展路径还是让尹国富觉得震惊。尹国富所在的杂技学校里设有速成班，可以招收零基础的成年人，但只是学骑独轮车、走钢丝之类的简单项目。即便这样，也"要很有天赋，而且比别人多吃了好几倍的苦，才可能两三年时间走完别人八九年的路"。

看起来，孙艳艳确实是"有天赋"的演员。虽然"半路出家"，但她已经多次参加高难度的演出。在过往的演出视频里，她拉着一个大吊环，身体像蛇一样柔软地缠在吊环上，升上十几米的高空做出腾空翻转、倒立等动作。她也表演过坠亡当晚的那套动作——如果没有发生意外，孙艳艳应该在高空中用双手钩住张凯的脖子，然后快速一跃，用双腿夹住搭档的身子，整个人轻盈地倒挂在空中。

"明星"陨落

举办葬礼那天，村里少见地来了许多"外人"，都是孙艳艳四处表演时认识的同行。孙艳艳家门口的大棚外堆满了悼念的花圈，孙艳艳13岁的儿子和不到10岁的女儿跪在大棚的角落里烧纸钱，不停地给前来悼念的宾客鞠躬回礼。

在安徽、河南交界处的许多县城里，这对夫妻搭档是小有名气的"明星演员"。包括杜明在内的好几位同行觉得，他们的技术在小圈子数一数

二,“动作难度大,敢升得高,在空中能翻转的圈数也多”。如果不是特地提起,没有人能看出孙艳艳是大龄入行的演员。另一位舞蹈演员梦玲印象最深的是孙艳艳的豪爽,“从不斤斤计较,忘了带演出的袜子或是其他什么东西,问她要,没有不给的”。一些小型表演没有主持人,孙艳艳就担起主持人的角色,丈夫表演时,她在一旁调动气氛,声音利落,“看看男演员这个肌肉,这个力量,还不多给点掌声!”有时同场演出,其他演员临时有事,找她对调出场顺序,孙艳艳和张凯也是二话不说就应承下来。

他们的勤快和能吃苦在圈里是有名的。2017年,梦玲曾经和孙艳艳一起在大理的剧场排练一出舞剧。那是孙艳艳少有的进入大剧场的机会。她白天排练、晚上演出,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每周才有两个空闲的半天。即便如此,孙艳艳还是挤出时间考了驾照,就为了以后到外地演出时,自己能和丈夫交替着开车。杂技演员们往往会加入三五百人的微信大群,群里常常有演艺公司发单,“× 月 × 日晚,×× 县城,需高空节目一个,有时间的私(信)”,一场演出根据规模大小和节目难度不同,演出费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接单群里,张凯出现的频率很高,杜明翻看了今年3月某一周的记录,发现张凯一周内接下了8单。如果那晚没有发生坠亡意外,孙艳艳和张凯结束宿州的演出后,马上要驱车赶往30公里外的亳州,开始第二场表演。

也是因为这样,他们的经济条件有了不小的改善。“前些年,赚了很多钱。”即使对侄女从事杂技行业并不放心,叔叔依然为孙艳艳的成绩感到自豪,“他们在永城新区买了两套房了”。在张凯老家的村民看来,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他的邻居数了数,“村里能在县城里买房买车的,不到十分之一”。结婚后,张凯通常只在春节时才会回家,待上一天就走,村里人对他的评价依然不错,“孝顺,会把钱转给留在村里的两个哥哥,让他们照顾父母”。

不过,过去三年的疫情打破了他们向着好生活继续前进的步伐。往常,夏秋两季是演出的旺季,跑得勤快的杂技演员一个月最多能接近20场活动,一年下来,平均每个月挣七八千元不是难事。但疫情期间是杂技演员们最难挨的三年,“红白事一切从简,没人敢办大活动,能不能接到活儿、接到了能不能演,全看命”。有时候,接单群里大半个月都没有一个单子,杜明还有过好几次“接单”后又被临时取消的经历。那三年里,他还受过一次伤,有一年多行动不方便,但总的工作收入并没有比同行差太多。

也正是这样,4月15日的那场演出让孙艳艳和丈夫难以拒绝。这是一个久违的大场面:现场来了几千名观众,演出舞台有七八米宽,背后还有一块三四米高的电子大屏幕。按照以往的经验,杜明估计,那天晚上孙艳艳和丈夫的演出费用能达到1500元一场。

看得出来,张凯也抱着很高的期待。从那天中午开始,他发了三条短视频,第一条是坐在面包车的驾驶座上,“我现在正在赶往宿州的演出,今天的演出规模比较大,会来不少网红”。随后,他又发布了现场正在搭建舞台的视频,号召网友关注孙艳艳新注册的短视频账号,以便收看节目直播。

不过,孙艳艳似乎并不打算把账号用来宣传杂技。她的账号简介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母亲,写着“记录宝贝的日常生活”。她也有过转行的想法。疫情期间,孙艳艳曾经和家里人提起,夫妻俩长年奔波在外,靠父母帮忙带孩子,“对老人和小孩都不是好事”。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她今年已经36岁,在杂技圈子里是“大龄”杂技演员。因为生育过两个孩子,最近几年,她的身材也明显发福。无论从观赏性还是安全性上,她都不再适合从事高空杂技。但要放弃这个十几年来赖以生存的技能,孙艳艳同样难以下决心。她后来和梦玲说起,“不知道是该再拼两年,给孩子多攒点钱,还是退下来陪他们更重要”。就像朋友间所有家长里短的闲聊一样,她们没有就去留得出什么结论,很多时候,生活的惯性总是大于个人意志。对话框的最后,孙艳艳发了一个笑脸表情,结束了那次关于未来的讨论。

(文中孙艳艳、杜明、梦玲、何欢欢为化名)

防范性骚扰：权力上位者有更大的责任

主笔 · 王海燕

2023 年 4 月以来，国内文化圈曝出了几起涉及性侵和性骚扰的指控。被指控的涉事者包括知名出版品牌的创始人、地标性城市书店的从业者，还有青年作家、著名编剧等等。

绝大多数指控和争论都指向性骚扰。一些人质疑涉事女性为何不报警，但到目前为止，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仅仅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并不涉及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也并不会被公安机关受理。而大众语境中的性骚扰，则意义宽泛，涵盖了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和性侵犯等多种行为。同时，即使在法律概念之下，性骚扰的定义也是模糊的。这成为迄今为止，人们讨论性骚扰事件时，无法达成共识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女性维权工作的公益律师，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对国内性骚扰相关法律法规有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也曾无数次经历性骚扰维权中的举步维艰。在他看来，从基本概念和特征出发，重新厘清性骚扰的定义和构成要件，重新梳理性骚扰当中广泛存在的权力不平等，格外重要。我们就最近发生的讨论对他进行了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先跟您厘清一些基本概念问题，就是目前我们说的性骚扰，在法律上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吕孝权：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一个人如果对他人实施了性骚扰，承担的法律责任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民事侵权责任，当事人可以自己去发起诉讼。根据是 2019 年 1 月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当时规定，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可以作为独立案由发起诉讼。而在那以前，如果你遭遇了性骚扰，只能以一般人格权纠纷、特殊人格权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对施害人发起诉讼。

这里一定要区分清楚，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性骚扰不是性侵犯。大众经常说的性骚扰，还有一部分其实是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如有偷拍偷窥行为、多次发送黄色信息，包括在公共场所裸露身体、猥亵他人，更严重的就是强制猥亵和强奸相关的刑事犯罪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多名女性指控某编剧性骚扰事件，很多网友会提到当事人为什么不报警。

吕孝权：在公安机关里，并没有性骚扰这个独立案由。但如果公安机关认定了猥亵，做出了拘留或者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个时候当事人再去发起民事诉讼，去打性骚扰损害责任的官司，法院基本上都会认可。但反过来，一部分性骚扰就只能进行民事诉讼，公安机关不会受理。

民事诉讼的基本证据规则是：第一，谁主张谁举证；第二，适用优势证据规则，就是双方都可以向法庭举证，看谁的证据更占优势。这是民事诉讼跟行政处罚不一样的地方。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性骚扰跟一般的民事侵权案件不一样，带有很强的隐私性和隐蔽性，加上当事人一般处在弱势一方，举证能力比较低，这就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回到一个基本问题，现在法律层面对性骚扰是如何界定的？

吕孝权：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只有三部法律法规具体提到了性骚扰：一是 2012 年国务院出台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其中第十一条提到，“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二是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也提到了性骚扰，指出违背意愿是性骚扰的构成要件，并突出强调了权力不平等关系中的性骚扰问题。

三是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修订版《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中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均做出了与性骚扰相关的规定。这几条规定都沿用自《民法典》，但在具体规定上有所延伸，指出了“性骚扰”可以是语言、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各种方式。

其实这几部法律法规对性骚扰的界定都不明确，所以现在司法实践中很多东西就难以说清。不过有个特别好的消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今年3月8日，就是妇女节当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印发了《工作场所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制度（参考文本）》和《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的联合指导文件，其中第二条提到，“本制度所称的性骚扰是指，违反他人意愿，以语言、表情、动作、文字、图像、视频、语音、链接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他人产生与性有关联想的不适感的行为，无论行为实施者是否具有骚扰或其他任何不当目的或意图”。

这个文件真是向前跨了一大步，因为直接对职场性骚扰下了定义，还指出了三个构成要件：第一，违背受害人意愿；第二，施害人的行为中，只要有性含义，无论是何种形式、何种企图，都构成性骚扰；第三，性骚扰的界定只参考受害人的主观感受，不需要考虑或追究施害人当时的主观目的或主观情绪。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这是跨了一大步？

吕孝权：最大的进步是第三个构成要件，因为我们实际遇到的案子中，很多上司或者老师都会说，自己的行为是一种关爱、关心和照顾。这个东西你就扯不清楚了。但联合指导文件明确说，只需要考虑受害人的主观感受，不需要考虑或者追究施害人当时的主观目的或者主观情绪，这就很好判断了。

三联生活周刊：但这个文件作为一个部门文件，其效用位阶其实是比不上法律的，在司法审判中，目前是不是还只能作为说理的依据，还不足以直接作为审判依据？


（视觉中国 供图）

吕孝权：作为部委联合指导文件，这份文件确实属于指导性文件，没有法律强制力，但是对于规范的相关部门（比如处理职场关系的部门）在此类问题上的处理，应当还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法院判决应该不会直接引用这个文件，但在说理部分，可以变成法官自己的语言。如果从未来努力的方向来说，我希望它能被吸收到司法解释、行政法规，最好是直接吸收到国家法律里面去。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我们具体到最近被讨论的性骚扰事件，其中最被广泛讨论的某知名编剧性骚扰事件，实际上提出指控的女性和这位编剧之间并不存在事实上的雇佣或上下级关系，怎么看待她们指控的这些行为？

吕孝权：在学术界，有人把性骚扰分成两种，

一种叫作交换型性骚扰，一种叫作敌意环境型性骚扰。对慕名而来的粉丝和崇拜者实施性骚扰，正是交换型性骚扰的一种，也属于广义的职场性骚扰范畴。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这个也属于职场性骚扰？

吕孝权：因为它具有职场性骚扰的基本特点，就是权力不平等。

三联生活周刊：交换型性骚扰可以展开讲一下吗？因为在这类案件中，很多人的确会指责受害者有所图。在司法层面，大家是怎么看待这类问题的呢？

吕孝权：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种情况，当受害人提供了一些聊天证据，施害人往往会给出更全面的聊天记录，其中肯定有一些逾越师生界限、逾越领导与下属界限的异性交往信息。比如一个领导对下属说"我特别想你"，女生就回复一个笑脸。

这样的证据一旦拿到法庭上，当事人原来提供的证据基本就被排除了。因为法官往往会认为，施害人的行为并未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也就是看起来双方自愿。但这种自愿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自愿，而是基于权力不平等导致女生做出违心的处理。

所以聊天记录仅仅是一种表面证据，还应该综合考察全案事实，做全案证据审查。比如双方当时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关系、角色互动关系等，进而考察"如果受害人在完全不受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处理吗？"，很多人显然都不会啊。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吕孝权：因为大多数人甚至办案机关其实都没有意识到，性骚扰的本质特点就是，没有赤裸裸的直接肢体暴力，而是施害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职权和身份便利对受害人施加权力控制、心理强制或者精神强制，使得被害人不敢反抗后，达到骚扰甚至被侵犯的目的。

我一向有个观点，当我们碰到这种案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第三者的身份来旁观，而是应该学会换位思考，学会身临其境。如果一个人能决定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升职加薪、能不能继续得到工作资源时，你很难直接表示拒绝，更难以特别赤裸裸地去训斥这个人。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实际参与办理这类案件时，碰到的施害者，他们一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行为？

吕孝权：他们当然都会说，这是一种关爱、一种欣赏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不从一个律师的角度，而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您觉得他们是真诚地如此认为，还是在为自己辩解？

吕孝权：当然是在辩解。性骚扰大多数都发生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骚扰对象往往是特定的，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呢？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如果我们假定，有一个标准的交换型性骚扰，比如A对B在名利上有所图，主动接触，导致了性方面的接触，这种情况，B对A是不是仍然构成性骚扰？因为排除外力因素，A对B并没有性意愿。也就是说，为了不陷入性骚扰的指控，权力上位者应该主动拒绝这种情况？

吕孝权：对啊。对于法律不容，世俗道德也不容的事情，作为权力上位者，当然应该主动拒绝、主动防范。但现在太少有人意识到这一层了，很多人都考虑不到权力不平等关系对双方关系的巨大干扰。

三联生活周刊：权力上位者有更大的责任。在采访您之前，我其实也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

吕孝权：所以应该加强学习。另外我也强调一点，目前全社会对遭受性别暴力的被害人，并没有构建起系统性的社会支持资源。

这种背景下，一个性别暴力的被害者做出以下四种选择当中的任何一种，都应该得到充分的理解、尊重和支持：第一，选择隐忍永远不发；第二，曝光后选择私了；第三，告诉后撤回；第四，坚定维权。

与其去苛责受害者为什么不拿起法律武器，我们其实更应该反思，整个社会是否提供了足够良好的各方面的支持资源。■





《漫长的季节》，命运才是最大的悬疑

记者 · 卡生

“关于时间穿过每一个人，到底会留下怎样的痕迹。”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法预测命运，即使预测到了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抵抗，命运才是最大的悬疑。”在北京东四环附近的一个小院里，辛爽终于可以坐下来，在北京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聊聊那个发生在东北秋天的故事。

一部 12 集的网剧，《漫长的季节》从剧本阶段到开播却历时 3 年时间，拍了 107 天，后期制作的时间长达一年。作为导演，其间辛爽像打卡上班一样，重复着每天 12 小时的高强度的剪片工作。后期阶段，辛爽还在机房里不断地调整剪辑。哪里长一帧、哪里短一帧的微调随时都在进行，制片人卢静说：“如果不喊停，他看一次就要调整一次。”辛爽觉得这个事情重要，想尽量做到了无遗憾，“别看只是长一帧、短一帧，一个剧 12 集，累积下来观众一定会看出端倪”。最后一集播完那天，该剧在豆瓣的评分涨至 9.5 分。

悬疑之外

随着前一部《隐秘的角落》大火，找上门来



本组图片：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剧照

的剧本不少，但辛爽觉得很多推进不下去，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卢静和辛爽从《隐秘的角落》就搭档，她给辛爽看了一个叫《凛冬之刃》的剧本，尽管是个典型的悬疑片，但首先抓住辛爽的不是那个发生在东北的碎尸案，而是关于东北生活的一些细节。火车司机王响下班回到家，妻子罗美素在厨房熬中药，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拌嘴。辛爽觉得，“这不就是小时候记忆里东北家庭常见的说话方式吗？”生活质感跃然纸上，感觉很奇妙，他们当即决定，这个剧本可以拍。

《漫长的季节》在三条叙事线索里讲述了前火车司机王响、他的妹夫龚彪以及前刑警队长马德胜追凶的故事。一桩发生在20年前的碎尸案，王响的儿子王阳因此丧命，案件迟迟没有破，所有人都未走出过去的阴霾。

原剧本和后来拍摄的剧本差别很大，但有一点是辛爽和卢静都十分认同的，即以老年王响的视角回溯往事，他需要解决叠加在20年中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辛爽说：“这里面包含两个东西，一个是老年，一个是命运。前者是视角，后者是主题。这个定调有许多可延展的空间。”那起多年前的碎尸案和王阳有何关系？王阳又为何死去？凶手是谁？当年的沈默是死是活？辛爽觉得，讲故事就像缝制一件衣服，案件只是针线，大家最终看到的并不是针线，而是一件衣服。

现在嘴上说来简单，但探寻全片落脚点的过程是煎熬的，头一天想好的东西，总是第二天又被推翻了。有时候几个主创坐一天，一言不发陷入沉默。来来去去，剧本的探讨终于有了眉目：“关于时间穿过每一个人，到底会留下怎样的痕迹。”辛爽说。

作家班宇也加入了编剧团队。在秦昊牵线之前，班宇和辛爽并不相识，但神交已久。辛爽喜欢班宇的小说《冬泳》，“看班宇的小说，可能你最后已经忘记了那个故事具体讲的是什么，但会在你的头脑里留下一些意象。《盘锦豹子》里，最后我记得豹子拿着菜刀跳了起来，在空中如获新生”。班宇对辛爽也印象很深，因为班宇写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乐评，当时辛爽还在做音乐，班宇就是台下的观众和乐评人。

两人深聊之后，班宇重新修改了一版剧本大纲。在这一版里，人物在不同时间线索里的命运得到了深化与舒展，对白里也多了更生动的生活质感。比如李巧云这个人物，原本只出现在过去，但班宇提出应该让她也出现在20年后。她成了王响的一条感情线，老年人也可以有爱情。

原剧本里有三条时间线，1997年、1998年以及2016年。最早的时间线是为制造悬疑服务的，但辛爽觉得可惜了，如果拉开时间维度，看每个人在20年里命运的走向，会有更强的力量。所以，原剧本里无论“探案老年组”王响、龚彪、马德胜，还是剧中各色人物，渐渐有了更深入的性格塑造


导演辛爽

和命运沉浮，悬疑之外展开的其实是一代人的故事。

有一次开会，累了，辛爽和班宇站在咖啡馆门口聊天，班宇聊起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真事。他父亲早年在工厂工作时，从事的是“有害工种”，按照规定可以享受提前5年退休的福利，但到了退休时，他发现要想拿到这个福利，得找工厂在保健本上盖章。“保健本”有时代感呀，辛爽心想，转头就把这个情节放在了李巧云身上。“那种特别生活流的东西，有时候编剧不一定写得出来。”

辛爽对原剧本《凛冬之刃》这个名字一直不满意。说到东北，大家总是想到冬季里飘着鹅毛大雪，暗藏着破败与肃杀，他不想再重复那样的东北。所以，他向班宇借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剧名《漫长的季节》，这原本是班宇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另外就是剧中反复出现的一首诗《漫长的》——“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这首诗在剧中反复出现，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寓意。第一次，是王响进了王阳的屋，拿过儿子的本儿，抑扬顿挫地念起来，演员范伟在这里有一段幽默感十足的发挥，他教儿子写诗要“合辙押韵”，他说：“儿子，诗歌这玩意儿，第一句打个响指吧，第二句应该是吹起小喇叭。”20年后，已经失去儿子的王响温情脉脉地再次念起这首诗时，却让人潸然泪下。

离地半米

编剧于小千写剧本时，脑海里的王响是比照着范伟来写的。辛爽是《马大帅》的忠实粉丝，所以，范伟是他心目中王响的不二人选。他们第一次见面，范伟坐在辛爽对面，一副冷静严肃的艺术家形象，与舞台上截然不同。辛爽心里没底，更加卖力地阐述着王响这个人物。两三个小时后，范伟起身，紧紧握着辛爽的手使劲摇晃了几下。就这样，王响算是第一个敲定的角色。

辛爽觉得，范伟的认同，是理解了他要拍的这个故事。辛爽心里有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东北。在他的描述里，那个东北不只冰天雪地，还有温度适宜的明亮的秋天，路过农田时，菜地里黄灿灿的，周围的小树还是绿油油的，人们穿得不多，在大街上散步。尽管这样的秋季如此短暂，也鲜少出现在东北的叙事中。

和王响相比，龚彪这个角色是较晚才定下的。龚彪在原剧本里是个非常模糊的存在，他一直跟随王响在找真相，却是离案件最远的一个人。“这个人身上没有案件，没有复仇，没有大起大落，只有在20年中把生活过得一地鸡毛的窘态。他的一生是什么样的？又将如何度过呢？”辛爽十分笃定，这个角色需要一个有分量的演员。他想到了曾经合作过的秦昊。

秦昊那会儿正在青岛拍戏，辛爽去酒店找他，和他聊了个通宵。那晚，秦昊问了很多问题，比如龚彪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这只是一个身份背景，不能说是一个人的性格，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辛爽和秦昊讨论了很多人物设定，开玩笑说：“他那个大学文凭是不是真的有也不好说。”

一问一答之间，龚彪这个角色开始清晰起来。那是一个最接近普通人的角色，浑身小毛病，爱吹牛，耍小聪明，嘴上爱杠，但实则心软，还有点理想主义。辛爽第二天要回北京了，秦昊聊了一宿也没松口说拍不拍，那会儿有六七个剧本找他。第二天临走，辛爽去片场和秦昊打个招呼，秦昊说他又琢磨出了好几个人物的特点，和辛爽聊得亢奋。走时辛爽心里有底了，“昊哥开始琢磨人物，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了”。

辛爽不喜欢重复，他喜欢反差，从东北的天气，到人物的塑造，他都希望可以呈现一种新的风貌。筹备环节的最后阶段是寻找拍摄场地。大家印象里，一个东北故事肯定得在东北拍，但辛爽和主创团队跑遍了东北大大小小的城市，工厂大多很陈旧，并不适合拍摄，更何况拍摄周期不允许，没准刚开拍就下雪了，而辛爽要的那个秋天有特殊的意味，那是困住王响让他无法走出来的季节。

美术指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思路，不如换一个季节感相似的地方，比如昆明。一行人去了昆明堪景，进入昆钢。那里一切都是崭新的，铁路边的小花儿摇曳生姿，“这一定是90年代王响心里那个为之骄傲的厂子，那是他一辈子的荣耀”。辛爽很激动，笑称昆钢为“工厂界的迪士尼”。接下来的工作是把昆钢改造成东北的“桦钢”，美术团队在细节上进行了改造，比如在四季如春的昆明给片场里加装了很多暖气片，力图还原一个可信的90年代东北小城。

筹备过程中，辛爽和美术团队建立了一个概念——“离地半米”。他说：“我不追求照相写实的方式，我希望它是美的，看起来很对，但好像又和真实有一些距离。”这种审美风格其实在《隐秘的角落》中便有端倪，尤其是“小白船飞上了天”的场景，曾让很多人费解。到了《漫长的季节》，有一场戏是拍王阳和沈默在夜晚的天台上“看烟花”，王阳拿起一个啤酒瓶子，和心爱的女孩分享自己的秘密花园：每天此刻，透过瓶底看向对面工厂，车间释放的废气就会变得犹如烟花一般绚丽，在空中绽放。

克制与释放

辛爽给自己的案头压力很大，但在现场又会尽量把表演的空间留给演员，尤其是这一次，范伟和秦昊都是沈阳人，他们俩往那儿一站，怎么聊都是符合气氛的。剧中的维多利亚夜总会和桂英烧烤店，都源自《马大帅》，是辛爽暗藏在剧里的小彩蛋。《马大帅》里演员很松弛，很多有趣的台词都是演员现场发挥的，辛爽想要的也是这种效果，“如果大家都按照剧本里的台词一字不差地演，不论台词多精彩，它也是一个死的东西。我的工作就是在剧本阶段做好80%，留出20%在现场让它流动起来”。所以，有时候一场戏拍完了，辛爽会故意不喊“咔”，让演员在镜头里继续。“好的演员这时候不会愣着，他们会下意识地把自己想加的东西往里放，那些在剧本里没有，但放在人物身上，你会看到生活本身。”

有时候，演员还会给辛爽提出一些建议，那是好演员进入角色后的思考。辛爽记得有一场戏，是王阳的尸体在河边被发现，王响拨开人群走向儿子。开拍前，范伟跟辛爽说：“这场戏能不能不要拍我的脸？”辛爽当时没有问为什么，隐约

“我不追求照相写实的方式，我希望它是美的，看起来很对，但好像又和真实有一些距离。”

感觉到范伟想要一个非常克制的东西。后来他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镜头里的王响只有一个背影，能看到他与儿子的脸贴得很近，从缝隙中看见眼泪在往下滴，这比让观众看到他号啕大哭更让人心痛。

类似这样通过“克制”将情绪拉满的拍摄方式在剧里有很多处。罗美素离世前的那一场戏，一开始观众看着很纳闷，怎么失去了儿子的母亲如此镇定，还在亲自准备白事宴，和宾客谈笑？直到罗美素自杀的镜头出现，观众才意识到，一个母亲的世界坍塌了。

有一场重头戏是王响、龚彪和马德胜在KTV里唱歌、热舞，三人第一次在剧中聊起了“命运”。“我们在老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被命运给摁在地上摩擦，我们都还是想跟命运掰掰手腕。”在一次次克制之后，他让人物在这里做了最大限度的释放。

“闲笔”与隐喻

《漫长的季节》刚完播的那几天，网上出现许多解密文章，分析剧中的各种隐喻。辛爽很在乎观众的感受，上网去看了各种猜测、解读和评价。但作为一个创作者，他认为自己应该保持沉默，保有和观众的共鸣空间。

他跟我聊起在傅卫军的录像厅里，沈默和王阳一起看了《泰坦尼克号》的录像带。选择这部电影是预示了人物之间的命运，“泰坦尼克号就像桦钢，在那艘大船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在聊爱情，有的人在演奏音乐，但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撞上冰山”。

“命运才是最悬疑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它会给你发一张什么牌。这也是我最想表达的主题。”辛爽说。

马德胜离开刑警队之后，为什么老年的他要去跳拉丁舞而不是广场舞？辛爽说：“跳拉丁舞是马德胜性格的一种延续。年轻时的马队长对王响说话时口气里透着骄傲，年老的马德胜依然会跟随时代大潮，围着有品位的围巾，喝着时髦的咖啡，要争做某个领域里最出类拔萃的人。”所以当马德胜在KTV里说出“我老了”这句平平无奇的话时，才会让人唏嘘岁月是怎样击穿了一个人。

“不仅王响没有走出那个漫长的季节，剧中的大多人物都还停留在过去，他们缅怀着过去的荣光与青春。”龚彪的妻子黄丽茹，90年代是厂里的厂花，穿着花裙子和高跟鞋，像是从挂历画上走出来的人，在和龚彪生活20年后，特效组专门给她做了鼻子、垫了下巴，还文了当时最流行的眼线，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到她对流行的追求。又比如，曾经一直在打击报复王响的厂保卫科科长邢建春，20年都穿着那件呢子大衣，当时在讨论这个人物造型时，辛爽说那件大衣就是这个人物的身份，过去，大衣板正、领子竖着，好不威风；20年后，大衣领子立不起来了，皱皱巴巴，但他依然没有脱下。

辛爽说，后期制作是他最有乐趣的阶段。辛爽有一双敏感的耳朵，音乐同样是他叙事的一部分。从《隐秘的角落》开始，他就和作曲家丁可合作，哪一首歌放在哪一集都有特别的思量。

每天，辛爽在从公司到家的路上都戴着耳机听音乐，觉得合适的就收藏起来，第二天再到机房一首首试放。但最后一集用到的《再回首》是个特例，这是他在剧本阶段就定下来的歌，“其实这首歌不是给王响的，喊着‘往前走，不要回头’的王响此刻已经不再需要任何音乐，他人生的问题那一刻都解决了。那一刻需要这首歌的是观众，一切都结束了，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那一刻我觉得王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那种情绪不是非要和命运掰手腕，而是知道掰不过命运的时候，还是能仰着头往前。述说过去无非是要抚慰当下。”

剧里最后还有特别的一幕，每个人物面前飘起了白雪，让人们看到了依稀熟悉的东北。辛爽说这个灵感取自班宇写在他的小说集《冬泳》封面上的一句话：“人们从水中仰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班宇看到剧中这一幕时非常动容，他和我聊起，觉得很像是乔伊斯《死者》的结尾：“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纷纷飘落，厚厚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2023.05
少年新知
第五期
少年
我怎么了？
国内统一刊号：
ISSN 2096-9740
CN10-1742/C
邮发代号：82-51
定价：25 元
扫码购买
ISSN 2096-9740

诗喃：普通人的诗歌现场

记者 · 艾江涛

诗喃的核心精神在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在现场用自己的身体表演自己的诗，那种生命经验的、即兴的、真实的在场感，使诗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冲击与力量。

诗喃之夜

傍晚7点，上海五原路92号一家不大的咖啡店里挤满了年轻人。咖啡店里不时传来掌声和欢呼声，引得路过的人时而驻足观望。房间里，一位叫雨浓的女孩正在表演自己写的一首叫《徒劳》的诗。

当她读："以无与伦比的生的意志/向着死亡进发"，台下听众集体读："得到死"；她接着读："在无意义的洪流里/创造意义"，大家一起读："被掩埋"……

表演结束，雨浓解释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大家读的部分，是我创作这首诗时脑海中的背景音。我总会感到虚无。前段时间得了奥斯卡奖的电影《瞬息全宇宙》里两块石头的对话，在我看来就是在探讨虚无。对抗虚无的意义就是自我创造意义。"

随后的表演中，有人扔掉帽子，有人唱出诗歌，有人举起拳头，像击打东西一样读出自己钉子一样的诗句。即时性的表演，即时性的反馈，真诚平等地在诗歌中分享自己的私人感受与经验，这是"诗喃"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诗喃（Poetry Slam），作为一种根植于舞台的口语诗竞演形式，起源于1986年的美国。当时一位名叫马克 · 史密斯（Marc Smith）的前建筑商、诗人在芝加哥举行了世界首场诗喃赛事。赛事基本原则如下：表演自己原创的长度在三分钟内的诗歌；不使用道具；不用音乐伴奏；拍手、跺脚、嚎叫、互动、即兴、吟唱，诗人可以动用各种肢体上的音乐性元素演绎诗歌；现场观众负责打分。这些原则旨在鼓励所有人不受限制地创作、表达自己私人、独特的生命经验。这项反精英、平民化的艺术运动，很快流行于欧美乃至全球。

在国内，诗喃的引入相当晚近。谙熟国内外诗歌界动态的诗人西川在去年年底接受我的采访时还提到，他建议"2022平行诗歌节"专门设一个Poetry Slam的环节，他译为"诗喃诗歌现场"。"我撺掇认识的年轻戏剧导演已经四五年了，现在终于有人做了。这个东西国外的年轻人都玩，诗歌朗诵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诗歌表演。"

去年7月份开始主办诗喃活动的"诗人游击队"，大概可以算是国内最早搞诗喃现场活动的组织。

我在上海参加的那场"诗喃"，主办方正是"诗人游击队"。主要发起人之一腾龙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影视制作专业读书期间，通过电影*Slam*最早了解到"诗喃"。这是一部拍摄于1998年的电影，游走于黑人帮派与监狱之间的男主人公最终通过诗喃的自由表达，完成了自我发现与救赎。2019年底，腾龙毕业回国，断断续续做着一份摄影师的工作。有段时间他失业了，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他跑到上海的地铁站门口念诗，地上摆了一个收钱的二维码，念了两次赚了10块钱，后来因为没有卖艺资格证，被保安赶走了。

2022年7月，上海刚刚结束疫情封控，腾龙和大学同学小白（白尹诗嘉），以及小白的高中同学杨一一起成立了"诗人游击队"，开始寻找可以合作诗喃的书店。起初对方并不明白他们的想法，有的书店甚至开出一小时3000元的价码。后来，"我们找到一家很小的独立书店，老板是在伯克利大学的一名政治学博士。在那样一个半开放空间里，摆了一些椅子，最开始表演的五六位人士，大家差不多都认识。夏天的午后很热，在橙色的雨棚下，还有蝉鸣声。许多路过的人觉得很有意思，围在旁边看，希望加入我们的群。前两期我们都是抱着玩的心态，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的活动。"小白向我这样描述第一次活动的情形。

当时有路人问他们办这种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在总结文章中，他们这样写道："凡事何必追问意义，



诗喃之夜活动现场，一间不大的咖啡厅里挤满了观众

大家不过都是在找一种喜欢的方式消磨时间。在我们看来，读书、写诗不应该是专属于小部分人的‘特权’，也并不只有宏大的叙事才配被记录成文字。有一些朋友在参与后表达了下一次也想要上台的欲望，还有两位朋友开始观察周遭事物，并且已经完成了一次创作，那么，这一次活动就实现了它的价值。那就让我们一同消磨时间，在别人的表述中抢回一些你之所见吧。”

用身体表演一首诗

Fi（刘惠婷）就是当时路过的一名观众。2020年，她在重庆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读最后一个学期，回到山东老家准备毕业剧本时，碰上新冠疫情暴发，出国留学计划泡汤。上海封控期间，她又正好独自一人在这个城市居住，孤独、抑郁、失语。有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完全无法书写，表达不出任何东西。遇到这次线下的诗喃表演，那种摆脱手机世界的真实接触，让她有种破局的感觉。“第一次办活动的地方离我家非常近，当时路过，看到都是年轻人，大家一起做一件看起来有点反叛精神、非常理想主义的事，好像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看到一点希望的感觉，就很想抓住它。”

此后的活动，Fi几乎一场不落，很快和小白、腾龙成为好朋友，并成为“诗人游击队”的核心表演者。Fi此前的写作更偏文本，并没有读诗的习惯。诗喃对她的启发在于诗歌可以变得更加口语化，还可以融入表演的元素。

诗喃表演与诗歌朗诵的区别，最核心的地方在于具有平等、多元的反精英意识。正如腾龙他们所说：“游击队反精英，不需要出版诗，不需要诗人身份；游击队庆祝多元声音；观众，你们拥有主动权，诗人需要赢得你们的耳朵；观众，不要静静听，如果你喜欢什么，欢呼，不喜欢什么，跺脚。”有时微信群里也发生争论，互相指责对方写的不是诗，腾龙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不去定义什么东西。

正是这种宽容与多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诗喃活动。201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渡边，是个长相清秀、十分阳光的大男孩。毕业后由于影视行业不景气，他演过话剧、拍过旅游纪录片，还在咖啡馆工作过，半年前才到上海。去年9月份，渡边与Fi在一次剧本围读会上结识，随后成为诗喃活动中最核心的表演者之一。第一次参加诗喃活动，渡边就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你能意识到它跟个体有关，跟在场有关，跟一种很直接的力量感有关，而不只是跟节奏、韵律、文字的选择有关。”

渡边从高中时代就写诗，但这一爱好并不为身边的朋友所理解，甚至被视为一种矫情。而诗喃表演让他意识到，重要的不是寻求别人的理解，而是“只要

有我在就好”，每个人都愿意掏心掏肺地表达。那天晚上，他表演了一首自己刚刚创作的《午休，无休》：“午休，午餐，午睡，无意，就硬凑在一起 / 办公楼外 / 一群人 / 踱脚，向前走 / 一群人 / 踮脚，等灯变绿 / 一群人 / 停又动，保持队形，动再停，等某人，两人，多人再变一群。”写的正是他在工作场合中的不适感，还有对人群莫名其妙的恐惧。表演时，渡边指着台下的听众，临时加进去一段：“还有台下的一个人，两个人，四个人，八个人 / 一群人 / 你们一群人，真是好 / 我们一群人，真是好 / 该死的一群人。”那一刻，他感觉自我和诗歌第一次完整地融合在一起。

“我握着这具身体 / 不愿撒手 / 有时那是我仅有的 / 存在证据 / 抠进礁石 / 麻木痛觉 / 求生的手爬出吃人的水 / 它 / 只想活。”那晚腾龙表演了题为《手》的诗，讲述的是他在澳洲求学期间，和女友徒步遇险的一段生死体验。“我这一段在诗喃中所写的几乎所有诗都来自个人经验，在个人故事中剖析自我，这个过程非常疗愈。”他说。

每次表演前，腾龙都会进行排练，寻找适合的肢体语言。当他在台上举起手，短促有力地读《手》时，那些属于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引起了人们对手这一身体部位的重新思索。与偏重文本的诗歌相比，诗喃的力量在于，这是用自己的身体表演自己的诗。这让我想起韩国电影《诗》中的一个画面：诗歌讲座班上，老师让每个人回忆一生中那些最美好的时刻。有人讲到不伦之恋的爱与痛，有人讲到高龄生子的喜悦，有人讲到住进大房子时的快乐，主人公美子则泪流满面地想起小时候在窗帘阴影半遮的房间，姐姐举起双手一遍遍召唤着步履不稳的自己：“美子，过来呀！”在某种共同的氛围中，诗歌能让人们卸下沉重的铠甲，回归到最深处的生命经验。

“撞击”的魅力

我曾请教过诗人、译者范静哗，Poetry Slam究竟应该如何翻译，他更倾向于翻译为“砸诗会”，因为Slam本身的意思为撞击，可以引申为爆棚、掷地有声。在他看来，诗人上台比赛，多少有点把什么本事都亮出来的互相“砸场子”的意味。

参与了诗喃活动的Ringo也曾和一些诗人朋友讨论过“诗喃”这个多少有些误译的译名。她大学读的是中文系，由于喜欢戏剧，业余时间也写剧评，结识了许多话剧圈的朋友。参加诗喃活动后，Ringo发现这两个群体一些有趣的差异：“诗喃吸



“诗人游击队”的主要组织者：腾龙、Fi、小白（从左至右）



(TPG/alamy 供图)

德国埃姆舍艺术节上的诗喃活动现场

引的更多是影视圈、时尚圈的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写的东西更偏于表达个人的敏感脆弱以及很小的共鸣，与国外的 Slam 相比，大家可能不太想去探讨太过严肃深刻的议题；而我在剧场的朋友们会更在意能否用这样的方式探讨一些更有集体记忆的事情，我们想表达勇气，有些不得不说的话。”

Ringo 第一次参加“诗人游击队”的诗喃现场，表演的正是后来引起最多共鸣的那首《统计》。“上场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蒙，明显感觉到大家不知道怎么参与进来，但到后来大家被慢慢带了进去，不光举手，还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尤其当我问最后一个问题‘被现实改变了的人多，还是认为我就是那个要改变世界的人多？’时，我很坚定地举手，然后看到底下一开始有一些人举手，后来又犹犹豫豫地举起了一些手，尽管比我想象的少一些。”Ringo 说。

让她有些意外的是，每次演这首《统计》，现场都会有人掉眼泪。今年跨年夜，Ringo 在上海独立书店阅读节上再次表演了这首作品。她将诗中的问题改动了一下：“经历过新冠的人多，还是没经历过新冠的人多？”“进过急诊室的人多，还是没进过急诊室的人多？”那段时间大家刚刚“阳康”，反应很大。当问到“是演别人的人多，还是演自己的人多？是主角多，还是配角多？是现实中的戏剧多，还是戏剧中的现实多？”时，她发现一些人开始掉眼泪。只要愿意，这是一首可以不断更新、持续表演的作品。现场的即时性反馈，构成这首作品最为典型的魅力。

一个雨夜，我和腾龙、小白在小酒吧聊到很晚。成立不到一年，“诗人游击队”在组织的 8 次活动中不断完善着诗喃的表演形式，从最初的开放麦，到后来增加了现场评分环节，再到最新加入 1V1 的“诗拳击”，使其更加回归竞演属性。只是，作为一种流行文化中的亚文化，诗喃在国内的普及尚远远不够，如腾龙说的，许多参与者的表演意识仍然不够，还停留在诗歌朗诵的层面；或者如 Ringo 所说，诗喃的议题更多还停留在个人的情感经验，难以带动更多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集体记忆。然而，他们毕竟在场，那种身体的、即兴的、真实的在场感。■

（感谢傅浩、胡桑、李晖对采访的帮助）

不再神秘的奥陌陌

主笔 · 苗千

作为人类发现的首个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奥陌陌足以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



2017年10月19日，位于夏威夷的一台天文望远镜首先发现了太阳系内的一个奇异天体：它的运行速度极快，达到了每秒钟87公里；从它的运行轨道来看，它不可能是太阳系内部的天体，只可能来自太阳系之外，因此它也就成为了人类发现的首个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这个天体的官方名称是“1I/2017 U1”，而它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奥陌陌”（Oumuamua），在夏威夷语中意为“首个到来的来自远方的信使”。

因为体积极小，运行速度极快，奥陌陌在人们的视线中只停留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下，它在太阳系中划出了一个类似于弹弓形的轨迹，如今已经穿越了海王星轨道，正远离太阳系而去。这个情景与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在1972年创作的科幻小说《与拉马相会》（*Rendezvous with Rama*）非常相似——一个长筒形的外星飞船无声无息地穿越太阳系，没有主动与人类接触，却引发了人类极大的兴趣——于是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

作为人类发现的首个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奥陌陌确实显得有太多神秘之处。与太阳系内常见的小行星和彗星相比，它显得极其小巧，大约只有200米长；它的形状也非常奇特，像是一个旋转的雪茄。太阳系内的一些彗星在接近太阳时，因为自身的冰块发生融化，会产生出大量的水汽和灰尘，因此拖出一道长长的“彗尾”。奥陌陌在太阳系内部运行时并没有产生出彗尾，但当它远离太阳时，却莫名其妙地产生出一个反引力加速——人们不禁猜测，使它产生加速的动力从何而来？难道奥陌陌真的像一些人猜想的那样，是来自外星文明的宇宙飞船？

几年时间过去了，虽然奥陌陌早已离开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天文学家关于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2023年3月22日，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家詹妮弗·伯格纳（Jennifer Bergner）与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家达里尔·塞利格曼（Daryl Seligman）合作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1I/‘Oumuamua从H_2O冰中辐射产生的H_2加速》（*Acceleration of 1I/‘Oumuamua from radiolytically produced H_2 in H_2O ice*），通过一个较为简单的模型解释了奥陌陌种种奇异的行为，也得到了大多数天文学家的赞同。

两位研究者建立模型对奥陌陌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成分奇特，但它无疑是一颗星际彗星。奥陌陌可能原本是某颗临近恒星的一个彗星，因为某种因素被抛射出来，在宇宙中穿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大约是受到了临近超新星爆发的影响，使它经受了高能辐射。辐射使奥陌陌自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艺术家创作的“奥陌陌”概念图

右图：业余天文学家根纳季·鲍里索夫在2019年发现了第二个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2I/Borisov”

身大约30%的水资源被转化成了氢，储存在其内部。也就是说，奥陌陌不仅外形类似一只雪茄，在形成的过程中，它可能也经受了和制作雪茄一样的烘烤。进入到太阳系之后，因为太阳的热量，使其内部存储的氢变成气体溢出。因为奥陌陌的体形极小，并没有太多的灰尘，天文学家们也就没有观测到它产生出彗尾；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它体形太小，自身释放的氢气已经足够对其运动状态造成改变，这才出现了神秘的加速。

虽然人类已经不可能再对奥陌陌进行任何的观测，但在种种猜测之中，这两位科学家提出的模型简单合理地解释了奥陌陌种种看似奇异的行为，因此得到了大多数天文学家的赞同。

实际上，在太阳系内部类似来自外界的天体可能并不在少数。在2019年，人类发现了第二个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2I/Borisov”。它是被业余天文学家根纳季·鲍里索夫（Gennady Borisov）在克里米亚天文台首先发现的，因此也被称为“鲍里索夫彗星”。相比于奥陌陌，鲍里索夫彗星要大得多，直径达到数公里，行为也更接近一颗标准的彗星。而欧洲空间局（ESA）计划在2029年发射彗星拦截器（Comet Interceptor）任务，在太空中探测长周期彗星，届时必定会发现更多类似的太阳系外天体。

即便奥陌陌不是外星文明的太空飞船，只是一颗平平无奇的彗星，它也足以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它可能原本从属于临近太阳的某颗恒星，受到某种扰动之后脱离了原有的恒星系统，进入到了茫茫的宇宙空间之中。它或许与其他天体发生过撞击，也经历了高能宇宙射线的辐射，最终跨越了几光年的距离，进入到了太阳系。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之下，它的路线发生改变，从而被人类发现。而后奥陌陌的旅行仍将继续，或许在遥远的未来，会被另一个文明所发现和研究。像是奥陌陌这样在不同的恒星系统之间跨越数光年的太空旅行，可能是人类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想。

〔本文写作参考了《自然》（*Nature*）杂志的相关报道〕

哺乳动物基因全家福

主笔 · 袁越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于2003年4月14日，迄今已经过去20年。当时除了人类之外，科学家们只测出了小鼠、大鼠和黑猩猩3种哺乳动物的全基因组序列，很难做出全面的横向对比。但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科学家们又测出了几百种哺乳动物的全基因组序列，终于可以得出一些具有统计意义的结论。

为了整合各国的研究资源，提高工作效率，来自全球30家科研机构的150多名科学家组成了一个跨国联盟，共同开启了一项名为Zoonomia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把包括人类在内的241种哺乳动物的基因组汇总到一起，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代表了当今现存80%的哺乳动物种类，基本上反映了哺乳动物纲的全貌。生物进化学家们相信，如果要想研究哺乳动物家族的进化史，至少需要对比200个基因组的数据才能得出具有统计意义的结论，Zoonomia数据库满足了这个最低要求。

2023年4月27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一口气刊登了11篇来自Zoonomia项目的科学家撰写的论文，向读者介绍了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其中一篇论文证明，胎盘类哺乳动物早在恐龙时代就已经进化出来并开始分化了。而当一颗撞向地球的小行星把恐龙消灭之后，哺乳动物迎来了一次快速的分化期，这显然是因为恐龙的灭绝给哺乳动物空出了无数个生态位，哺乳动物们迅速分化成不同的种群，抢占了这些生态位，最终成为地球的王者。

另一篇论文详细对比了这241个基因组的基因序列，发现有10.2%的序列是完全一致的，说明这部分DNA的功能极为重要，任何改变都会致死。进一步研究显示，这部分DNA序列大都位于蛋白质编码区之外，属于调控基因的范畴，其中约有一半的调控基因的具体功能未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金矿。

不过，大家最感兴趣的肯定是人类的基因组，尤其是人类疾病和基因之间的关系。此前这个问题大都是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法”(GWAS)来研究的，这个方法只聚焦于人类基因组本身，通过对比健康人和患者的基因组序列，找出双方的差异。问题在于，这个研究方法只能发现基因和疾病之间的关联，无法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很多疾病往往会涉及成千上万个基因位点的差异，很难判断究竟哪个差异是决定性的。

Zoonomia项目则另辟蹊径，试图通过研究哺乳动物的基因进化史来判断究竟哪个基因最有可能是致病元凶。研究人员通过计算后发现，这个研究思路要比GWAS方法更容易获得成功，其研究难度至少降低了一个数量级。

这个思路还可以用于研究嗅觉和冬眠等这些哺乳动物典型性状的出现原因，以及人类大脑的进化秘密。这些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研究少数几种哺乳动物的基因组而找到答案，必须研究哺乳动物的整个进化历史才能获得成功。这就好比说如果我们想全面地了解一个人，最好研究一下他的个人成长史，以及他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知道这个人身上的各种特质都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这正是Zoonomia项目的优势所在。我们可以将这241个基因看成是一幅哺乳动物的基因全家福，科学家们希望通过这张全家福，找到人类进化的秘密，以及各种人类遗传病的起因。





爱乐
Philharmonic
弦歌六梦
维米尔的音乐世界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280 期
前奏 听《镜中之镜》___ 华彩 弦歌六梦：维米尔的音乐世界 ___ 变奏 波德莱尔与瓦格纳 ___ 泛音 倾听家园 ___ 幕间 美国摇滚乐队猫头鹰与河豚 ___ 对话 青年作曲家文子洋的成长密码 ___ 再现 弗罗贝格尔和他的音乐 ___ 专栏 科恩和他的哈利路亚 ___ 安可“李鬼歌剧院”
爱乐公众号
扫码购买纸刊
订阅电子刊

四库全书纪事之武英殿的摊子（7）

誊录的队伍

文 · 卜键

誊录，缮写，其实就是抄稿，兴办四库时主要是按照要求抄书。武英殿修书处原有10名缮写的编制，从国子监贡生中挑选善书者，根据纂修翰林的指派做事。乾隆三十四年十月，时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总裁的王际华认为事情不多，一些贡生的书写质量也不高，“奏明裁去四缺，止留六缺，改由吏部考取誊录内选取举人及正途贡生，到殿验试，字画端楷者充补”。那时的他自也预料不到几年后皇上要兴修四库，不愿意养一些混日子的，采取了精简人员的举措，现在却要大肆招收写手了。

活字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至乾隆中期，已有700多年的历史，由泥活字、木活字到铜活字，技术上臻于完善。雍正间印成的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虽说已经熔化铸了佛像，新制一套铜字并非难事，改镌木字更其简便。兴修《四库全书》为何要采用抄录的方式？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可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大量的写手，与之相匹配的众多校对；而全手工的誊录过程，也容易造成千奇百怪的讹误，校勘难尽，成书后仍不断发现差错，不断地折腾。可皇上就这么定了，谁敢多嘴？无独有偶，当年永乐皇帝敕修《永乐大典》，也是选择誊录。弘历尽管很瞧不上朱棣的篡位，连带着找了不少《永乐大典》的毛病，这方面却是有样学样。

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一日，刘统勋等人呈报整体纂修方案，第四款说到誊录，视为办书急务，曰：“誊录一项，前经臣等奏明酌取六十名在馆行走，仅供写录《永乐大典》正副本之用。今恭缮《四库全书》陈设本一样四分，卷帙浩瀚，字数繁多，必须同时分缮成编，庶不致汗青无日。而其字画均须端楷，又未能日计有余，非多派誊录人员不能如期蒇役。臣等共同酌议，令现在提调、纂修各员于在京之举人及贡监各生内择字画工致者，各举数人，臣等复加阅定，共足四百人之数，令其充为誊录，自备资斧效力。”请注意其提到的数字：此前已有60名誊录，用以缮写自《永乐大典》辑出的佚文，工作地点在翰林院；此次再增招四百名，则是应武英殿抄书之需。至于招收方式，为推荐选拔加面试，即纂修和提调举荐拣选，最后由总裁审定。

资斧，亦作资鈇，指旅费、盘缠。“自备资斧效力”，是说所有誊录均属自费出力，无须朝廷发放津贴。为什么？

岂知这也是清廷修书的一个通例，在书局认真抄写，干满五年后便会有官做。此前所用誊录较少，在四库馆则是一个大数字，竣工后一下子安排数百个职务，也不现实。刘统勋提交的方案引入了考评分等机制：“请照各馆五年议叙之例，核其写字多少为等差。如五年期满，所写字能逾十分之三以上者，列为头等，准咨部议叙；其仅足字数者，次之；若写不足数，必须补写完足，方准咨部。”那时的官场已是人满为患，即便进士出身，也可能多年派不上一个位置；而乾隆很烦“捐纳”的花钱买官，下旨“停止捐例”。充当四库誊录成为一个可靠路径，是以消息传出，各地趋之若鹜。

武英殿内，东庑为凝道殿，西庑为焕章殿，皆面阔五间，附有耳房，应是缮书处的办公场所。而400名誊录又分为两块：200人办四库文渊阁本，即“第一分全书”；另有200人办理《四库荟要》。两拨子人马同时入场，齐头并进，各据一座配殿，至于孰东孰西，已难以确指。他们都要遵从总裁和提调的指挥棒，若说会发生一些交叉，也是有可能的。

誊录是一个苦差事，规定的字数是“每人每日写一千字，每年扣去三十日为赴公所领书交书

之暇，计每人每年可写三十万字”，基本上要天天伏案，风雨无阻。而要求是字划端正，不存在错讹，包括版心格式必须规范。一旦发现问题，即会被驳回重写（称“驳换”），少则一页，多则数页十数页，就算是白写了。誊录也是一个大队伍，人数一多，就会出点个幺蛾子，前面写到的大兴监生姚岐谟的长期旷课便是一例。三十八年六月，御史胡翘元指出纂修提调等保举誊录之弊，说难免会有人借机受贿，加上要“自备资斧”，导致贫寒的善书之士选不上，“而书法平常者，转得挟资充选”，然后再去雇用书手，奏请叫停，乾隆很重视，命“九卿议奏”。未见到九卿集议的结果，此后四库的誊录队伍仍不断扩大，也显得更有吸引力。三十九年七月，总裁王际华推荐自己的弟弟锡寿做誊录，还特地为之置办了靴帽袍褂一整套行头，颇为郑重。而更为郑重的是乾隆帝，于四十一年九月特谕内阁，说原任大学士朱轼的孙子监生朱世德来京，“着加恩在四库全书处誊录上行走”。行走，有试用之义。看来皇上既念老臣旧谊，又担心乃孙万一书法不精或不努力，留了点儿余地。


《古今图书集成》

皇六子永瑢奉旨任总裁不到一个月，即领衔奏上《功过处分条例》，主要针对的便是誊录和校对，并与誊录将来是否任用相关联：

至五年期满后，将功过簿详加核对，其应行议叙之缮录人员，除按字数多寡工拙酌定等次外，仍将功多过少者列为上等，功过相抵者次之，过多功少者又次之。由臣等公同核定，移咨吏部，分别班次铨用。其有过无功者，除字画潦草之员臣等随时甄别沙汰外，如字画尚属端楷，惟错字不能尽免者，尚可留供抄录。

功，是指原书中存在错讹，誊录加签提醒分校斟酌改正，“每一处记功一次”；过，指誊录粗心误写，“每错一次，记过一次”；如系原书错了，也跟着抄错，则免其记过。条例依据功过簿的日常记录，将誊录分为三个等次，应有较切实的激励作用。

有关誊录，除了一史馆张书才主编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外，流传至今的私人记载甚少，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收藏了一本武英殿誊录的考勤簿，极为难得。李振聚《新发现的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考述》对之做了精细周密的研究，并与相关史料比对互证，读后颇受启发。据介绍，这份档册“为一册蓝格写本，共计70叶。每叶分上下栏，上栏记书名、卷数，下栏记页数、字数、等次等内容”，是武英殿缮书处的工作档案，涉及陆潮愈、袁莹、谢莲锷、戴琠、魏淳耀、魏绳曾、汪存堉、许荫培等十三位誊录人员，以及分校官、国子监学正卜维吉，推测应属“分校卜”管理的一股。册中谢莲锷页《御制诗三集》项下，字数旁朱笔标注“板心违式，罚字五千实”，得，老谢那五天算是白忙活了。

有意思的是，档册中还夹了一封军机处中书院葵生致卜维吉的信，协调在馆监生参试诸事。此事应与卜氏所带誊录有关，而据李振聚的研究，十三誊录中陆潮愈、谢莲锷、魏绳曾做了县丞、通判之类地方官，数年辛苦，也算上不虚此“誊”。

模范“小红人”

文 · 张斌


5月6日，西班牙塞尔维亚举行22/23国王杯决赛，皇家马德里2：1战胜奥萨苏纳。图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中）和索菲亚公主观看比赛

国王费利佩六世周六这天的日程安排相当紧凑，中午在伦敦出席英王查尔斯三世的加冕仪式，晚上即飞到塞维利亚，在国王杯决赛开赛前几分钟现身球场。经过当地市政府和警方的齐心努力，那些会刺激到国王神经的巴斯克独立标语口号总算被处理掉了。但全场那2.5万名身着红色球衣的“小红人”奥萨苏纳拥趸们形成的不俗声势，依旧让国王陛下感知到，这个夜晚王室一贯钟情的白色军团在触碰奖杯之前，还是要经历一番热血洗礼的。

决赛当日上午，红白两色支持者便在塞维利亚城中聚集成势，建于14世纪的古旧教堂前，彼此相安无事，在向球场进发时，则要严格按照警方安排的路线，隔岸行进。相比于巨人皇马，奥萨苏纳仅能算是寻常角色，但是俱乐部上下坚信，可以在球场上被击败，但是在看台上，还不一定是谁的天下呢。19208名奥萨苏纳俱乐部会员无一例外申请了这场决赛的门票，结果涌入场内的“小红人”球迷远远多于这个数量。在奥萨苏纳城中，城堡广场周六也是红色海洋，遥相呼应，共同沉醉于俱乐部103年历史中的第二次跻身国王杯决赛，上一次则要追溯至18年前。

此番与皇马对决国王杯，对于“小红人”俨然是一次心理疗愈，8年前俱乐部跌至史上最黑暗深渊，居然只得栖身第三级别联赛。如今，“小红人”虽早已重回西甲，但也只能位列中游，难见出头之日。本赛季国王杯赛，“小红人”命硬至极，决赛前居然上演了4场通过点球决战击溃对手的惨胜。有了决赛之尊，“小红人”再坚韧，也不敢有丝毫非分之想，层层铁桶阵开场仅109秒便被皇马攻破，眼睁睁看着对国王杯并未全情投入的对手轻松表演着。

皇马大军碾压“小红人”尽在情理之中，算一算两队打造球队阵容的投入便高下立判。皇马赛季投入6.87亿欧元，“小红人”不过5000万欧元，纯粹的平民之师，全队身价最高者不过800万欧元。但是，决赛开打之前，对于奥萨苏纳的赞誉便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将这支目前在西甲位列第十的球队誉为模范俱乐部，究其原因，在于“小红人”固有的强大“纳瓦拉基因”和独特的“星期一何等重要”。

奥萨苏纳队是纳瓦拉省的骄傲，该省紧邻巴斯克和阿拉贡两个大省，虽未曾哺育出豪门球会，但是保持的一项纪录令人惊骇。几年前的数据显示，常居人口为65万人的纳瓦拉省平均每2.2万人便贡献一位职业球员，当地人对此甚是自豪，笃定自家的足球系统和生态好极了。

奥萨苏纳是纳瓦拉唯一的高水准职业球会，保持着与本省150支青少年球队的紧密联系，在成长体系中有2万名孩子保持着活跃状态。“小红人”还有着强大的球探体系，自称为了找寻人才，翻过纳瓦拉的每一块石头，将流连于迪士尼乐园中的孩童导引进竞争残酷的侏罗纪公园。“纳瓦拉基因”持续澎湃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十几年前的那次沉痛降级，奥萨苏纳下定决心以青训学院名称命名了“塔洪纳2017年计划”，重振青训，让球队再度伟大。

“星期一何等重要”则是奥萨苏纳的独特风范，所有一线队球员都会在每个星期一来临之前得到通知，在周末联赛结束后，在星期一下午到位于塔洪纳的青训基地陪伴梯队球员进行半天训练，从U-11球员到U-18球员都有机会与当家球星一道操练，获取能量和激励。长久以来这已成为奥萨苏纳的独特传统，每位球员都乐此不疲，希望给努力成长中的后辈一个明确的信号，前路的大门对所有人一直敞开，所有成功者都要牢记，自己从何而来。

梭罗与专注力难题

主笔 · 薛巍



荷兰心理学家斯特凡 · 范德斯蒂格谢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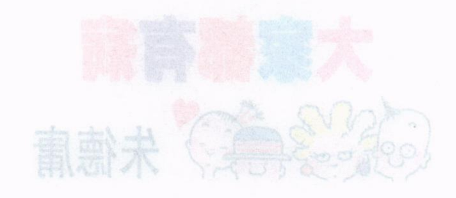
注意力涣散、分心是网络引发的一个很普遍、很严重的问题，梭罗在 100 多年前就遇到了如何保持专注的问题。

当我们习惯了刷短视频、不停滑动屏幕后，必要时，我们还能保持长时间的专注吗？微软的一份报告说，我们的注意力持续的时间从 2000 年的 12 秒降低到了如今的 8 秒，比金鱼还短。《我们被偷走的注意力》一书作者、荷兰心理学家斯特凡 · 范德斯蒂格谢尔说，我们的大脑弹性很强，如果事情很重要，我们还是能够专心致志去做的，比如“一位教授对学生说，专心听讲半小时就给 5000 欧元”，他们肯定能专心。

英国作家汤姆 · 摩尔也认为专注力需要用钱去获得，他在《唯有书籍》一书中说：“注意力涣散如今就是我们日常的精神状态。所有在线内容生产者都知道他们需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只要短暂的吸引即可：只要我们点进网页，增加他们的使用统计数据就够了。在网络中，我们踏入了略读、跳过、速览和链接的领域。而严肃读物一直以来所要求的那种持续而集中的注意力，似乎越来越难做到。在未来，脱离数字媒介可能是种奢侈。特权阶级才能够关闭邮件和社交媒体的通知，而低层阶级将被零工经济绑定在智能手机上……持续的纸质阅读将成为一种特权，富裕的家长会花钱让孩子接受这方面的培训。”

当我们的注意力被分散时，一般要 20 分钟之后才能再次捡起之前的工作。范德斯蒂格谢尔说：“我们周围总是有太多信息。当你在大自然中行走，或者在自己家里，你周围也有太多信息要去吸收。我们的大脑只能处理其中一部分信息，所以我们的大脑必须去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去注意。注意力一次只能被分配到一个地方。只是现在争夺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实际上，我们需要转移注意力，走神让我们保持安全。当你在过马路的时候，你需要被跟你相关的信息吸引。你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有人进房间时，你需要意识到才能确保安全。一些不同的、新鲜的、显著的事情发生时，就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大脑没有分辨力，当它走神时，它不知那是收到新的猫视频的通知，还是有狮子进了房间。它只是发出信号要求查看，查看后才知道是什么，这时已经走神了。”

1845 年 3 月，梭罗借了一柄斧子，到瓦尔登湖畔的树林子里砍木材。一天，斧头从柄上脱落下来，他砍了一段碧绿的山核桃树枝做楔子。这时，他看见一条花蛇蹿入水中，潜伏在湖底，“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人们之所以滞留在目前低级和原始的状态，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吧。前一阵子，在霜冻的清晨看见过小径上有好几条蛇，蛇体有些部分依然麻木，欠灵活”。耶鲁大学教授凯莱布 · 史密斯在《梭罗的斧子》一书中说，在梭罗看来，人们的麻木不是由于原始的存在方式，而是由于现代文明对自然和人类的伤害。人们不是被困在过去，而是迷失在了现在。蛰伏状态不是懒惰，而是现代人工作和



娱乐时不留心、疲惫，像机器一样活动。这让人变得麻木而不是平静。梭罗有一句名言：“我们的发明常常是一些漂亮的玩具，使我们分心，不能专注于严肃的事物。”他认为世界变得无比喧嚣，损害着我们关注事物的能力。生活节奏越快，人们的专注力越低，而专注能让我们的体验更加完整、更感到满足，跟他人有更深的接触，能让心灵变得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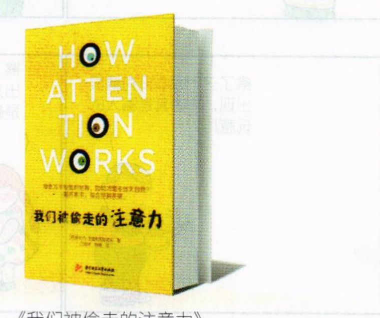
梭罗说，为了保持专注，我们要“通过谨慎执着与奉献牺牲找到重新救赎自己的途径，使心灵再度成为神圣的殿堂。像对待天真坦诚的孩子般善待我们的内心，谨慎对待强占我们注意力的对象和主题。不要读《纽约时报》，去读那些不朽的传世经典。”我们一边保持专注，一边会受到其他欲望和冲动的吸引。“注意力就像斧子的楔子，把自我的两个部分束在一起，把它们对齐。”

梭罗还提出了一种“后撤”的策略。1852 年 9 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让我们的感觉像思维一样游荡，我的眼睛要去见（see）而不看（look)。卡莱尔说观察是要去看，但我要说应该是去见，看得越多观察到的越少。我习惯于关注太多的东西，以致我的感官得不到休息，总是紧绷着。不要沉浸于看。不要走向目标，让它走向你。”

“看”是主动搜寻，“见”是被动接受。澳大利亚哲学家帕特里克·斯托克斯解释说，当我们看见某物，它好像是主动把自己强加给我们的。比如那个经典的鸭子—兔子错觉测试图，第一次你只能看到鸭子。怎样才能看到兔子呢？你不能只用意志来看到兔子，你要让兔子显示出来。看的时候要选择指引你的视线，见则需要摆脱掉鸭子。梭罗意识到，努力去看反而会阻止事物的显现。当我们看的时候，会过于沉浸于看之中。专注的悖论是，我们不费力的时候最专注。我们要去让世界出现，而不是努力去用我们的视线捕捉它。

梭罗的想法跟庄子不谋而合。《庄子·外篇》中有一个故事：一个叫庆的木工做了一个挂鼓的架子，做得很漂亮。鲁侯问他有何秘诀，他说他在做之前“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静心三天后忘记了名利，五天后忘记了赞誉或者批评、巧或者拙，一周后，甚至忘了自己的身体，然后再去林子里选材。这个故事阐述了无为的思想：鼓架已经在那里了，工匠要做的是摆脱一切妨碍它出现的念头，把自己化作它自我实现的媒介。“工匠如果考虑技艺或者报酬，会妨碍制作的过程。他不是走到林子里，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材料。他没有让外在的动机如挣钱、获得赞誉影响他的工作。他消失了，直到本就处于木材中的东西现身。看见东西不需要努力去看，而是要清除掉头脑中杂乱的东西。只有一个安静的头脑才能提供让事物出现的开放性空间，不会受到我们的计划和野心的干扰。所以有时专注不是去注意，而是任其自然。”

如果走神是难免的，那就谨慎选择走神的目标。在我们醒着的 47% 的时间里，我们的心思都在游移。当我们不是在观察外界，而是陷入内心自白、头脑在漫游时，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被激活，这时我们的大脑会寻找相关记忆，来帮助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将会发生的事情。它无穷的联想也会造成焦虑和抑郁。但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头脑的漫游可以激发创造力、提高学习效果。《新哲人》编辑凯斯说：“走神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走神到底是有帮助还是有阻碍。我们是被手机或电脑发出的电子信号分心，还是被身边的世界、声音、事件或人分心？你要学会用重要的东西来让你分神——你热爱的、引以为傲的、让人生值得过的东西。”



《我们被偷走的注意力》

大家都有病



我是千古难遇的神灯。

你只要用手擦三下，我就会给你许多惊奇。

你太落伍了。

手机只要用手划一下，就会有许多惊奇。

把我从关了那么久的神灯里放出来，你可以许三个愿望。

愿望是什么？

愿望是一种心灵。

心灵是什么？

心灵是情感和精神的认知。

情感和精神是什么？

算了，我还是再关回神灯里吧。

AI机器人不配拥有童话……

你把我从关了五百年的神灯里放出来。

我可以让你许三个愿望做为报答。

太好了。

数量有限，卖完为止。

一个愿望 三千万

唉，一个只有买卖没有童话的时代……

为了感谢把我从神灯里放出来，你可以许三个愿望。

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成为拥有魔法的你。

失业了……

召聘 清洁工作

擦了三下根本没有精灵出现，神话真是骗人的玩意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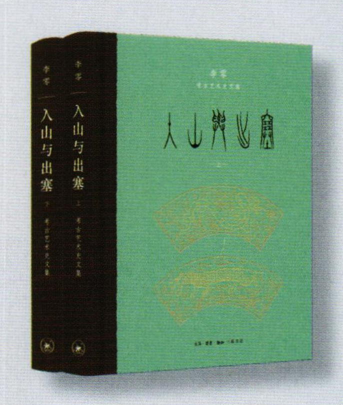
擦了十几下都没有精灵出来，神灯故事原来全是假的。

擦了半天也没有精灵，我再也不相信神话了。

沉溺手机的精灵。

神灯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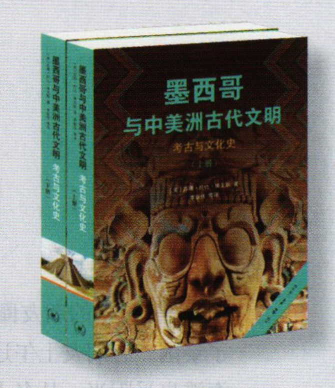
结论：手机毁了大人也毁了小孩，现在连精灵也毁了。



入山与出塞：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

李零 著 定价：26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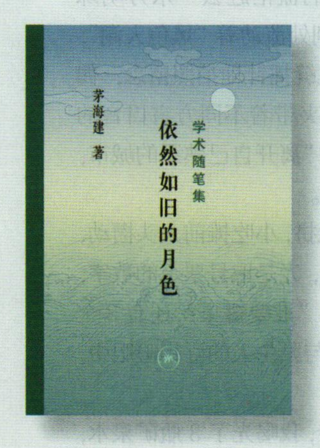
李零重要考古艺术史论文结集，探讨零散文物背后的大问题。从“入山”与“出塞”两个维度，提供梳理中国上古文明特色的独到视角，思考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演变。此次新版，作者有二十余处修订。



墨西哥与中美洲古代文明：考古与文化史（上下册）

[美]苏珊·托比·埃文斯 著 李新伟 等译 定价：19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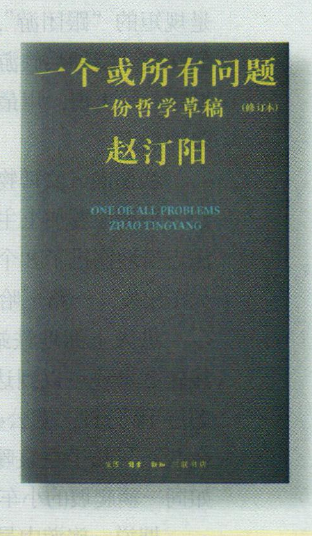
中美洲曾孕育了玛雅和阿兹特克帝国两大重要古代文明。本书为介绍中美洲考古学和文化的权威读本，涵盖从史前到殖民时代一万年的历史，曾获美国考古学会最佳图书奖，迄今已更新三版，汇集最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依然如旧的月色：学术随笔集

茅海建 著 定价：7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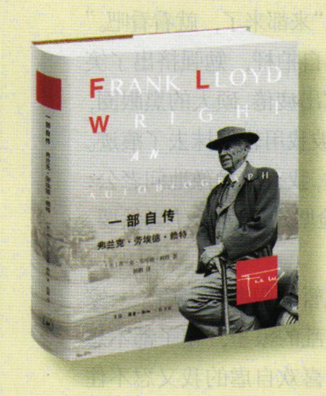
近代史专家茅海建教授的学术随笔集。从不同的侧面记录了作者近二十年习史、治学、思考的学术人生。在这个千变万化的近代中国与当代世界，还有什么是恒久不变、又可让读书人心常相守？



一个或所有问题：一份哲学草稿（修订本）

赵汀阳 著 定价：6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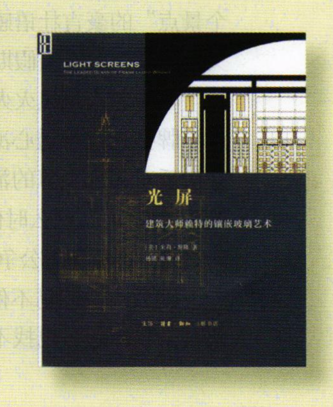
赵汀阳的原创哲学作品，提出“创世存在论”的形而上学论断，这是传统哲学因文化或历史原因而错过的重要问题。历史性的文明创制并非基于必然的真理，而是基于对可能性的选择和设计，所以说，本源始于创制，或者，创制即本源。



一部自传：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著 杨鹏 译 定价：168.00元

建筑大师赖特自传。他模仿自己所崇拜的作家雨果的笔法，以外祖父举家移民来到美国开篇，接续自己的童年、少年，初恋、进入建筑领域，以及成年后的婚变、破产、事业低落和晚年的复兴，情节跌宕，内容丰盛。



光屏：建筑大师赖特的镶嵌玻璃艺术

[美]朱莉·斯隆 著 杨鹏 陈珊 译 定价：86.00元

彩绘镶嵌玻璃技术，是赖特签名式的设计手法之一。他用一长排连续的玻璃窗，把室外景象引入室内，以重新塑造和划分室内空间。其早期作品里的玻璃窗，都由小块玻璃镶嵌在金属窗棂里形成图案——他称它们为“光屏”。



“特种兵”旅行记

文 · 彩虹见雪　图 · 陈曦



“五一”的朋友圈里，上海人去了三亚，深圳人去了泰国，有朋友上午还在办公室发邮件，下午已经奔赴海滩享受阳光，从名人故居、小吃街、音乐节、动物园到古镇，场景快速切换，如旋风般横扫一座城市。

在羡慕的同时，我们一家也计划出去旅行。以往都是规矩的“跟团游”，但这次调休出来的宝贵假期，我们深受“特种兵旅游”的热血感召，决定出发去邻近的城市——上海，用最短的时间、最节约的方式，玩到最多的景点。

我偏向人文博物馆，老公爱好自然风景，儿子在旁边一个劲地要加上主题乐园。在各取所需后，行程单满满当当地塞进了8个景点。我们不得不在早上6点搭乘火车出发，一路上哈欠连连。

进入上海地铁站，我信心十足地告诉家人：“1号线转2号线可以到达目的地。”然而一旦换乘步行时间超过10分钟，老公必定发问：“导航没错吧，怎么走那么久？”儿子在哀嚎：“脚好痛，什么时候能到？”我如同一辆爬坡的小车，受到多重阻力而行动缓慢。

据说，旅游中最受欢迎的旅伴，是那些默默无闻且没有异议的“跟随者”。我先用眼神示意老公专心拖拉行李箱，又把胖乎乎的儿子放在租赁的推车上，自己则火急火燎地跑去前方看指示牌，心里默念：“保佑路线正确。”

每一次转场都超过了预定时间，我对“两天完成8个景点”的豪言壮语感到忧心，但若减少任何一个景点，又会产生浪费宝贵假期的遗憾。

当一家人风风火火地赶到渡轮码头，“暂停营业”的告示牌把人浇得透心凉，老公建议买高价游船票，我则坚决反对超出预算的消费。此刻，儿子不停地晃动着我的胳膊询问：“什么时候才能去乐园？”我既要安抚孩子的情绪，又要和老公争论后续计划，耳边一片嗡嗡声。

随后，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往博物馆。在出示预约门票时，我却怎么也找不到订单信息，猛然想起忘记按最后的确认按钮了。保安大叔指着冗长的入馆队伍，摆手拒绝了我们的“花式求情”。这时，我整个人弥漫在“诸事不顺”的氛围中。

为了填补行程的空白，我们慌忙赶去“东方明珠塔”打卡。在地标性的建筑前，到处流动着“黑色人潮”，我们对抗着彼此身体的冲撞，见缝插针地拍照留念，偶尔叫上几句“不要挤了”，总有夹带着不同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回应，感叹旅行就是一次“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去体验他人熟悉的生活”的冲动。

吃饭更是“眼疾手快”的比拼，小吃摊前人头攒动，没法落脚。而在大餐厅排队等座，光是取号票上的数字，就令人心生绝望。服务员高叫：“谁要拼桌？还有3个人。”我们齐齐举手同意，于是在与陌生人的互相瞪眼中，草草结束一餐。

当手机里的步数达到2万步，我喝光了3瓶矿泉水，儿子累得软绵绵地趴在老公背上时，我们终于灰头土脸地来到当天旅游的最后一站“观樱胜地”。

出现在眼前的是几棵稀稀拉拉的樱花树，与社交平台上花团锦簇的“网红”照片大相径庭，感觉深受欺骗。为了振奋心情，老公抛出经典名言：“来都来了，就看看吧。”

我们使出剩余的力气，举起自拍杆，勉强挤出了笑容。照片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疲倦，硕大的黑眼圈，油光闪亮的鼻头，然而这一切都被我用软件抹去了痕迹。

在选择照片上传“朋友圈”时，我有点犹豫地问老公：“要不要显示地理位置？”他一脸坚定地回答：“当然要，来过才是旅游的精髓。”

不过，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短暂的假期结束后，一家人浑身酸痛、萎靡不振地回到凌乱的家里，箱子都不想打开。但是今天坐在办公桌前，喜欢自虐的我又忍不住胡思乱想：“下一次去哪里玩呢？”

本栏目投稿邮箱为：yourproblem@lifeweek.com.cn